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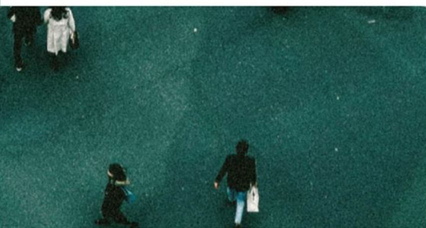
原來，這才是日本

野島剛 著

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
愛上臺灣環島……
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原來，日本人不排斥被稱為「倭人」，
而且越來越多人不會寫漢字了，
臺灣人喜歡日本料理，但日本人更喜歡臺灣便當？

野島剛深入連在地人都不自覺的日式思維，
讓你秒懂社會脈絡裡隱藏的大學問，
看見日本的真實模樣，就從這些事開始！



時報出版

NOJIMA TSUYOSHI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原來，這才是日本

野島剛 著

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
愛上臺灣環島……
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原來，日本人不排斥被稱為「倭人」，
而且越來越多人不會寫漢字了，
臺灣人喜歡日本料理，但日本人更喜歡臺灣便當？

野島剛深入連在地人都不自覺的日式思維，
讓你秒懂社會脈絡裡隱藏的大學問，
看見日本的真實模樣，就從這些事開始！

時報出版

NOJIMA TSUYOSHI





原來，這才是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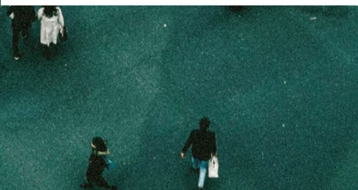
野島剛 著

做決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
愛上臺灣環島……
野島剛的34個文化深度探索



原來，日本人不排斥被稱為「倭人」，
而且越來越多人不會寫漢字了，
臺灣人喜歡日本料理，但日本人更喜歡臺灣便當？

野島剛深入連在地人都不自覺的日式思維，
讓你秒懂社會脈絡裡隱藏的大學問，
看見日本的真實模樣，就從這些事開始！



時報出版



NOJIMA TSUYOSHI

原来，这才是日本：做决定很迅速、生活成本不高、爱上臺湾环岛……野岛刚的34个文化深度探索

作者：野岛刚（Nojima Tsuyoshi）出版者：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8/05/11│档案格式：EPUB 档案制作日期：2018/05/29│档案制作：群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野岛刚（**Nojima Tsuyoshi**）

资深媒体人、作家。1968年出生，就读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系期间，曾赴臺湾师范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学习。1992年毕业后，曾任职于朝日新闻社，担任驻新加坡、臺北特派员。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地前线采访，后担任东京本社政治部记者。擅长采访报导两岸三地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2016年开始自由作家生涯。着有《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时报）、《伊拉克战争从军记》、《两个故宫的离合》（联经）、《谜样的清明上河图》（联经）、《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联经）、《台湾十年大变局：野岛刚观察的日中台新框架》（联经），以及《银幕上的新台湾：新世纪台湾电影中的台湾新形象》（联经）、《故宫90话》（典藏艺术家庭）等多部作品。目前在臺湾《苹果日报》《天下杂志》《报导者》《转角国际》等有专栏。

目录

封面

推荐序　最理解臺湾读者的日本作家

序　写下不一样的日本视野

臺日之间的美丽与哀愁

福原爱的中文为何令人佩服？

郭台铭为什么被日本「讨厌」？

为何日本人也开始迷上臺湾环岛？

排队吃一兰？

臺湾便当真的比日本美味吗？

臺湾料理和米其林风马牛不相干

臺湾道路简直和「战场」无异

赈灾外交的理想型：「报恩的连锁效应」

作为命运之钥的户籍──川岛芳子、李香兰，以及莲舫

渔业战争下走调的秋刀鱼滋味

日本人原来这么想

日本人为何爱吃生的东西？

让日本人最受辱的骂人话──骂人话的中日比较

日本人的「日本梦」

「灭私奉公」的武士道遗毒，令日本人停止不了「卖命」工作

我是「倭人」

日本人和儒教

被误解的日本人

日本现在进行式

不会写汉字的日本人

日本，穷人的天堂

日本，留不住外国劳动者

站着吃牛排的日本人

走向一夫多妻制的日本社会

「小而精」的二○二○东京奥运会

廉价表态的网路「炎上」──日本的电脑民主主义

天皇谈话给日本人带来的罪恶感

三一一震灾的遗迹拆还是不拆？

核爆圆顶屋

日本媒体与核电安全

所谓的日式美学

透过自杀获得永恆生命的那些日本小说家

另一个国民作家：渡边淳一

美术馆＆苹果派＆太宰治──我的青森之旅

浮世绘与动漫

日本的「美女」和「美人」，差别在哪里？

只有日本人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推荐序

最理解臺湾读者的日本作家

华视总经理　庄丰嘉

记得第一次认识野岛刚，是在他刚被《朝日新闻》外派为驻臺北支局长（特派员）时。当时我在中央社工作，前任支局长安排午餐，把野岛刚介绍给我。他们的中文都还可以，我们边吃饭边聊天。野岛刚突然说了一句话：「其实如果不听我们讲话的声音，我们看起来就像同一个国家的人。」

这就是我对野岛刚的第一个感觉，即使到今天，我更加觉得我们并非分属两个国家的人民，而是十分亲密而友好的一家人。而这份交谊竟然维持至今超过十年之久。

野岛是一位十分认真诚恳的记者，担任记者时跑遍臺湾东西南北，而且勤练臺语以深入中南部，掌握真正的臺湾面貌，充分展现日本人顶真的一面。我们共同经歷几次臺湾大选和政党轮替，他会询问我对选情的看法，也有一套他自己评估选情的方程式。像这样深刻认识臺湾的外国记者，真的不多见。

后来，他离开《朝日新闻》，成为专职作家，展现他旺盛的创作能量。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包括《两个故宫的离合》、《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其中尤以后者对蒋介石的研究，改变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刻板印象。为了写这本书，他特地跑去北投找寻当年白团日本将领居住所浸泡的温泉，亲身体验和想像当年的情景。这就是野岛刚用功之深的地方。

认识久了，听野岛刚聊日本人的个性，让我心中那个大和民族的个性逐渐清晰起来。就像这本书中最后一篇所提及电影《你的名字》的剧情，令观者又新奇又感动。跟他一样，这部片子我也看了两遍，两次都泪流满面，被电影中描述爱人分合时既含蓄又眷恋的爱情深深触动。更重要的是，片中陨石撞击地球隐喻三一一大地震带来的毁灭与重生，早

已成为臺日两国民众的共同记忆。

周遭好友几乎一年四季、日日月月都有人在日本，同辈的人去旅游、年轻一代去游学，甚至定居工作。十分弔诡的，我们这一代曾经被教育其为侵华日寇的日本国，竟成为臺湾人最喜欢和嚮往的第一朝圣地。

作为一位既瞭解臺湾又能够感受臺湾、中国和日本三地爱恨纠葛的日本作家，由野岛刚来写《原来，这才是日本》这样一本书，我真挚认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的了。

序

写下不一样的日本视野

日本和臺湾其实很近，从东京出发只要三个小时就能抵达臺湾。我最喜欢搭乘的是中华航空早上七点从羽田机场起飞，十点就到松山机场的航班。这班班机上通常都会放臺湾的报纸供乘客阅读，我一边看报纸，大脑也切换成臺湾模式，开始思考我想要写些什么内容传达给臺湾读者。

不只是在日本，我在臺湾和中国也都有多个专栏要写。在臺湾，定期的有《苹果日报》、《报导者》、《转角国际》等媒体，若再加上临时邀稿的话，一个月有十到十五篇左右的专栏。基本上，我的工作有一半是在写专栏，另外一半就是写书、演讲、蒐集资料或进行访谈等，这是我作为一个自由媒体人的日常。

对我而言，专栏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天是不写专栏的。我写文章的方式是有好几篇原稿同时进行，大概花上三到五天的时间。所以，我会从截稿日往回推算，再安排开始动笔的时间，就像好几个专案同时动工的建筑公司一样。

对我的专栏感兴趣的，基本上都是当地读者，所以若无法掌握当地读者的需求，当然就不知道要从何下笔。因为专栏不是专门书籍，如果当地的动态都没办法掌握，当然就写不出要传达给当地读者的内容。这是从我日积月累的经验中得知的。

平时，我每个月固定到臺湾一趟，两个月去一趟中国或香港。有些专栏是在日本写的，也有些是在臺湾等海外写的，但是大部分的灵感都是实际到当地后，把亲身的感受和见闻写出来，而本书就是把这两年内写的一篇篇专栏集结起来的。

本书里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在臺湾发表的专栏文章，剩余的三分之一是从前年在中国出版的《被误解的日本人》里面，挑选出臺湾读者可能关心的主题，收录其中。虽然有些文章里不乏出现「中国人」的用词，主要还是指歷史上的「中国人」，并不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中国人。我相信臺湾广大读者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入的理解，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日本人所思考的中国论。

我认为资讯传递的手段应该往多元化发展，所以用中文发表专栏。有很多臺湾作家写有关日本的事，他们主要是以臺湾人的观点出发，将在日本社会看到的许多断面用文字去呈现，那也是必要的。但是，身为一个理解臺湾读者需求的日本作家，我笔下的日本提供不一样的视野，也值得读者一读。

同时，我在本书里也写到臺湾。我可以拍胸脯说自己对臺湾的理解至少还算是中上程度，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来观察臺湾社会，也可以让读者作为参考。其中，有对臺湾的赞美，也有批评。其实，一个外国人要去评论别的国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一味地写负面评论，首先就很难让人接受。相反地，光是赞美的话，又会被认为是阿谀奉承。其实，人本来就有好恶之分，根本无法做到完全的中立。

我认为必要的是尽可能地陈述客观事实，而且不管是批评也好、赞美也罢，都应该以一颗温暖的心对待臺湾。如果有颗温暖的心，即使是严厉批评，对方也会理解「爱之深责之切」的好意。

在这层意义上，我能够很自信地说，每一次的动笔都是为了臺湾两千三百万人的幸福着想，也希望我的文章能够促进日本和臺湾对彼此的理解，交流越来越热络，让今后的臺日关系宛如同一个国家般更加密切，即使效果只有几万分之一，我也会感到相当欣慰。

我喜欢臺湾，我的工作是把臺湾的政治和经济的动向传达给日本读者，在这个延长线上，很庆幸有机会在臺湾用中文发表专栏，我很感激。而且，还能够集结成书出版，在此致上二度的感谢。

这是我在臺湾推出的第二本散文集（去年时报出版的《日本人默默在想的事》为第一本），感谢时报出版里负责编辑工作的各位，以及刊登专栏的多家臺湾媒体，由衷期盼有更多的读者能够透过本书拓展新视野。

臺日之间的美丽与哀愁

以臺湾为名的商品，在日本获得好评，跟这几年臺湾旅行团的热潮，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日本人的观光地点，在亚洲的首选就是臺湾。

福原爱的中文为何令人佩服？

二○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桌球代表选手福原爱和臺湾桌球代表选手江宏杰在东京举行记者会，宣布结婚喜讯。翌日，随即到臺湾举办记者会。我在臺湾的电视上看到她对答如流的中文，整场的表现令人惊艳。本来就有中文底子的她，这一次在镜头前更加流畅自然，可以感受到她有备而来。

福原所学的中文是中国东北地方的中文，即使同样是中文，可是和南方的发音、语感有细微差异。

她在全心投入桌球运动的同时，在那个年龄能够克服语言的隔阂，以外国人来说相当不简单。我想除了与生俱来的语言天分，她透过丰富的海外经验，也深刻意识到语言带给人的印象非常重要。

她的聪敏，只要访问过她的人都有同感吧。言谈间绝不攻击他人，也不中伤他人，经常是对自己的反省和不满，以及谈到今后目标时的淡然，一贯维持着风度翩翩的态度。

比赛输了，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比赛赢了，就归功给队友。在之前的里约奥运中，日本全国观众再一次目睹了福原的大气。

然而，对比披着日本战袍的福原在日本观众前总是战战兢兢的模样，偶尔透露着为国争光的悲怆感，当她说中文时，给人的印象却似乎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面对中国的中央电视臺时，她能够掺杂一些玩笑话，很开心地和媒体分享和丈夫的交往细节，感觉她很沉浸在说外文本身的喜悦中。

几年前，我採访过她，当时我问她是怎么学中文的，她说几乎是在当地的交友圈里耳濡目染下学会的，这如果不是本身对说外文有兴趣的人，应该办不到吧。

她是所属中国东北地方的辽宁省渖阳的专业团队，在那里接受训练也参加比赛。而她所学到的也就是「东北腔」（东北口音）的中文。

接受中国电视臺的採访或是上节目时，经常可以听到她东北口音的中文，那时可爱的模样也是她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东北口音的中文特徵是捲舌，好像每一段句子的语尾都会有捲舌「er」的音，让人听过一次就难以忘记。听说在里约奥运的採访新闻里，福原爱也是说东北口音的中文。

可是，在臺湾举办的记者会里，她几乎没有发捲舌音，而且尽可能地用贴近臺湾人的中文说话。虽然还是有很多臺湾人感觉到有一点「大陆人的中文」，但并不引以为意。语言的听和说，是很主观的东西，东北口音的另一个特徵是声调「一声」比较重，可是记者会上她的中文声调很平稳。

这是因为福原认为应该使用适合臺湾的中文，或是和臺湾人的丈夫在交往过程中自然而然学习到的，可能只有她本人才知道。

如果这个是她本人有意识地去加以区分的话，也意味着她瞭解到在「臺湾是臺湾、中国是中国」的本土意识蔚为主流的臺湾社会里，臺湾人对中国抱持的复杂情绪吧。

也或许是有人提供建议，但她能在记者会上有如此表现，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最初学习到的语言，包括地方口音，会影响人的一辈子，就算她说是在和丈夫的日常对话里学到臺湾中文，要做这样子的「切换」实在不简单。

我经常这么认为，学习新的语言需要好奇心、敏锐度和毅力。

福原爱能够将东北口音的中文说得如此流畅，也是因为她本身的资质吧，而且记者会中所说的臺湾腔中文，应该也是她在和丈夫交往这段期间迅速学到的，可见得福原学得很快。

以此为前提，我们必须瞭解中文的复杂语言环境，这也是日本人常常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

中文是由普通话（标准话、中国官话〔Mandarin〕，在臺湾称为北京话）的各个地方口音和歷史上民族移动过程等，融合了多种方言而形成的双重结构。前者「地方口音」的世界可以区分为东北腔、北京腔、四川腔、山东腔等，各个地方皆有不同的特色，就像日本有关西腔、东

北腔、九州腔等一样的道理。光是这些口音，对我们外国人而言，在中文听力上就必须耗费一番功夫。

另一方面，在香港和广东省说的广东话，或是上海话、福建话（或称为闽南语、臺湾说的臺语）等方言，在文法和语汇上都保留着和普通话的共通性，但是发音上大不相同，对于分属不同集团的人来说，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感觉跟外文没有两样。

学习方言这件事，像是香港的广东话或是臺湾的臺语（不像广东话那么常需要说），只要到当地工作或生活，就经常需要用到，但是真的要达到流利交谈的程度，以日本人来说，至少需要花上几年吧。

福原在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时的「我是福原爱」，其中的「我是」是用臺语的发音「goa:si」，而不是普通话的「wo:shi」。对臺湾人来说，光是这样子听起来就相当亲切，而且会场上的记者在那瞬间也是一阵骚动，笑声此起彼落。

她的用字遣词里，有几个句子让臺湾人听了心花怒放。例如「我嫁给臺湾人」等，听在臺湾人的耳里，当然很感动。尤其是臺湾人对日本女性怀抱憧憬，近年来的偶像剧或电影里，内容经常是描写臺湾男性和日本女性的恋爱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原这句话刚好完美地正中臺湾人的想望。

她甚至也使用了「老公．老婆」的称呼。中文的传统说法是「先生．爱人」、「丈夫．妻子」，而「老公．老婆」的说法在香港和臺湾是比较常见的亲暱表现，尤其在臺湾使用的层面相当广泛。或许有些人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以笔者的感觉来说，在中国的记者会等正式场合，几乎不用「老公．老婆」来称呼，若这么用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俗气。

然而，在普遍使用「老公．老婆」的臺湾记者会上，福原用得恰如其分，不禁令我感到相当佩服。

即使是日文，在关西或九州，如果有外国人能够说一口道地的方言，相信也会受到当地民众无条件的喜爱。如果在臺湾，第一次就用东北口音的中文和媒体朋友见面，会不会引起反弹或造成距离感呢？记者会前，我不禁有所担心，但事后证明是我杞人忧天啊。

福原爱在记者会里表现出的「语言」敏锐度，对于在最前线的国际社会上穿梭的生意人和外交官来说，在语言沟通上相当值得学习。福原爱在今后的臺日、中日交流里，应该会成为日本的珍宝。

郭台铭为什么被日本「讨厌」？

外国企业经营者来到日本时，大多被当作英雄对待。过往的例子，包括巴菲特、微软的比尔．盖兹、苹果的贾伯斯。但这些人里面，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像郭台铭这样，负面资讯转眼间便扩散得满城风雨。

郭台铭可说是对垂死企业夏普伸出援手的「救世主」，日本社会原该对他有更多感谢与欢迎的。那么为何郭台铭的负面形象，在日本会以如此不甚公道的方式广传开来呢？在此，我将试着针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之前，我在大坂一间饭店的咖啡厅，等待采访对象。那时，一个年过中年的男人正在讲手机，模样看来是企业经营者。

听见他说「鸿海……」，让我凝神细听起来。「那个叫郭台铭的人，不就是中国政府的奸细？他不是说什么要把尖阁列岛（钓鱼臺群岛）买下来吗？中国会把夏普的技术全部偷光光吧？日本政府这样袖手旁观真的恰当吗？」听着听着，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同时，再次察觉，这名男性的话，其实有很深刻的意义。

男人的话里，提到中国政府的奸细，还有技术会被中国偷走等等，都是没有根据的错误资讯。郭台铭的确说过要「买下尖阁列岛」，但那仅是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无法确定有几分认真的程度。男人的认知几乎能说全是误解。而问题关键，便在于为何这样的误解会广为流传？

我认为，这是由于鸿海在日本言论空间里欠缺发言权，因而产生的问题。

夏普的未来该如何是好？这个问题，起初由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交由革新机构买下的方案最为有力。此做法主要是念及把夏普这样的大型企业拱手让与外国太可惜。既然经济产业省的存在，是为了振兴日本企业，这个方案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另一方面，夏普内部对鸿海也分裂为贊成派与反对派两方。众所周

知，町田前会长是贊成派，片山前社长是反对派，而当时的高桥社长，姑且可算作反对派吧。反对派持续发布负面消息，说「郭台铭董事长是没有诚信之人。」这个说法需回溯到二○一二年鸿海对夏普的投资案，当时鸿海以夏普股价急坠为由，没有依约支付说好的资金。如此这般，透过夏普内部反鸿海派或经济产业省放出的负面资讯，跟深植于日本网路空间的「反中右派」一拍即合，使「仇郭台铭」的讯息一口气流入世间。

郭台铭的确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物，更堪称超级独裁的企业经营者。然而，他让鸿海从一个小型的工厂，进化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企业之一，干练的经营手腕毋庸置疑，乃一代英杰。平心而论，说这样一号人物是「中国的奸细」、是「没有诚信之人」云云，只要稍稍想过就知道是无稽之谈。

不过，问题关键在于日本没有一个窗口，能把郭台铭或鸿海的正面资讯提供给媒体，不论是对这场收购案的想法，或鸿海将如何善用夏普，还是郭台铭是何许人物、经营观点又是如何等等，都无法传达出来。一般来说，日本报章杂志的经济线记者，都会去採访经济产业省或夏普，而从那里得来的资讯，很多是鸿海的负面消息，这是无可奈何的。另一方面，来自鸿海的声音与讯息却极为有限。

特别在日本，记者会只是一种仪式，真正有新闻价值的资讯大多透过「记者恳谈」流出。然而对于鸿海，不论是在臺湾还是在日本，日本媒体记者几乎都没有机会得知「鸿海其实这样想」或「郭台铭董事长真正的想法是这样」。

当然，语言隔阂也是一道高墙，日本记者很难清查臺湾过往的报导。

不像苹果拥有品牌知名度的鸿海，在日本人脑中的预备知识几近于零，也因此无法避免愈发加深的误会。那么，要阻止误会扩散该怎么做？鸿海又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们必须考量到媒体和记者的本质。以媒体业的习性而言，记者必须尽可能从多元的新闻来源中收集资讯，付出种种心力以求接近真相，这点无庸置疑。可是，记者也是人，也有截稿日。记者不能靠想像杜撰

内容，因此当记者只能用手头上的资讯写报导时，只好倚靠从夏普与经济产业省得来的鸿海情报。这样一来，内容无可避免地对鸿海不利。

对于这一点，鸿海需要提供不同的观点，但日本媒体却没有与鸿海接触的方法，也不可能获得鸿海主动接洽。于是新闻报导，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对鸿海不利的风向。

如今，鸿海收购夏普一事成真，接掌夏普的经营大权。这意味着日本的大型制造厂商首次纳入外国企业麾下，夏普今后发展将持续吸引关注。我衷心期望，能创造一个管道让鸿海以及夏普新经营阵容的想法，有机会尽可能以复合式的声道提供给日本媒体和读者知悉。

毕竟夏普是国际名牌制造大厂，不是鸿海过往惯行的「代工」一路，必须重视与社会的对话交流。虽然这对鸿海来说，几乎是要求它改变固有的企业文化，也就是打破与媒体的往来压缩到最小限度的传统。

但当此之际，我还是建议鸿海「入境随俗」。我相信，这是增加鸿海在日本的朋友，且让日本不再讨厌郭台铭的一条最明智的捷径。

为何日本人也开始迷上臺湾环岛？

在海外，绕行臺湾一周的「环岛」，愈来愈受到关注。近年来，虽然「环岛」热潮生于臺湾，但「环岛 1 号线」逐渐完备，加上旅行社的环岛行程兴起，都让外国人来到臺湾观光时，多了「long stay」的新选项，未来可能更是备受瞩目。

二○一七年十月底，我也进行人生第一次的自行车「环岛」之旅。

我从臺中出发，每天骑约一百公里。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出发，傍晚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吃完晚餐，洗好衣服，就去睡觉，彷佛高中运动社团的集训生活。

环岛时，基本上每天的生活，就是除了骑车之外，什么也不去想。对于固定撰写专栏的媒体，我也多半告知他们，这段期间无法供稿。这次环岛，是三个月前就订好的，但这段期间，中国十九大和日本众议院选举接连发生。对我这个媒体人来说，就像是失去了两个「旺季」，但我大胆选择了环岛旅行。

原因就是，我想起叙述臺湾环岛的电影《练习曲》中，主角阿明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要报导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日本众议院选举，将来还有机会。但是，四十九岁的自己，如果错失这次机会，就再也无法在五十岁来临前去环岛了。人生难料，也许明年就会生病，再也无法骑上自行车也不一定。离世之前，我会想起的是我报导过习近平和安倍晋三，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环岛，答案应该很明显吧。

二○一六年十一月，我也参加了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骑遇福尔摩沙」（Formosa 900）单车环岛活动。但我的书在日本得奖了，必须出席颁奖典礼，于是只能从臺北骑到屏东，只绕了臺湾半圈。所以过了将近一年后的这一次环岛，才真的是「美梦成真」了。

这次，巨大集团的前ＣＥＯ罗祥安组了「追风骑士团」，庆祝他的第十次环岛之旅，我也成了其中一员。团里的日本人包括臺日混血作家

一青妙、岛波海道上靠近广岛县的尾道市市长夫人平谷纯子女士，以及前行政院院长江宜桦这样特殊的团员。出发前，罗祥安在另一个行程受伤了，所以由夫人吴春兰代为出任团长，她也是曾经环岛六次的老练车手。罗祥安也搭乘保母车全程同行，不断为团员加油。

此外，还有骑乘相同行程、相同路径的中国团，以及同样从臺中出发，但反方向绕行，再同一天回到臺中的日本地方政府员工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认为「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坚持到最后，就会自信大增。」我也是一样，除了完成环岛之外，还有我以排名第三的速度，登上最困难的屏东寿卡（标高约五百公尺）这样的美好回忆。

最感动的是，我们沿着东海岸从臺东大武骑到花莲市的那两天，听见无数人对我们说「加油」。对于在东海岸苦战强力东北季风的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在日本，除了特定节日以外，很难想像街上民众会为不认识的自行车手加油。我深刻地感受到，臺湾隐藏的魅力：「人情味」。

就连臺湾人可能也想不到，外国人会把「认识臺湾」的环岛行，视为充满魅力的旅行方式吧。但我们日本人一年造访臺湾好几次，臺北几乎是玩到不想再玩，许多人也都去过臺中、臺南、高雄、花莲、臺东、宜兰等城市。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是把这些城市串连起来。

可以用一场环岛旅行，让人完整体验臺湾，无论时间或花费都很值得，更重要的是，还有一般旅行难以获得的「成就感」。

我深切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于「环岛」的关心明显增温。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展开的「骑遇福尔摩沙」，六成参加者都是外国人。这也是第一次有日本团队报名参加。二十五个名额，瞬间就满了。二○一七年十一月，一青妙首次在日本出版的环岛专书《「环岛」周游臺湾的旅行》也刚问世。

在日本，大家突然知道可以到臺湾环岛了。最近，我也常听朋友问起「要怎么做才能环岛？」

环岛，是臺湾人的梦想。这几年，臺湾本土意识高涨，「好想瞭解我们的故乡」这样的想法逐渐普及，可能也和环岛热潮有关。臺湾人总说「身为臺湾人，一生至少要环岛一次。」之前，一群有着「不老骑

士」称号的高龄长辈，也才刚成功挑战骑机车环岛，当作人生最后的梦想。

要让臺湾人和日本人共享这个梦，并不困难。臺湾在东日本震灾中提供的慷慨援助，让日本人心生感动。此后，日本人对臺湾的好感及好奇心就大幅提升，对于臺湾一切全盘接受的「哈臺族」也急速增加。

让旅客透过观光深入瞭解臺湾，这样的梦想一旦实现，就有极大的潜力。要完成自行车环岛，至少也要九天八夜，对于难以请长假的日本人来说有些困难。但若将自行车搭配火车组成「两铁」套餐，就可以在一週内完成环岛，也可以把东海岸和西海岸分成环岛上下部，分两次完成。

环岛是发展臺湾观光的未来可能性。在环岛的过程中，臺湾的一切，都是观光商品，这是很少见的案例。臺湾政府应该把「环岛」视为观光的品牌之一来推广。

过去，巨大集团的创办人刘金标受访时，以中文提到「上瘾」，他反过来问我，该怎么用日文说明。我想了一下，就用最近日本流行的一个词「迷上」（はまる）。虽然刘金标从小受日本教育，但这是以往没有的新词汇。从那时起，刘金标每每碰到日本人，就会用日语说自己「迷上自行车（自転车にはまる）」，让对方笑了出来。

臺湾人迷上了环岛，下一个迷上（はまる）环岛的，就是日本人了。

排队吃一兰？

「春水堂进军大坂」，这是二○一七年六月中旬，日本媒体大幅报导的新闻。最具影响力的雅虎新闻，也放在首页推播。最近，对日本人来说，「春水堂」变得相当熟悉。

春水堂标榜是珍珠奶茶的发源地，受到消费者欢迎。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为止，春水堂在臺湾有四十八家店铺。在大坂开店后，在日本也有十间。二○一三年，春水堂进驻东京的一级战区代官山，要排队三小时才能入场，一战成名。

走出海外，让消费者大排长龙的，不会只有从日本来到臺湾的拉面店「一兰」了。

新闻写着：「春水堂点火，臺湾甜点热潮在日本发烧」。这样的报导，也不能完全说是夸大。

还有Tirol推出的「臺湾甜品」。日本人都知道，Tirol是「一口巧克力」的制造商。「臺湾甜品」里，有凤梨酥和珍珠奶茶两种口味，一盒六个。很快就卖到缺货，成为人气商品。

我发现日本市场上，有许多冠上「臺湾」两个字的商品。以前，日本的「臺湾」品牌总给人些许二线商品的感觉，现在却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

我们该如何解读「臺湾热潮」的现象呢？请容我试着举例说明。

日清食品和7-Eleven共同开发的「臺湾面线」，正式开卖。这款「臺湾面线」，让臺湾的平民小吃「面线」在日本受到重现。面线，是用小麦粉做成细细的素面，煮到黏稠再配上柴鱼高汤熬煮，撒上香菜等香料来吃的臺湾小吃。对于跟我一样在臺湾住过的人来说，面线实在是太贴近日常生活了。想不到会在日本看到这样的商品，老实说让我大吃一惊。吃面线的感觉，就像是日本车站附近，可以站着吃的荞麦面一样。

试吃了日清的「臺湾面线」之后，感觉不错，可以说是尽力呈现出

面线的味道。很多人知道，日清的创业者安藤百福，是在臺湾出生的泡面发明人。日清的公关说，「臺湾面线」和安藤百福没有关系，让我有点失望。

当初是一群日本女性到臺湾旅行，吃了面线觉得很美味，日本市场可能会接受，就开始企画这个商品。

像这样以臺湾为名的商品，在日本获得好评，跟这几年臺湾旅行团的热潮，应该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日本人的观光地点，到亚洲的首选就是臺湾。以往到中国、香港、韩国的观光热潮，已不復见，现在可以说是臺湾独红的状态。

最近，要预约飞臺湾的班机也很困难，人非常多。在日本很受欢迎的女性杂志《*an.an*》、《*CREA*》、《*HANAKO*》、《*Oz MAGAZINE*》都接连推出详细的臺湾特集，据说销量不错。和臺湾有关的内容是有市场的。

此外，以臺湾为名的产品，在餐饮业特别受到欢迎。我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料理的餐厅，会挂上「臺湾料理」的招牌。我也听说，以前有些店挂的「中华料理」看板，现在改成了「臺湾料理」。虽然店长是中国人，但似乎还是研究了一下，推出臺湾料理的菜单。

比起一般的「中华料理」，「臺湾料理」好像对顾客来说更有吸引力。我越来越觉得，中华料理之中，臺湾料理这个类别，正在慢慢变成一大主力。后来还有「新竹料理」、「高雄料理」、「花莲料理」这些更细分的臺湾料理，开始出现。

不只春水堂，以凤梨酥起家的微热山丘，也是在东京的一级战区，卖出好业绩。这些都是在臺湾接触到臺湾美食的人，回到日本之后想着「好想再吃」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的去处。

我想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臺湾干拌面」，据说，起初是名古屋的「臺湾拉面」。绞肉加上韭菜等炒出辣味，再放在拉面上当配料。其实臺湾没有这样的吃法，这是从名古屋一间臺湾人开的拉面店「味仙」开始的。结果，因为在地食物的热潮影响，「臺湾干拌面」就成了名古屋的代表料理，知名度大增，还做成泡面。

越来越多日本人误以为放了辣绞肉就等于「臺湾味」，日本各地的拉面店也开始推出「臺湾干拌面」。

后来，有些人会在店里介绍臺湾料理、臺湾「文创」商品，找来臺湾歌手和乐团，每个月在日本各地举办「臺湾嘉年华」、「臺湾美食祭」等，不同名称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据说光是入场就要等上好几个小时。

臺湾热潮的根源，是日本社会对臺湾的好感度增加。可以肯定的是，臺日双方关系深厚。特别是东日本地震的时候，臺湾捐款两百亿日圆送到日本，这样鉅额的援助资金，也让一般日本民众对于臺湾的好感度大幅提升。在那之前，臺湾可以说是隐藏在「中国」的影子之中，但现在九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全面主打臺湾，也可以让消费者感觉亲近。

跟臺湾人聊起日本的臺湾热潮，大家都不相信。大家都觉得，野岛刚喜欢臺湾，所以一定是把臺湾人喜欢听的话，说得很夸张。

但请你相信，对现在的日本来说，臺湾真的是很棒的品牌。我不好意思自夸，但包括我写了跟臺湾有关的书也都卖得不错。坦白说，各位有意进军日本市场的臺湾食品业者，现在就是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喔！

臺湾便当真的比日本美味吗？

日本过的是新历年，所以每到了岁末年初的过年期间，多家电视臺会停播一些固定节目，一齐播放所谓的「特别节目」。近年来，日本的电视臺因为广告收益锐减或是观众流向网路等因素，在财务上陷入困境，所以花上大手笔的制作费到国外出外景的节目也大幅减少。然而，唯有年底的特别节目，电视臺会推出一些到国外拍摄的外景节目来提升收视率。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明显的是有很多节目纷纷到臺湾出外景，可见这几年在日本掀起的臺湾风潮方兴未艾，依旧吸引许多日本民众注意，甚至听说只要标题出现「臺湾」，收视率就会增加，反倒是以往热门的韩国、香港和中国的外景节目几乎都不见踪影了。

其中东京电视臺的节目《未来世纪ZIPANGU》介绍了到臺湾展店的日本便当店。虽然这家便当店引进了日式的便当风格，销售成绩却停滞不前，令人伤透脑筋。大部分的日本料理在臺湾都非常受欢迎，像是拉面、炸猪排、天妇罗、日式烧肉、日式汉堡等，几乎都是大排长龙，或是在臺湾迈向稳定成长的阶段。但是，唯独便当这一项，迟迟无法胜过臺湾当地的便当业者。

本来，日文里的「弁当」一词，语源是来自中国南宋时期的「便当」，意思是「便利的东西、方便」。之后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转变为方便用膳的意思。

臺湾的便当文化是在日治时代传入的，今日大家熟悉的臺式便当是配合臺湾人的饮食习惯逐渐改良而成的。包括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臺湾的「排骨便当」和「鸡腿便当」，尤其每次搭乘臺湾高铁时，都很期待买「臺铁便当」（抱歉，不是高铁便当）上车享用的时刻。

要说臺湾便当哪里好吃的话，就是主菜分量大，配菜也不逊色，重点是温热食用。以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很羡慕臺湾便当的「主菜豪华主义」。像日本具代表性的「幕之内便当」，大概有十样不同的配菜，菜色多但分量少，并没有特别以哪一样作为主菜，每次吃完总觉得不过

瘾。虽然在日本也有像鳗鱼便当这样有主菜的便当，但往往只有放蒲烧鳗鱼和腌渍物，却没有任何诱人的配菜。就这一点看来，臺湾便当除了鸡腿、滷排骨、爌肉等主菜之外，还有青菜、滷蛋、腌渍品等丰盛的配菜相伴，不论味道或分量皆令人非常满意。

仔细想想，透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可以窥见不同国家或是民族的美学意识和氛围。日本的便当很注重外观，喜欢整齐排列，这方面反映了日本人一板一眼的国民性格。好不好吃当然很重要，但是同样地在配色或是菜色数量等细节上也很重视。换言之，就是日本便当比较倾向形式主义。

另一方面，虽然臺湾的便当文化是源自日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分量要够」或者「以好吃决胜负，外观是其次」，传达出臺湾人偏向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日本的形式主义形成对比。

要说臺湾便当的特色，像是自由发挥度高、大胆创新、追求美味等特点尤其打动日本人的心。最近，日本的百货公司地下街等地方，只要一推出臺湾便当的限定贩卖活动，就立即被抢购一空。来自日本的「摩斯汉堡」、「一兰」、「一风堂」等知名的饮食连锁店来臺展店，大受欢迎。如果臺湾卖珍珠奶茶的「50岚」或「永和豆浆」等连锁餐饮店到日本展店的话，应该也会相当成功，其中我最看好的就是「臺铁便当」，有朝一日进军日本的话，想必会在日本掀起便当革命吧。

臺湾料理和米其林风马牛不相干

关于臺湾料理的餐厅没有很多间入选首届《臺北米其林指南二○一八》（*Michelin Guide Taipei 2018*）一事，在臺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可是，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对臺湾料理没有入选米其林而感到高兴。因为臺湾料理和米其林指南的评鑑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码子事，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

有个长年在臺湾生活的日本朋友，对臺湾饮食的评价是「越便宜，越好吃」。我虽然不是全面认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这样的想法。

在臺湾，五十元的阳春面会给我带来味觉的感动。可是，老实说，在日本三百日圆的立食荞麦面，虽然便宜但一定不大好吃。日本的食物价格和味道是呈正比关系，但在臺湾就不见得了，经常可以享受到物超所值的美味。

以我的经验法则来说，在臺湾一个人的消费要付一千元（臺币）以上的中菜料理的店家，虽然不至于不好吃，但是无法获得和金额相符的满足，也就是ＣＰ值不高。例如，之前，我到臺北市大安区的巷弄里，一间口碑很好的臺湾创意料理餐厅用餐。这家店的客人可以边用餐边喝红酒，而且，环视店里的装潢，摆放着很多艺术性的装饰，营造出非日常性的空间感。可惜的是，两个人点了四道菜，味道却是一般般，有点遗憾了。

但是再过几天，我在臺北的大安路和信义路交叉口附近的小海产店用餐，三个人点了炒箭笋、香肠、蛤蜊汤、葱爆小卷、炒面这五样也才九百元，而且不管哪一道料理，都是好吃到让人差点流眼泪。总而言之，三、四个人一起吃才花费一千元左右的店家，满足度很高。正是那样子的店，才是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臺湾料理的真髓。

我在日本也会偶尔去那些获得米其林星星的餐厅用餐，基本上那些店为什么能够获得美食评鑑的青睐呢？米其林官方举出的有烹调技巧、

料理中展现的个性、味道的稳定性等项目。但是如果让我个人来解释的话，米其林很重视的是料理的精緻度和非日常性。

在日本，入选米其林餐厅的有很多是寿司店，在臺湾也有两家寿司店获得星星。寿司本身重视的是鱼要怎样吃才美味，以及追求白饭和鱼的极致协调性，是相当讲究精緻度的料理，这也是和食的特徵。就非日常性的层面来看，法式料理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法式料理本身是为了演出非日常性而精心设计的料理，打开味蕾的餐前酒和前菜，给予满足和感动，再以甜点来个完美的收尾，整个套餐一道道吃下来，感觉就像偶像剧里的桥段。

相反地，臺湾料理的本质就在于日常性。若是为了入选米其林而捨弃掉臺湾料理本身具有的日常性，追求非日常的感觉，这是本末倒置，也很难成功的。

臺湾料理是臺湾的风土、本地食材、气候等因素相加之后而形成的。在歷史上，闽南料理、客家料理、日本料理、由外省人带入的中国各地料理等，随着时间慢慢融合而成了臺湾料理，这些过程相当程度反映了臺湾这个移民社会的复合性。最重要的是，其料理里面也融入了臺湾人的包容性和人情味，但如果要追求精緻度，这个部分有可能要割捨掉。

不论是精緻度或非日常性，都与臺湾料理的特性相悖。我个人认为，热呼呼的菜脯蛋比法式料理里的任何一道蛋料理都还要美味。就算臺湾料理的餐厅没有米其林指南的推荐，对我们日本人而言，也是完全无所谓的。

臺湾道路简直和「战场」无异

二○一七年九月，《西日本新闻》臺北支局长中川博之在深夜穿越臺北中山北路时，不慎遭计程车撞上，伤重不治。在驻臺湾特派记者里面，中川的「爱臺湾」是出了名的，跑遍臺湾各地去取材，经常在报章上发表和臺湾有关的文章。他的骤逝令人感到相当遗憾。

因为中川并没有按照规定行走在斑马线上，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中川的过失较大。暂且不论事故情况如何，据统计，臺湾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达两三千人，而中川不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之前，日本警视厅发表了二○一七年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共三六九四人，创下战后的最低纪录，与有一万六千人死于交通事故，被称为「交通战争」的一九七○年相比，少了将近五分之一左右。当时，随着日本的家用汽车迅速普及，那些被称为暴走族的年轻人做出很多飙车竞速等危险驾驶的行为，因此日本全国进入「汽车恶霸」的交通黑暗期。

之后，日本的警察和学校为了减少交通事故，接近半个世纪以来致力于交通政策的宣传和改善。我是在一九七○年代接受初等教育的世代，那个时候校长会在小学朝会时，叮咛学童：「你们要小心，车子就是狮子。」上学和放学时，都会有热心家长轮流站在车流量多的路口指挥交通，保护学童过马路。

日本和臺湾的人口比例大概是五．五比一，臺湾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远比日本高出许多。臺湾的道路状况就和一九七○年代的日本相同，简直与「战场」无异。为什么臺湾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会如此高呢？已经有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做过诸多讨论，我只是一介门外汉，没有立场提供什么政策建言。只是从一个用路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臺湾汽车驾驶人的态度，和日本或其他国家相比，真的有点傲慢了。

举例来说，虽然这个行为不太恰当，但很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会一边看手机一边走斑马线，可是臺湾人很少会这么做，理由只有一个，因为在臺湾的马路上使用手机非常危险，相反的在日本其实不会那么恐怖，

存在这样的差异。这个背后当然攸关车子和行人的优先顺序问题，日本社会里行人的地位高于车子，可是在臺湾却完全相反，感觉车子凌驾一切。我在臺湾走斑马线时，也绝对不使用手机，因为不管是机车或汽车对行人都相当不客气，每次都以那种「别挡路」的压迫感逼近，非常不礼貌，我曾经因此转过身瞪一眼，却被按喇叭警告。可是在日本，如果是汽车驾驶人被行人狠狠一瞪，反而是自知理亏，态度也会退让几分。

臺湾的汽车驾驶人之所以傲慢，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路权有很大的误解。道路并不是为车子而开闢的，而是为了方便人的移动而存在。但是，他们却理所当然地认为道路就是车子专属的空间，这完全是错误的。人会开车、骑自行车、骑机车、步行等，使用不同的交通手段。其中，最脆弱的就是人本身，最坚固的是用板金打造的车子，因此在使用道路时，应该优先礼让最脆弱的行人，这是基本的尊重。本来，强者的一方就必须懂得谦虚。

臺湾的社会伦理、尊重生命以及人权观念都相当进步，但是很遗憾的，唯独交通问题似乎还残留着社会病理和落后现象。我诚挚地希望臺湾的汽车驾驶人，能够「谦卑、谦卑、再谦卑」，这可能是降低臺湾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并洗刷恶名的方法之一。

赈灾外交的理想型：「报恩的连锁效应」

二○一六年四月，日本熊本县发生了一连串地震，在国际上最早伸出援手，也是最慷慨解囊捐助的，就是臺湾。现在，一旦发生强震，臺日双方就会像这样发挥互助精神，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在赈灾外交里，臺日间已经形成了「报恩的连锁效应」。

熊本发生初震后不久，当时臺湾的下任总统当选人，同时也是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就率先表示：「我们愿意尽棉薄之力，陪伴臺湾的朋友—日本，度过难关。」

其实，离政权交替还有一个月，在这个时间点，蔡英文比现任总统马英九早一步採取行动，或许是背后有她的政治判断。之后，马英九政府宣布要捐款一千万日圆，不过，在网路上有人批评「太少了吧！」而十六日的主震使得受灾情况持续扩大，当时政府也临时决定追加五千四百万日圆的捐款。

另一方面，当时还处于在野党身分的民进党也决定由党费支出一千万日圆赈灾，随后民进党的地方县市长也起而响应，具代表性的高雄市长陈菊、臺南市长赖清德、臺中市长林佳龙、桃园市长郑文灿也都以和日本有交流等理由，捐出一个月的所得协助赈灾。

还有，无党籍的臺北市长柯文哲也透过其拥有高度关注的推特和脸书，用日语慰问日本的受灾民众。

如上所述，臺湾在第一时间对日本的援助完全是不遗余力，而日本民众也在网路上有很多留言：「臺湾才是真正的朋友啊！」「真令人感动」「我想哭」「爱臺湾」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臺湾的感激之情。

想当然耳，臺湾对熊本地震的协助和之前的臺南地震有关。

二○一六年二月，在高雄美浓发生的地震引起臺南永康的维冠大楼倒塌意外，当时日本政府和民众也都给予大力援助，令许多臺湾人相当感动。可是，日本对臺南的赈灾其实是为了报恩，感谢臺湾在二○一一年的三一一大地震热心相助，对日捐款是世界上排名第一，当时臺湾民

众几乎是利用小额的街头募款，就募到两百亿日圆，相当惊人的金额。

即使是那个时候，臺湾人的慷慨解囊又可以追溯到日本在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对臺湾的援助，当时在国际上是日本率先派遣救难队，而且也捐款和提供组合屋帮助灾民，这样的恩情，臺湾人民牢记于心。

又在更早之前，那就是一九九五年的神户大地震，臺湾派遣的救难队也踊跃参与救灾。总之，这二十年当中，臺湾和日本的每一次赈灾行动，几乎都是出自于感谢对方上一次的帮忙，因而形成了无限报恩的连锁反应，也是臺日间透过赈灾建立起的新外交模式。

其实，臺湾和中国之间，也曾经有机会因为赈灾而建立起友好关系。二○○八年，四川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当时的陈水扁政府捐出二十亿臺币赈灾，并公布捐款帐号，也派遣了救难队，还有臺湾的企业家也陆续有巨额捐款，民间的募款活动也很踊跃。

但是，复杂的两岸关系牵涉到双方的主权承认问题，因此未必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像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当日本要捐款给臺湾时，中国甚至表示：「臺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赈灾款应该先到我们这里」，这样的发言引起臺湾人极度反弹。

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其实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争议。

臺湾对三一一大地震的赈灾捐款远远超过了中国，然而在震灾一週年的追悼典礼上，当时日本民主党的野田首相却以外交上的一中原则，在献花名单中把臺湾代表排除在外，指名中国代表上臺献花，此举遭到日本舆论强烈抨击。隔年，上任的安倍首相邀请指名臺湾代表献花，而中国方面则以拒绝出席以示抗议。

这样的「赈灾外交」，可以说是继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和李登辉所代表的接受日本教育世代主导的交流模式之后，战后臺日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潮流。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臺湾和日本经过很复杂的外交波折，在一九五二年签定中日和平协定，之后国民政府和日本确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尤其是，当时蒋介石对日採取的「以德报怨」态度，在日本方面不断地

被强调，大概在一九八○年代之前，这句话一直是臺日友好关系里的关键词。

接着，两蒋时期结束后，李登辉上臺，他靠着流畅的日语能力和深厚的对日理解，在日本政坛形成一股亲臺势力，他所推动的臺湾民主化和「臺湾的悲哀」的歷史定位，让不少日本人认为支持臺湾追求自由和主体性是一种日本人的使命和责任。

虽然二○○○年李登辉结束执政，可是加上陈水扁的两届任期和马英九的第一届任期，共十多年的期间，李登辉提出的臺日路线一直是主流。

近年来，「赈灾外交」终于成为第三个臺日关系的关键词。臺湾和日本同样位于地震带，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发生严重的地震，造成重大灾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很自然的给双方提供「报恩」的机会。

从赈灾外交的观点来看，日本和臺湾的互助，尤其在二○一一年以后特别显着。虽然依据受灾程度，需要的援助也有所不同，但是彼此产生了类似共同体的情感，相互依存和关心对方，甚至笼罩着一股「如果不努力援助臺湾（或者日本）的话，就会受到大众舆论的抨击」的氛围，无形中成为某种压力。

但是，我想这样的互助应该被正面看待，尤其是政治层面上也认同这样的舆论压力时，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发挥了健全的机能，并非单纯的相互取暖而已。

每一次的地震，就更加深了臺日情谊，中国目前对这样的状况尚未明显表态，但是不难想像政府高层应该是如坐针毡吧。

然而，面对基于合情合理的「人道关怀」而变得亲密的臺日关系，中国政府也知道如果想尽办法从中作梗的话，反而会使自己陷入窘境，在国际上难以立足，所以才选择默不吭声吧。以现阶段来说，看着臺日间越来越紧密的赈灾情谊，中国政府却是一筹莫展。

作为命运之钥的户籍──川岛芳子、李香兰，以及莲舫

之前，因为臺湾电影《太阳的孩子》的上映活动，我受邀到访了日本的长野县松本市（信州地方）。松本市位在标高六百公尺的地方，照理说应该比东京还要凉爽，可是我到访当日的气温超过三十五度，在这种挥汗如雨的天气下，我来到松本市郊外的川岛芳子纪念馆。

川岛芳子是中日近代史上的一位女豪杰，偶尔穿着军服的帅气模样，使她也有「男装丽人」的别称，她为了满州国建国而四处奔走，也被誉为「东洋的贞德」。二战结束后，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在一九四八年以汉奸罪的罪名被处以死刑。

川岛芳子并没有日本人的血统，她的本名是爱新觉罗显玗，汉名是金璧辉。一九○七年在北京出生，是清朝皇族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六岁时，被送给与肃清王有深厚交情的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随后与养父母前往日本接受完整教育，也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就读，因此在松本市除了纪念馆以外，也有川岛芳子的墓碑和故居等的史迹。

这个纪念馆里面，展示着川岛芳子的照片和书籍，以及关于芳子的各种纪录。其中，有封信件是在牢里等待死刑处决的川岛芳子，拼命恳请养父川岛浪速寄送日本的户籍誊本，这几行字吸引了我的目光。

为什么川岛芳子会要求户籍誊本呢？这是因为汉奸罪只针对「中国人」而成立，而川岛芳子是中国人却背叛了中国，协助日本人的侵略行动，所以符合汉奸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川岛芳子是日本人的话，就有无罪释放的可能。因此川岛芳子请求法院重审，户籍誊本成为她逃脱死刑的一线希望。

我想起了由梅艷芳和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川岛芳子》（一九九○年），一开头是法庭审问的画面，对于法官厉声喝斥是否认罪时，川岛芳子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实际上，川岛芳子拥有过人的语言才能，中、日文俱佳，时为日本人、时为中国人，在动

盪不安的时代相当活跃，或许她本身也没有清楚认知到自己该是哪一国人，可是在法庭上的战略，当然是尽可能强调自己是日本人，而最能够证明的就是户籍誊本。

在川岛芳子的信上，如此写道：「父亲大人，近来是否安好？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次我需要用到户籍誊本，如果证明我是日本籍，就会无罪，拜託您了。现在被杀的话，还太早了，恳请您尽快寄过来。」

然而，事实上川岛芳子并没有日本的户籍，因为依照当时日本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中国人要取得日本国籍相当不容易。所以，取而代之的是养父川岛浪速请松本的有力人士写信证明川岛芳子确实是自己的养女，并在松本生活过的内容，之后寄送过去。由此可窥知，虽然她的养父无法寄送户籍誊本，至少也极力想救川岛芳子一命。

但是，再审请求却不被受理，一九四八年川岛芳子被处刑，川岛浪速也在一旁守到最后，在她被执行枪毙的隔年一九四九年过世，享年八十五岁。

另一方面，与川岛芳子形成对照的是山口淑子，又名李香兰，她则是因为有日本户籍才得以逃过一劫，被无罪释放。

川岛芳子和李香兰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就认识了，两人名字的发音都是「Yoko」，所以互相称彼此为「Yoko-chan」。在中国民间经常有结拜兄弟或认干爹、干妈的习俗，川岛芳子是日本人的养女，而相反的山口淑子被中国人收养为干女儿，才取名为李香兰。

二战结束后，人在上海的李香兰被逮捕并遭到软禁，等候军事法庭的审判。她的罪名与川岛芳子一样是汉奸罪，在上海市内的布告栏上贴有公告，如果有人可以证明李香兰是中国人，请通报相关单位。因为李香兰曾经从事过为日本劳军等活动，所以被认为是汉奸。报纸上也大肆报导她与川岛芳子同列为「文化汉奸」。

至于李香兰的双亲，父亲是九州的佐贺县人，母亲是福冈县人，祖籍是在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现为佐贺县武雄市北方町）。但是，李香兰迟迟无法和能够为她取得户籍誊本来证明祖籍的人联络上。

在李香兰形同被软禁的某日，从小就认识的俄罗斯好友格里涅茨到

牢里来探视。因为苏联是战胜国，所以格里涅茨能够在中国自由行动，于是李香兰拜託她向在北京的母亲传达希望能够取得户籍誊本一事，而几天后她收到母亲寄来的日本玩偶，里面就藏着户籍誊本。

因为这份户籍誊本，所以李香兰的汉奸罪无法成立，之后她仅是为了演出日本的宣传电影而谢罪，就被无罪释放，一九四六年二月回到日本。其后，在日本担任过国会议员等，直到二○一四年结束她波澜万丈的一生。

山口淑子接受媒体访问时，回顾道：「户籍誊本救了我一命，当初川岛芳子想尽办法要拿到户籍誊本的心情，我真的能够体会。人的宿命，就靠那一张纸了。我如果没有再度遇到她（俄罗斯好友），就无法拿到户籍誊本，我也可能在隔週或是某日的下午三点，在国际赛马场被枪毙处决，就如同新闻报导所写的那样。」

因为户籍的有无，让川岛芳子与李香兰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

世界上，只有日本和臺湾存在着把家族和姓氏结合起来的户籍，并作为一个单位来管理的特殊制度。在韩国也曾经有过户籍制度，可是二○○八年就改为个人户籍制度。

日本在明治时代导入户籍制度，接着在受日本统治的臺湾和韩国等地也全面实施，以夫妻和未婚的儿女作为家的单位，记录家族成员的名字、出生日期、亲属关系等的资讯以及变更情形，作为公证用的正式档，并且保存在所属户籍地的市区乡镇公所内。还有，就日本国民而言，户籍可以用来证明其身为日本国民的身分，如果没有户籍，就没办法办理结婚登记，也不能申请护照。

之前，身为日本政治人物，因为有臺湾血统，也被称为「臺湾女儿」的莲舫却身陷户籍风波。她表明辞去日本民进党的党魁一职，从上任到下臺才短短十个月光景，却遭遇空前的挫折。其中，最大原因之一就是从上任开始，就被质疑拥有臺湾与日本的双重国籍，而饱受争议。

可能是她本人的疏忽，没有注意到仍保有臺湾国籍一事，对于作为将来可能成为首相候选人的党魁来说，她的「忠诚心」也被放大检视，造成政坛不小的骚动。面对这样的批评声浪，莲舫无法加以恰当处理，而且没有查明事实关系，始终停留在流于表面的藉口，连带地作为政治

家的能力也遭到质疑。无庸置疑地，双重国籍问题严重损及支持者对她的信任，原本期待莲舫将来能够当上「日本第一位女首相」，结果却在诚信问题上发生动摇，成了她从政的「绊脚石」。

于是，众所瞩目的焦点都集中在莲舫的户籍上。莲舫的对外说明是二○一六年九月就放弃了臺湾籍，但是批评者要求公开户籍誊本作为证明。

可是，莲舫一直拒绝公开户籍，后来民进党在东京都议员选举大败，莲舫受到党内的抨击，于是七月十八日公开户籍。虽然有部分的人权组织认为，过去发生的「部落民」歧视，也就是境内的少数族群被歧视，是因为户籍的调查而暴露了身分，因此反对公开户籍，可是莲舫以「身为民进党的党魁，必须负起重大的说明责任」而决定公开。

户籍上的记载是在二○一六年十月七日宣布选择日本国籍，明确显示双重国籍状态已不存在。然而，身为党魁的莲舫可能已经身心俱疲了吧，在召开记者会后的十天内宣布辞职。原因在于作为莲舫后盾的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已经辞去民进党干事长一职为都议选的失利负责，而根据她的判断，认为无法以现状继续待下去，才毅然投下这枚震撼弹吧！

因为没有户籍，无法证明自己拥有日本国籍，导致日本人的川岛芳子最后以中国人的身分金璧辉（汉名）背负汉奸的罪名，在刑场上被处死。

因为有户籍，中国人的李香兰可以恢復为日本人身分的山口淑子，而逃过汉奸罪，之后，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也相当活跃，这与川岛芳子的悲剧形成明显的对照。

还有，公开户籍向日本社会证明自己是日本人的莲舫，作为政治家，却无法保住民进党党魁的地位。

户籍的有无，可能成为某些人的生命转捩点，却也可能是人生的终点。不管是被户籍拯救的人或是没被拯救到的人，都因为户籍这个极为特殊的制度，使得纠结在日本、臺湾、中国的川岛芳子、李香兰、莲舫这三位女性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也许可以说是歷史的一大讽刺。

渔业战争下走调的秋刀鱼滋味

二○一六年的秋刀鱼「日臺战争」，胜负已成定局，是由后起之秀的臺湾获胜。

二○一六年日本的秋刀鱼捕获量创下过去以来的最低水准，对日本渔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全球的渔业资源争夺战，正在海域上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臺湾在捕捞秋刀鱼的这一块，顺利夺走主角的位子。当然，捕捞秋刀鱼的渔船，在日本是以小型渔船在沿岸捕鱼为主，而臺湾是大型渔船在公海捕捞，日本完全无法匹敌。可是，日本渔业界对臺湾渔船的反弹声浪，却越演越烈。

在这一年的日本，秋刀鱼的捕捞作业被迫提早结束了。

东北地方首屈一指的渔港是宫城县的气仙沼。因为二○一一年发生的三一一东北大地震导致渔业严重受创，正逐渐走向重建之路，可是二○一六年十一月底的某日上午，明明还在秋刀鱼的渔期里，就已经看到许多渔船在港口停泊，没有出海捕捞秋刀鱼，船员已经在打扫船舱或加以维修，为明年的捕捞作业做准备。与往年相比，这个时间点未免太早了。

原本，秋刀鱼的渔期固定在八月到十二月，照理说十一月应该还在繁忙的阶段，但是二○一六年八月开始，捕获量就不多，到了九月终于有点爬升，可是一进入十一月，秋刀鱼的渔获量骤然下降。这样下去，连渔船的油钱都赚不回来。加上，临时船员採用的是以月为单位的雇用契约，十一月底日本各地的渔船就陆续出现停止捕捞的「歇业」状态。

位于气仙沼的水产公司老闆，嘆气地说道：「渔获量完全被那些不遵守规定的外国渔船夺走了，我们却无可奈何。」

从二○一六年开始到二○一七年，日本的秋刀鱼捕捞状况一片惨澹，很多日本的渔业人士，一致把矛头指向这是因为臺湾等外国渔船滥捕，事实真是如此吗？为了找到答案，我来到知名的渔业都市──八户（位于青森县东南部），访问在日本研究秋刀鱼的第一人──担任东北区水产研

究所主任研究员的巢山哲。

他表示：「日本主要是在沿岸地区捕捞秋刀鱼，可是鱼群不来了，这是最大原因。虽然不能否认外国船的增加对日本渔业产生影响，但不至于成为主因，秋刀鱼的总体资源量（意即最大持续生产量）估计大约两百万吨，但实际的情形是即使将各国的捕获量加总，也不过六十万吨而已，与沙丁鱼或鲭鱼等其他鱼类相比，就资源量与渔获量的比例来看，秋刀鱼实在偏低。」

论及原因，巢山对于归咎外国船滥捕的说法抱持否定意见。

根据他的说法，秋刀鱼的分布与洄游从二○一○年左右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来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的秋刀鱼，会沿着日本近海的两条路径南下，其一是从北海道东岸往东北、北关东的太平洋海域的「亲潮第一分流」；其二是从俄罗斯、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简称ＥＥＺ）外公海的「亲潮第二分流」。然而，位在第一分流通道上的北海道东侧，出现巨大的暖水块，海水温度超过十五度，秋刀鱼忌讳高水温，因此被阻挡在那里，无法南下。

日本渔业的优势就是捕捞秋刀鱼，尤其是把重点放在第一分流的沿岸渔业，并且限定两百吨以下的渔船才能捕捞。把在第一分流捕捞到的秋刀鱼生鲜冰藏，运抵到数小时至半天内可以抵达的渔港，可以用来做生鱼片的新鲜秋刀鱼，最后被分送到日本各地的餐桌上。

另一方面，在第二分流的公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主要是臺湾、中国、韩国的外国渔船势力，因为这条通道没有受到暖水块影响，所以经过第二分流附近南下的秋刀鱼数量并没有减少。因此才会形成日本的渔获量减少，可是外国渔船维持渔获量的现象。

从数字来看，日本在秋刀鱼的捕获量上明显输给臺湾。

直到二○○○年左右，日本一直占上风，而臺湾还处于成长阶段。可是，差距逐渐缩小，直到二○一三年臺湾成功逆转（日本十四．七万吨、臺湾十八．二万吨）。二○一四年在激烈竞争下，日本险胜一筹，可是二○一五年却再度屈居劣势，以四万吨之差输给臺湾（日本十一．二万吨、臺湾十五．八万吨）。

那么，在秋刀鱼产业崭露头角的臺湾，是如何捕捞秋刀鱼，又是怎么食用的呢？现在，臺湾南部的高雄被视为世界最大的秋刀鱼基地，尤其高雄市郊外的前镇渔港就是中心地，我特地飞到高雄一探究竟。

访问之前，先品尝秋刀鱼的滋味吧。渔港内有间名叫「顺亿」的海鲜餐厅，是由专门捕捞秋刀鱼和鲔鱼的水产公司直接经营的，中午时来自渔港内外的客人络绎不绝，找位子坐下后，我点了「烤秋刀鱼」。两尾肥美的秋刀鱼，鱼身切半，表皮带点焦黄色，吃了一口还热腾腾的，鱼脂饱满，鱼肉也很新鲜，光是沾酱油和柠檬汁就非常美味了，没两下子，盘子上就只剩下鱼骨头了。

渔港里面，有个「台湾区远洋鱿渔船鱼类输出业同业公会」，这是由秋刀鱼捕捞业者组成的团体。原本是以捕捞「鱿鱼」为主而成立的，因为秋刀鱼和鱿鱼都需要使用集鱼灯来捕，所以改为「秋天秋刀鱼，春天鱿鱼」的捕鱼型态，这样的收入甚至远比每年到阿根廷附近捕捞鱿鱼的渔船还要丰厚。

臺湾的秋刀鱼捕捞作业属于远洋渔业，要从臺湾出发到北太平洋的渔场的话，需要两天两夜，全部的捕捞作业是在日本或俄罗斯的专属经济海域外的公海进行，所以不像日本可以当天运回鲜鱼，而是先在船上依照大小分类，再装箱冷冻后，返回渔场，将鱼货送交给大型的专用搬运船。雇用的船员很多是外籍渔工，原则上捕捞期间渔船不会回到臺湾。

至于捕捞秋刀鱼的渔船大小，日本最大的是两百吨，可是臺湾出动一两千吨级渔船很稀松平常，透过搬运船运载的秋刀鱼总量甚至一次就可以超过一万吨，日本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大量捕捞、大量冷冻、大量运往臺湾，这就是臺湾流的秋刀鱼产业。

面对日本捕鱼业者批评的滥捕，鱿鱼船同业公会的雷祖纲理事长强调：「事实并非如此」，一边勐力摇头。

他说：「日本方面不时在说『提前捕捞』、『滥捕』，可是我们每年和日本一样都在八月出港，年末回港。因为在八月以前，秋刀鱼不会南下，所以根本无法提早捕捞（他一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第一分流与第二分流）。还有，日本与我们的渔场也不同，说我们的捕捞作业影响到

日本的秋刀鱼捕获量，这样的主张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另一方面，关于近年中国渔船的增加，他也忧心忡忡。从他的谈话里，可以明显感受到臺湾的竞争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他接着说道：「在渔业管制有所行动之前，中国渔船为了达到更多的实际渔获量，一直投入新渔船的建造。」

渔业管制指的是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ＮＰＦＣ），由日本水产厅发起，二○一五年在渔业相关国之间开始进行讨论。前一年先进行渔业资源评估，用来决定次年各国的「总容许捕获量」（Total Allowable Catch，简称ＴＡＣ）；也就是根据前一年的捕捞实绩，来设定次年的适当配额。因此，中国为了累积更多的渔获量，投入大量资本积极建造渔船，速度相当惊人。

实际上，对臺湾民众而言，秋刀鱼是再熟悉不过的鱼料理，在超市或菜市场等到处都有贩卖，也是便当的主菜之一。因为是冷冻保存，所以一年到头都吃得到，尤其是入秋的臺湾，在中秋节固定登场的烤肉活动里，秋刀鱼与肉类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可以看到秋刀鱼在烤肉架上滋滋作响，家家户户瀰漫烤肉的烟，非常热闹。

雷祖纲理事长补充说道：「大尾的秋刀鱼，也就是『特大』级的几乎都被日本公司买走，我想日本超市里的秋刀鱼应该有很多都是臺湾渔船捕捞到的。」他露出了笑容。

而且，现在吃得到秋刀鱼的不只有臺湾，中国近年来的秋刀鱼消费量也呈现成长趋势，另外在香港或新加坡、澳洲、加拿大等地，华人居住的地方也有一定的消费量。在俄罗斯，秋刀鱼制成的罐头相当受到欢迎。最近就连中东、阿拉伯地区，吃秋刀鱼的风潮也逐渐兴起。

秋刀鱼的魅力就在于物美价廉，又有营养价值。

过去，大概只有日本人吃秋刀鱼，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其魅力所在，秋刀鱼晋身为全球共通的鱼料理，这也和日本食物在世界上带动流行风潮有关吧。

关于「秋刀鱼」的名字由来，据说是因为这是在秋天可以捕获的像刀状的鱼，其寿命约两年左右，活动范围是从近海到沿岸一带的表层海

域。

在日本，光是回溯歷史，就知道三百年前在熊野滩（三重县南部）就开始捕捞秋刀鱼，不久之后扩及到关东，江户时代在千叶的外房地区捕获大量秋刀鱼。从佐藤春夫的诗〈秋刀鱼之歌〉或是落语〈目黑的秋刀鱼〉便可知，从很久以前开始，秋刀鱼在庶民阶级就是相当普遍的食物了。战后的日本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当时秋刀鱼的渔获量大幅成长，立即成为国民食用鱼，奠定稳固的地位。

一直以来秋刀鱼是由日本人捕捞、日本人食用，但是当国际上的秋刀鱼消费量急速成长，外国船在公海上的捕捞情形增加，已成为无法避免的时代趋势。只是，不管是在日本或臺湾，都面临相同问题，透过在日本与臺湾的採访，可以知道秋刀鱼的鱼体尺寸和以前相比，相对变小了。原因目前尚未明朗，也许是气候变动的缘故，或者大肆捕捞也可能是潜在原因。

气仙沼渔业协会出示了记载秋刀鱼的捕获量和价格的本子，捕捞到的日期旁有三个数字并列，例如「三、五、二」，或者「二、四、四」等，不管哪一组数字加起来都是十，这是共通的。

气仙沼渔业协会的秋刀鱼部门员工，做了下列说明：「第一个数字是一百六十公克以上的大型秋刀鱼，是要放在超市贩卖的；接着是一百三十公克以上，这是用来做罐头的；第三个是一百三十公克以下，主要作为饲料。今年捕获的，很多都是非常小型的秋刀鱼。」

这个数字是用来表示秋刀鱼大、中、小的比例，在渔期开始的八月左右是「五、三、二」或者是「四、五、一」，这样的比例似乎还不错。但是，渔期越是往后，就变成「三、四、三」或「二、五、三」的居多，最后就来到了「一、四、五」或者「○、四、六」这样的数字，从这样的比例也可瞭解到业者选择提早结束渔期的理由。

可以确信的是，日本的海域肯定发生了异常变化，不只是秋刀鱼正从沿岸一带消失，还可以看到鱼类的生态环境正在面临考验。

根据先前访问到的巢山的说法，原本日本海区域的富山或新潟特产的鰤鱼相当有名，但现在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也可以捕捞到，一年四季在超市都可以看到身影。还有，包括一时消失的沙丁鱼或鯖鱼也逐渐恢

復产量。曾经只在南方才出现的黑鲔鱼也北上到了北海道。一般在日本南方活动的条纹石鲷、三疣梭子蟹、日本的鲷等，也可以在东北沿岸捕捞到。然而，若说北方海域变热闹了，其实不然，因为北方的鲑鱼明显减少。这些日本列岛周遭的「鱼类生态系统」正在改变，原因是面临了以几十年为单位的海洋环境週期转变，同时也可能和全球暖化有关。

总之，日本人一味地将捕不到鱼归咎于外国渔船身上，也不会出现任何转圜的可能，与其单纯把视线放在与外国渔船的渔获量差距，不如思考如何找到转机。对于只在沿岸海域捕捞秋刀鱼的日本来说，只要暖水块存在，就会影响到秋刀鱼南下的机会。因此，作为对策的一环，也可以仿效臺湾建造大船，一样在公海捕鱼。虽然，当日捕捞的鲜鱼最受消费者青睐，但是随着科技进步，一般人讨厌的冷冻味道似乎也有了解决方法。总之，比起吃不到秋刀鱼，到公海捕捞再冷冻起来，亦不失为良策，如果能够输出国外就输出，也可以打响日本渔业的知名度。如果眼前面对的是新的海洋环境，就应该摸索出新的商业模式来应变，可惜的是目前日本渔业仍然看不到自我改革的出路。

对日本人而言，就像鲔鱼一样，秋刀鱼变成得向国外进口的时代也即将来临了，日本拥有捕捞秋刀鱼的悠久传统，要这样继续衰退下去，抑或是与臺湾站在同个平臺上公平竞争，将是日本的一大课题。

日本人原来这么想

日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群深思熟虑，或是拥有长期视野的人。
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中，人世虚无，人终有一死，也许明日，也许今朝，又或许十年之后。
面对如此无常的人生，与其冥思苦想，不如珍重当下的心情，活好现在。

日本人为何爱吃生的东西？

长久以来，每当与中国朋友在日本一起用餐时，是否要招待他们吃生鱼片一事，总是会让我在内心纠结许久。因为在日本人的印象里面，中国人是不吃生鱼片的，理由是「中国人认为活鱼里有寄生虫」、「中国人不喜欢冷食」等等。

大概在一九九○年以前，如果向中国游客提议说：「要吃生鱼片吗？」对方通常是面有难色地回答：「能否选择其他的料理？」委婉地拒绝了。对早就习惯和食的臺湾人来说，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中国人对「生食」一直以来都很忌讳。

过了二○○○年以后，回答「喜欢生鱼片」的中国人逐渐增加了；甚至在二○一○年以后，喜欢生鱼片的人甚至超过了讨厌生鱼片的人。尤其是这两、三年，如果向对方确认说：「你可以吃生鱼片吗？」时，就可能会看到不耐烦的表情，感觉是在抗议：「你少瞧不起人，当然喜欢生鱼片啊，那还用问吗？」现在，有机会到东京被评比为米其林三星的寿司店里，也几乎都看得到中国人的身影。

最近，有认识的中国朋友问我：「为什么日文里的生鱼片，有的称『刺身』（sashimi），或者又称『お造り』（otsukuri）呢？」

我顿时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的确很奇怪，为什么生鱼片是称为「刺身」（「身」是肉的意思）呢？照理说，动词应该是用「切」。而「お造り」一词，平常就很自然地使用，却不太瞭解意思。

为此，我查了资料，发现生鱼片原本被称为「切身」，但是「切」这个动词对佩刀的武士来说不太吉利，所以才变成「刺身」。可是，也有其他地方的武士认为「刺身」的「刺」字不妥，就优雅地称之为「お造り」（「造」是将原料、材料加工或组装，成为有形状的东西）。

二○一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将「和食」登录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源于敬重自然的精神。

其中，在我看来「和食」的最大特徵就是生食，而中国人这几十年来对生鱼片的态度也从排斥到接受，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着对生食文化的认同吧。

在我感到欣慰的同时，突然冒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喜欢吃生鱼片呢？」我能够想到的几个原因是：第一，日本四周环海，东京、大坂、京都、名古屋、福冈、广岛等地，不管哪一座都市都是从很久以前就是捕获海鲜后的卸货港口，而且与人口聚集的消费地相距不远。再者，生鱼片的流行和传统的米食习惯也有关系，米饭配上沾了酱油的生鱼片，真是绝品啊。

归根究柢地说，日本人的饮食文化哲学是，尽可能地品尝食材本身的天然美味。这个想法可以说是自绳文时代开始就形成的宗教观，与在食材调理上花招百出的中华料理呈现了强烈对比。

关于日本人的生食习惯，最古老的记载可追溯到《魏志倭人传》（约成书于三世纪后半，二八○年至二九○年间）。这是三国时代的魏国文书，里面对于古代日本有所描述，是现存最早的纪录。在日本人的古文书里，甚至还没开始记载这个时代的情况。

这本《魏志倭人传》里面，写道：「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这里的「生菜」指的不是生的蔬菜，应该是指没有用火调理过的生食。在中国，除了临海部分地区，几乎不吃生鱼肉，因此对日本人的饮食感到很稀奇，才会特地记录下来。

还有其他外国人接触到日本的生食文化时，也感到很惊讶。十六世纪，来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士．佛洛伊斯的《日欧比较文化》里面，对于日本生食文化的记载也是充满惊奇，写道：「欧洲人喜欢煮鱼或煎鱼来吃，可是在日本却非常喜欢吃生的。」

中世的室町时代以前，日本人为了防止生鱼或生肉腐坏，会用醋或酒浸渍，也就是经过「脍」的处理后再食用。像现在这样子，直接食用生肉切片的习惯是从中世室町时代开始的。即使到现在，日本各地还保留着「脍」的饮食文化，古人的智慧生生不息。

我个人也特别喜欢吃生食，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而是纯粹喜欢不经任何加工、能够直接品尝到新鲜味道的天然主义者而已。不只

是海鲜类的生鱼片，我也喜欢生的鸡肉和牛肉，而最爱的非马肉莫属了。也许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皱眉感到不解吧，可是真正新鲜的马肉，肉色红通通的，一咀嚼就能够实际感受到肉质本身的鲜甜，那种无可取代的美味一定要亲自体验过才知道。

不管是吃哪一种生食，酱油都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作为除臭去腥的调味料，酱油绝对是首选。还有，在日本吃生食时，最常见的就是使用芥末和生姜。其实，在先前提到的《魏志倭人传》里面，也有这样的叙述：「（用于沾生食使用的调味料）生姜、橘、胡椒、蘘荷。」令人感到相当惊讶，因为这些食材到了现代还是作为调味料被广泛使用。歷史洪流里的变与不变，真是不可思议啊。

近年，日本的传统饮食文化「和食」在世界各地掀起热潮，而和食本身又无法撇开生食而存在。因为和食的概念就是将食材本身的美味作最大程度的发挥，而生食正好能够完整体现出天然的原汁原味。

至于要在哪里品尝生食呢？

当我想要让外国朋友品尝最道地的生食料理时，是选择到寿司店。因为依照我个人经验，通常在和食料理专门店里吃到的寿司，味道很难称得上绝佳，相反地，寿司店里的料理，除了招牌的寿司以外，其他餐点也相当丰富，美味程度甚至超越了那些专门店。

整体而言，我反而觉得在寿司店里可以享受到比较完整的和食料理。因为，制作寿司是一门使用新鲜食材调理的技术，也和其他料理是相通的，能够端出美味的寿司，就代表其他料理也不会逊色。

日本的生食与日本人吃米饭的习惯密切相关，而寿司本身就是完美呈现出日本生食文化的结晶之一。日本人从弥生时代就开始发展出米食文化，米饭与沾上酱油或其他调味料的生鱼片，这样的组合真是绝配。尤其是握寿司，在晶莹饱满、粒粒分明的米饭上面放片生鱼片，沾些酱油食用，真是身为日本人的一大幸福。

原本生鱼片与米饭是分开食用的，是直到流通发达且生食文化普及的江户时代才出现握寿司的吃法。感觉有一点像汉堡，把原本分开的面包和肉片夹在一起食用，可是握寿司的创造性高出汉堡许多，因为寿司的米饭上可以放任何生食的食材，或者是捲海苔以及其他熟食。

现在的中国，不管什么料理都可以做得相当美味。唯独生食仍有无法突破的瓶颈存在。因为除了鲑鱼、鲔鱼等这些容易冷冻保存的食材之外，在真正的意义上，只有在日本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生食，是因为拥有以生食为前提所建构的安全卫生且迅速的流通制度，然而目前中国尚未发展出如此完善的流通制度来对应。

随着访日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对于日本饮食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而我想要极力推荐生食文化，不管是鱼类还是肉类，来到日本请好好品尝道地的刺身料理吧。

让日本人最受辱的骂人话—骂人话的中日比较

外国人都熟知的一句日语是「八嘎丫路」（日语写作「马鹿野郎」）。

过去我到中国旅行时，曾在火车上给一位农民模样的大爷让座。这位满面笑容的大爷冲着我来了一句：「谢谢啊，八嘎丫路。」当场我就尴尬得要死。也不知道他是因为讨厌日本人才这么说，还是他觉得「八嘎丫路」是日本人常用语，才这么讲。这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只是，「八嘎丫路」在日本一般用于上司训斥部下，或者父母教训孩子的时候。即使被别人这样说也不会觉得非常受伤害。翻译成中文是程度较轻的骂人话，类似于「傻瓜」。

我曾经在上海跟计程车司机吵过架，他们总是故意绕远走弯路。对方的态度实在太恶劣，所以下车时我丢了一句「干X娘」，结果司机飞奔出来追我。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干X娘」这句骂人话跟日语中的「八嘎丫路」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正如我这次亲身体验反映出来的那样，日本人对骂人话往往感觉比较迟钝。

前些天我跟一个中国朋友吃饭，围绕「为什么日语里骂人话比较少」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番。这个朋友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十年，但据说现在发脾气时也还找不到合适的日语词汇来充分表达内心的愤怒。

比如说，在日语里骂人话除了「八嘎丫路」以外，还有「阿呆」、「気违い」、「ヘニタ人」等等。翻译成中文就是「呆子」、「疯子」、「变态」的意思，大概在中国人眼里不算什么严重的骂人话吧。所以我的这位朋友抱怨道：「没法痛痛快快地大骂一场，所以日本人容易累积很大的精神压力。」

确实，中文里的骂人话非常丰富，跟日语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学中文有二十年了，现在还会遇到搞不清楚意思的骂人话，感觉每年都有新的骂人话诞生，永无止境，记也记不了。

这个朋友还问我：「为什么日语里没有骂人话？」我想了想回答

说：「因为日本人比较文明啊。」本来是句半开玩笑的调侃，但朋友马上说：「日本人文明？中日战争的时候干出那么残忍的事。」我也不服输地反驳：「我并不否认这个。但说起残忍，中国古代的秦国，白起不是还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士兵吗？残忍度谁能比得过中国人？」话题一发不可收拾了。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讨论交流就是这么困难。

回到骂人话这个话题上，我觉得日文和中文之间的骂人话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差异，大概在于辱骂是否针对「性」和「亲属」吧。

日语里几乎没有与「性」相关的骂人话。我想起了小时候，孩子们一起唱着顺口熘「你妈是个凸肚脐」，相互斗嘴。日本人顶多骂个「凸肚脐」，中文的话就变成了「干X娘」，所以日本和中国还真是大不相同啊。

另外，关于「家属」也是同样的。在中文里有很多侮辱别人家属或祖先的骂人话，而日文里完全没有。大概，心里也不会介意千百年前的祖先被别人怎么骂吧。日本人的意识里最多认为祖父那一辈算是自己祖先。这跟发现数千年前的家谱后喜出望外的中国人相比，家族关系简单得太多了。

以前我在臺湾旁听立法院审议时，曾经遇到女立委殴打男立委的情景。据说因为男立委说女立委「没家教」。女立委在电视机前声泪俱下地控诉「说我的话怎样都行，但绝不容忍侮辱我父母」，臺湾舆论整体上也倾向于支持这名女立委。后来事态渐渐平息，认为说她「没家教」的男立委有错，并没有对使用暴力的女立委加以特别处罚。

比如我，即使被人讲「没家教」，或许稍微有些不愉快，但绝不会非常愤怒吧。

这样想来，骂人话里所蕴含的差异可以说与中日文的价值观差异直接相关。

最后顺便说一句，现在日本人最讨厌被别人说的一句骂人话当属「ＫＹ」。

这是「读不懂空气」一词的首文字缩写。所谓读懂空气是日本独特的待人接物之道，日本人重视人际关系之「和」，努力维护不去破坏。

打破现场气氛的人会遭到周围的厌恶，被打上「人间失格」（做人不合格）的烙印。

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最耻辱的事，比任何脏话都有效果。

所以建议各位外国朋友，如果身边遇到奇怪的日本人而感到愤怒的话，可以对他说「你呀，真是ＫＹ」。那个日本人听了后肯定会目瞪口呆，深感难为情转身回去好好反省。

日本人的「日本梦」

每次一到海外，真的是经常听到别人对我说「日本人很勤奋呀」。

确实，日本人整体来说算是勤奋的民族，尽管我本人绝对没那么勤奋。看看我的周围，不少人每天晚上都非常拼命地加班，即使没有加班费。一旦某项工作传达下来，无论重要与否，很多人都会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并且，尽可能为提高自己工作的「质」而努力。恐怕日本人的ＤＮＡ里已被植入「勤奋」基因，日本人身上的这一优点被全世界广为认可，这不算坏事。

「勉强」这个词象徵着日本人的这种勤奋。

长时间跟中文打交道，虽说表达时，日本人会使用和中文相同的汉字，但经常遇到有一些单词，字相同，日语和中文的含义却完全相反的情况，让我非常吃惊。「勉强」这个词，就是如此。

中文里「勉强」是「能力不足而强为之，心中不愿而强为之」的意思。说「不要勉强」的话，是让对方「不必一定坚持做不想做或做不来的事」，表现出一种体贴和关怀。

但在日文中，「勉强」是「学习」之意，所以「不要勉强」就变成「不用学习」了，根本截然不同。曾有个笑话，一个嫁给日本男人的中国女人对孩子说「不要勉强」，这让父亲大发雷霆……

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密切。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东亚一隅毫不起眼的日本，能够突然变成强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清王朝和俄罗斯，是因为明治维新推动的大改革成功了。这一点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吧。

那么，明治维新和那之前的时代，究竟有何不同？归根缘由是明治维新给了所有日本人一个「日本梦」吧。不问出身贵贱，凭藉能力和努力就可以获得与之相应的地位和名誉的「日本梦」。这个梦让很多年轻人奋发图强，成为日本近代化的强大推动力。

原本「勉强」这个词语，在江户时代其词意与中文一样，日本人把它当做「能力不足而强为之，心中不愿而强为之」的意思来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大都学习儒学，能理解汉文。然而，明治维新让日本变成竞争社会以后，学校里的老师经常严厉教导孩子「无论如何都要勉强」、「实在不行也要勉强」（努力去学习）。

渐渐地「实在不行也要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就演变成了「勉强」（学习）的意思。

在江户时代之前，日本接受相当于现在小学程度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然而，进入明治时期以后，初等教育迅勐发展，明治维新过后三十年，小学的就学率达到八成。随着教育的普及，除江户时代的统治阶级「士族」以外，其他阶层也逐渐有了出人头地的梦想。穷乡僻壤的青年也开始将「成功」视为人生的一大目标。

这让我想起日本中小学校毕业典礼上必唱的那首歌曲〈仰望师恩〉。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立身、扬名、奋发图强吧。」出人头地，是老师对孩子的要求。这是一八九七年文部科学省编写的歌曲。

正如这段歌词所表现的那样，当时日本产生了一种观念，把学习知识的热情与未来的出人头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价值观直到二战后也依然延续下去。

我上小学时懵懵懂懂不知道具体含义，就被父母带去补习班。放学后我就匆匆赶回家，放下学校的课本简单吃点饭后，准备接下来补习班要用的东西。然后坐电车去附近的补习班上课，学到晚上九点后再回家。我回家后已经没有心情看电视，直接就睡觉了。现在我回头想一想，小学生都是在父母安排下过着怎样的生活啊。

但是，在我接受学校教育的一九八○年代，日本还没有从经济高度成长的梦中醒来，为了获得哪怕更好一点点的学歷，大家都拼了命去学习。这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常识，并且也与日本人身上「勤奋」的民族性相吻合。

那么，如今的日本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实在不行也要坚持，无论

如何都要努力」呢？日本政府在近十年来推行了以「宽松式教育」为名的愚蠢运动，告诉学生「在儿童时期不必那么拼命努力学习也可以」。因为政府想学习借鉴欧美式的教育方法，不对年幼的学生施以填鸭式教育，而将重心放在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个性独立方面。

可是，「宽松式教育」的结果被认为是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日本的孩子一旦没有了作业和补习班，就把时间花在电玩和漫画上，并没有培养出所谓的独立自主。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废除「宽松式教育」的做法。

日本人很勤奋，这一点没错，而且勤奋到将「坚持做不想做或做不来的事」的「勉强」一词，转变成「无论如何都得学习，实在不行也要坚持学习」的意思。而且，日本人确实也非常适合「勉强也要念书」这一点。

「灭私奉公」的武士道遗毒，令日本人停止不了「卖命」工作

倒卧在自家床上，死后四天已经冰冷的手里，她还紧握着与公司联络用的手机。日本的公共电视臺日本放送协会（ＮＨＫ）的年轻女记者，二○一三年七月因为心脏衰竭死亡。次年被认定为过劳职灾。ＮＨＫ并没有公开这项事实，直到二○一七年十月，才在家属的要求下召开记者会公布。

死亡的是在ＮＨＫ工作第九年的女记者佐户未和（当时三十一岁）。她毕业于一桥大学这所知名的一流国立大学，之后进入ＮＨＫ担任记者。她的死对日本社会造成不小的震撼，是因为她工作繁忙时的加班时间竟然一个月超过一百五十小时。

佐户未和的事件并非单一案例，二○一五年十二月，在大型广告公司电通（Dentsu）上班的、东京大学毕业的才女高桥茉莉（当时二十四岁），因为承受不住公司庞大的工作业务压力而选择了自杀。带给国际社会很大冲击的日本人的过劳问题，究竟是多么严重？而且，到底日本人是为了什么，要如此卖命地工作呢？

新闻记者的工作繁重，这应该是世界共通的吧？因为，新闻本身并不会配合记者的时间来发生，谁都不知道在何时、在哪里，会发生新闻事件。一旦发生新闻了，就必须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立即冲到现场采访或者开始写稿，这就是新闻记者的工作，不允许任何藉口。这就像发生杀人案就必须着手调查的刑警，或是发生火灾就立即赶赴火场灭火的消防队队员，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日本记者的情况较为特殊，因为记者本身的工作也被涵盖在「日式企业文化」、「日本社会的美德」等的框架里，于是就形成了工作时间过长的职业。除非亲身在日本媒体界工作过，否则绝对无法理解那种痛苦。我在二○一六年辞去了新闻记者的工作，一个总共待了二十四年的地方。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若有来生，我还是想要当新闻记者，可是如果真的有来生，我绝对不要待在「日本」的媒体界。

首先，我说明一下日本记者的一般工作状况，或许读者就可以理解原因所在。

日本记者的特殊性，是拥有一套从地方到中央的统一人才培育体系。大学毕业后被录用的记者，平均年龄都在二十二、三岁。日本的记者很多是精英分子，几乎都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些年轻有能力的菜鸟一开始会被分派到各个地方，工作三、五年左右。不管在日本或世界其他地方，处于这个阶段的记者几乎都是采访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在地方的训练过程当中，大约有一半的菜鸟会选择放弃，其中很多都是承受不了对记者工作的抱负与现实有太大的落差。

这个时期，只要没有出现什么重大事件的话，其实工作不会很繁忙。一天的工作时间顶多是十二小时左右，若是换算加班时间，一天四小时，一个月工作二十几天，即使再加上一些假日出勤，加班时间也不会超过一百小时。

能够熬过这些派驻地方的记者工作之后，大家大概也快三十岁了。接着就是被分派到东京总公司或是大坂总公司的社会线。

ＮＨＫ的佐户小姐成为记者之前已经在鹿儿岛待了五年，她应该是能力很好，所以「通过」了在地方跑新闻的派驻阶段，被调到东京首都圈采访中心，此处就以「社会线」称之。

记者在这里采访的接触窗口很多都是警察，大都市比较容易发生重大犯罪事件，所以负责采访警察的记者会很忙。在这里，记者首次体验到何谓真正的「突击採访」。这大概是日本媒体的最大特徵，也可以视为是发生过劳死的潜在原因。

「突击採访」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不分早晚地取材或访问。但是，记者需要事先调查好採访对象什么时候会在家，直接登门造访。警察大人的住址对外不公开，但是媒体都握有「通讯录」，这是公司内部代代传承下来的，负责的记者要时常更新这本「通讯录」。

警察大人大概是上午八点上班，五点或六点下班，之后通常会到外面应酬小酌。我们记者可能一早就先在警察大人的家门口守株待兔，一看到人出现，就在玄关或是前往车站的途中，上前锲而不捨地追问：「那个案件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会抓人呢？」等，试图取得最新

的消息。晚上也是一样，我们也守候在警察大人的家门口等待时机，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幸运的话八、九点左右就看得到人。可是如果他们跑去喝酒，也只能等到十点、十一点才有办法说上一两句话。足足三、四个小时之间，一边看着夜空一边等待，结果一逮到人冲上前采访时，却因为对方喝得太醉而问不出个所以然，那时真的很想哭。

面对这样的「突击采访」时，警察大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依据情况会有所不同。若是健谈的警察大人，也有人会分享很多情报，当然案件越到后面收网的阶段，口风也会越来越紧，为了让他们能够多少透漏一些，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从平常开始，就要记住他们老婆的生日并且送礼物，或者是准备其儿子的入学礼物；喝酒时的酒钱或交际费，当然也都是从记者这边支付的。

虽然，日本媒体记者的薪水相当丰厚，可是很多公司都不会额外支付这些送礼或吃饭费用，因此记者的薪水里有一大部分都是用在应付这些开销上面。即使如此，记者也都甘愿牺牲睡眠和金钱，努力取得其他媒体没有的独家消息。

像这样子，跑社会线的生活过了两三年之后，前面就会出现两条岔路了：一条是在这段期间没有闯出一番名号而被淘汰的人。他们可能回到地方记者的岗位上，或是虽在总公司但被分配到非编辑部门，也就是失去了作为新闻记者大展身手的机会；另一条就是被分配到政治线、经济线或是国际线，持续过着被迫投入更长工时的生活。

实际上爬升到这个阶段时，每个月的超时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一百小时。跑政治线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期，负责采访政治人物的工作型态真的是相当折磨人。因为，政治人物都是早出晚归，连假日也在忙着选区里大大小小的事务。

这个时期，每天早上都会有黑色的特约计程车到家门口等候，这是公司派遣的采访用专车。五点起床，六点坐上车，直驱政府阁员位于东京都内的住家。在那里完成采访后，一整天就穿梭在国会审查或是议员的办公室，然后写新闻。晚上大概是从八点左右开始，又必须在政府阁员的住家门口等候。采访结束后，记者又得回到总公司。在那里，所有记者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收集得来的采访结果，决定隔天要进行什么样的

采访内容，要如何写新闻稿等。或者，晚上的采访若是有掌握到什么重大消息，就必须动笔写稿。日本报社的截稿是在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一点，通常报导内容在晚上十一点要校稿完毕，在凌晨一点前也得赶上隔天的重大头条或独家新闻。

每晚几乎都到凌晨一两点，记者工作才结束，忙得焦头烂额。每天的加班时间大约十小时，睡眠时间为三至四小时，日復一日，每个月的加班时间超过两百小时是家常便饭。许多人因此赔上了健康，可是记者一旦生病就可能被降职转调，所以只能瞒着公司，自己吃药硬撑想办法康復。因此，每年都会出现几位延误治疗而住院、从通往功成名就的跑道上消失的记者。我自己也在过了大约四年这样的生活之后，幸运地被派遣到海外，如果持续五年以上的话，一定就没有像现在的健朗体魄吧。

当然有加班费，可是记者加班时间过长，公司如果全部支付的话，应该会破产。因此，在工作如此繁重的职位上，记者的薪资里面通常已经包括了大概是一个月一百小时的加班费。我在《朝日新闻》时期的薪资是月薪一百万日圆左右，可是里面有三十万日圆是自动加上的加班费。如果真的以所谓的加班费标准来计算，加班费一定有一百万日圆左右吧。

那位过劳死的ＮＨＫ女记者佐户的加班时间超过了一百五十小时，成为议论的焦点。可是，只要有重大新闻，记者很多时候也都是在公司过夜，加班两三百小时是稀松平常的。因为有很多人跑新闻太忙而无法回家，所以日本媒体的公司大楼里，一定都有浴室和卧房等设施。

因此，ＮＨＫ女记者的加班时间超过一百五十小时而引起社会舆论一片譁然时，在日本业界应该有不少记者在心里想着：「那又怎样呢？我们大家也都是这样子过的」吧。长时间处在异常的工作环境里面，不知不觉地甚至把这样的异常合理化，感觉已经麻木了。

那么，为什么记者的工作要受如此严苛的要求呢？

当然，尽可能地深入权力核心挖掘出新闻，有部分是需要经歷许多艰辛才能够实现的，所以记者赴汤蹈火的付出并非没有意义。

但是，日本报纸的销量有九成来自订阅，所以并非一刊登独家新

闻，那天的报纸就会卖得特别好。也就是说，这是作为记者的自尊心和面子之争而已。记者赌上自己的未来取得独家消息，为了博得「优秀记者」的名声而竞争，编辑也因为身为记者的上司，而觉得应该成为「拥有优秀下属的管理者」，所以想尽办法让记者为工作卖命。这虽然是个人志向的理由，也是无法否定的现实，因为取得独家新闻的动机攸关记者荣誉感，未必是坏事；但不管身处哪一种环境，都有正反两面。

日本相继发生年轻女性的过劳死，理由各有不同。广告公司电通的高桥是因为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是又无法向人诉苦，把烦恼放在心里，而周遭的人也对于她的痛苦视而不见。而ＮＨＫ女记者佐户或许是过于喜欢这份工作，太过拼命，而周遭的人也对她过于认真的态度产生了依赖感吧。

事件发生后，有部分观点指出像电通或是ＮＨＫ等媒体界的工作特别繁重，才会出现过劳死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个原因是源于日本社会整体蔓延的「加班病」，而「加班病」又与重视集体行动的日本传统社会规范，或是以「奉公灭私」为中心的武士道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日本，加班是好的，准时下班是自私的，假日出勤是好的，放有薪休假是不道德的，像这样子「全心奉献给公司的工作态度」，几乎在公司里面是可以百分之百获得很高评价。如果也具有相当实力的话，肯定会成为媒体界的宠儿而大放光彩；即使实力没有那么好，也会因为被认为是「工作认真勤快的员工」，而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仍然採用终身雇用制，就连人才流动性高的媒体界也有这样的强烈倾向。在终身雇用制里面，上司的评价非常重要，攸关死活，所以为了让上司对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在日本工作过的人，或多或少，不管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即使牺牲家庭和健康，都会选择加班来保住自己的仕途。

我个人的情况是，也许该庆幸我原本就不是拼命三郎的个性，因此即使被迫要长时间工作，我也会在上司或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稍微偷懒一下，让自己有个喘息的空间可以保存体力和精神。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忙里偷闲，我实际上受到的疲劳轰炸应该会更加严重吧。可是，过世的

这两位年轻女性，想必真的是就连加班时间也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吧。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过于认真而发生了悲剧。

这两位年轻女性的过劳死事件，想必对今后的日本加班文化带来很大影响，我也深切盼望这种武士道「奉公灭私」的前近代思想的遗毒，即日本社会里的加班文化，能够确实获得改善。

加班并不是坏事，可是选择不加班的人却备受责难，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即使是加班，也应该是能够在放松的状态下在家工作，或者是上司必须强制规定下属一个礼拜至少休一天假等，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让工作变得更有弹性且人性化。

要如何避免再度出现像佐户和高桥这样的牺牲者，就端看日本人能否找到根治「加班病」的处方笺了。

我是「倭人」

日本人喜爱《三国志》。与《三国志》相关的小说和漫画总能登上畅销榜。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等英雄的名字几乎被每个日本人所熟知。

日本人读的《三国志》主要是诞生于中国元朝末期的《三国演义》，但很少人知道，该着作的基石其实是西晋歷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后者记录了魏、蜀、吴三国歷史。

在《三国志．魏书》的第三十卷《乌桓鲜卑东夷传》中，东夷传的最后列有「倭人」条目，日本人称其为《魏志倭人传》。这篇文章并不长，仅有两千字左右，但在日本家喻户晓。

原因在于，《倭人传》首次将日本当时的社会样貌与传说中的女王—卑弥嘂的名字写在一起。

在这里，希望读者注意一下《倭人传》这个题目。倭人指的就是日本人。我在中国媒体发表政治相关的文章时，往往会在下面看到带有「倭寇」字样的评论。每当此时，我都会想起《魏志倭人传》，感觉自己穿越到三国时代。

倭寇指的是明代时期袭扰中国沿海的海盗，是一个用来批判日本的词语。我也不笨，当然知道这一点。我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读过蒋介石留下的日记，每当他表达对日本的不满时，都会使用「日倭」、「倭寇」等带有「倭」字的词语。

如今也是一样，当中国人想贬低日本人时，就会使用「倭」字。另外，还会用「小日本」等蔑称，但「倭」的传统色彩最为浓重。

「倭」由「人」和「委」组合而成，意指个子矮的人。个子高自然比个子矮好，所以这的确是个带有贬义的字。

被人用贬义词称嘂时，大家一般都会感到不快，毕竟谁也不愿意被人使用蔑称。但对我而言，虽然「倭寇」不是好词，但被叫做「倭」、「倭人」也不会感觉讨厌。不仅是我，很多日本人有可能都对「倭人」

的称呼并不那么排斥。

在日本各地，有些餐厅的名字里就带有「倭」字。我曾经走进东京一家名为「倭」的居酒屋，询问了店长该名字的由来。店长的回答是，「倭」字的发音（Wa）好听，字形也很漂亮。我当场也表示贊同。

是的，「倭」在日本并不一定是贬义词，而是一个能让人感受到民族歷史情怀的文字。日中两国在对这个字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

之前访问九州福冈市美术馆的经歷，让我再次认识到这一点。

福冈市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是闻名全国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战后，它在福冈市志贺岛的一片农田中偶然被挖出，震惊了整个日本。

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轰动，是因为中国史书《后汉书》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向倭奴国王授印。这里提到的「印」，应该就是在福冈市志贺岛被发现的金印。

我以前就听说过这枚金印，但亲眼目睹还是第一次。它的尺寸比想像中的要小，反射出明亮的光芒。印上刻有蛇纹，设计十分美观。对于这枚比当今的钻石还要耀眼的金印，当时的日本人想必无比珍惜。

古时的日本诸国割据，其中的奴国向汉朝派遣了使节，并得到光武帝的授印。「汉委奴国王」这五个字，可解释为「汉朝向倭地上的奴国国王授印」。

顺便一提，「委」通「倭」，古时刻印的文字，有时会加以简化。

我在观察金印时想到，由于日本很长时间都没有固有文字，仅凭日本自己的史料，是无法回顾七世纪以前的歷史的。幸好中国的史书中关于「倭人」的记载，使日本人瞭解到了自己的歷史，并且还透过金印知道了自称为「倭」的过去。这枚刻有「倭」字的金印，也是从中国获得地位认可的证明，因而被视为超越国宝的存在。

日本人是在七世纪之后才使用「日本」这一名称的，之前都自称为「倭国」、「倭人」。关于日本为何自称为「倭」，古代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较为可信的一种是以发音来加以分析的。

日本人古时称自己为「吾」（发音为Wa）。别人问「你是谁」的时候，日本人会回答：「吾」。在日语中，「吾」和「倭」的发音相同。

与此同时，「倭」又与「和」同音。对于日本人来说，「和」字带有特别的含义。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还存在着日本等同于「和风」的说法。因此，可以说「和」字代表了日本，其发音「Wa」也深受日本人喜爱。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日本人身高较矮，所以被中国称为「倭人」。当时日本人对于汉字并不瞭解，就把「倭」当成一个好名字来使用。

到了七世纪，中国文化大量传入日本，日本人意识到「倭」字并不好，于是把「倭国」改为「日本国」，「倭人」改为「日本人」。《旧唐书．东夷传》中记载：「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日本知名民俗学家佐原真在着书《魏志倭人传的考古学》中写道，日本弃用「倭」字之后，无论是朝鲜人称呼十六世纪末入侵的丰臣秀吉，还是中国人称呼十四、五世纪的日本海盗，用的都是「倭寇」一词。直到一九三七年的日中战争，「倭寇」的说法仍然存在。

纵观歷史，中国始终没有捨弃以「倭」指代日本的做法。

反过来，在日本，「倭」是日本人称呼自己的「吾」的词源，后来又被发音相同的「和」字所取代，成为象徵日本这个国家的重要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倭」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富有传统色彩的关键文字。

日本人把从中国传来的孔子的教诲──「以和为贵」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准则。前文也已提到，「和」和「倭」在日语中发音相同，再加上日本人很珍惜「倭」的名字，因此「以和为贵」或许也能写作「以倭为贵」吧。

日本人和儒教

在东京，想看最大的孔子像的话可以去御茶水。御茶水是东京的学院派中心。这里聚集了很多大学和专科院校，日本最着名的书店街──神田旧书街，就在附近。位于江户城北侧城壕一端的这片区域，从江户时代起就是日本的学术中心。

御茶水有一处名叫汤岛圣堂的地方。传说这里能帮助学子金榜题名，每到大学入学考试的季节，都能看到孩子来到坐落于此的一座三公尺高的孔子像前，深深鞠躬。

之前，我带一位研究日中关系的年轻中国学者来这里时，他大吃一惊。因为这处汤岛圣堂孔子庙的建立，远远早于中国人、华人大量涌入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

汤岛圣堂可追溯到一六九○年，始于五代将军纲吉把江户幕府儒学教师林罗山的宅邸内的夫子庙（先圣殿）移设，进一步扩大规模并加以修缮，作为江户幕府的官学府。从那时起，与孔子庙相关的一系列建筑物被称作「圣堂」。

那之后，一七九七年又进一步扩大规模，开设「昌平坂学问所」，当时参考了过去朱舜水（中国明朝的遗臣）为水户德川光圀制作的孔子庙模型。里面供奉的孔子像也是朱舜水带到日本来的。这处汤岛圣堂见证了日本人如何努力学习儒教，将它作为一门学问去钻研，是非常珍贵的歷史遗迹。

中国近代的文豪鲁迅年轻时曾到访汤岛圣堂。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进入了专门招收外国人的弘文学院。在那里学完日语后再升入高级学校。鲁迅在弘文学院的老师的带领下去了汤岛圣堂。

老师善意地告诉鲁迅：「看！很怀念吧。好好拜一拜贵国最受敬仰的孔圣人吧。」但鲁迅的内心却充满厌烦，心想：「已经受够了孔子才来日本的，到了日本还要拜孔子吗？」当时中国正值革命前夕，去海外留学的年轻人心中充满了反儒思想，可是日本人却误以为只要是中国人

就都是虔诚的儒教徒。

这有点像「只要是日本人都无比尊敬天皇」的误解一样，但稍有不同的是，日本人一千多年来一直从中国引进儒教的各种各样学说、教义，奉为人生的导师敬仰学习，所以对于「中国人讨厌儒教」之类做梦也想不到。

说到这里，想起了另一个比较相似的误解，我经常听外国人说「日本的儒教文化圈如何如何……」，可是日本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属于儒教文化圈。文化，如果是以宗教背景为依託的话，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佛教，在此之后才是儒教。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吧。而且，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在日本都被视为宗教，但只有极少数人将儒教定义为宗教。

关于儒教的内容，毫无疑问，日中之间也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差。

我有一位朋友的名字里带「忠礼」二字。他五十岁左右，和我几乎是同辈人。他的父亲十分热衷于读孔子学说，因此给他取名时使用了在儒教中与「仁」、「义」并重的「忠」、「礼」二字。最近很少看到有人起这样的名字，但昭和时代前期的日本人还有着从中国古籍中给人命名、选择雅号的习惯。

对于忠与礼，日中之间的认知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些理念在两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其重要度各不相同。极端来说，日本人极其推崇忠，中国人则不及；中国人十分推崇礼，而日本人则不及。

在日本最有人气的歴史剧要数忠臣藏的故事了。一位主君遭到敌人暗算，家臣为了雪耻报仇，制订了缜密的计画，最终将仇敌杀死。在《三国演义》中，日本人最喜爱诸葛亮与关羽，这种感情中就包含了对他们忠诚精神的感动。

日本特别强调的是「灭私奉公」的精神，即完全不考虑自己，无条件地忠诚于主君的姿态。日本的江户幕府利用儒学者宣传着忠的理念，试图最大限度地在武士阶级推广这种对幕府有利的社会道德规范。

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精通于日中文化比较学的王敏认为，忠的理念在中国并没有如此彻底。虽然忠诚非常重要，但对愚相与昏君的效忠并不会得到好评。简单地说，就是向恶者效忠的人也会变成恶者。总之，

在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情况下，盲目效忠的行为是被否定的。

而日本的忠则是盲目的忠，并不存在评判主君善恶的普遍标准。与根据「天命」来判断领导人善恶的中国价值观相比，日本在本质上存在着些许差异。儒教到了日本吸收了当地的风土要素，已经发生变化。虽然原型得以保留，但运用方式出现了差异。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不存在「天命」一说，忠诚只是偶然相遇的君臣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

而关于礼，中国人已经进行了极为细緻的研究，其体系在三千年前就已构建完成。毋庸置疑，种种礼仪都体现出了中国的文化与精神。例如，中国人非常重视秩序与阶级，这既是出于对礼的尊重，也因为礼本身就是社会秩序。

但日本人对于礼的喜爱程度并不高。世人都说日本人懂礼貌，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礼仪原本是礼节的一种，「见到他人要低头」、「受到照顾时要表示感谢」—日本人都记着这些礼仪，并且一直都在实践，但并没有思考过「低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既定规则，日本人能够严格遵守，但由于其中并没有深层的思考，所以在日本，礼的理念内部的精髓出现了空洞化。

茶道是很好的例子。作为一种仪式，茶道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自身的含义。但现在的茶道老师连这些含义都不知道，只是一味地专注于忠实还原这些动作本身。

忠与礼在日本与中国的应用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而这也正反映出了两国之间微妙的不同。

日本与这样的中国在对儒教理解上的差异，总而言之，是因为对于儒教的宗教性部分和处世之道的部分，日本人没有接受儒教的宗教性，而只接纳了处世之道的部分。所谓的处世之道，换言之可以说是「人的伦理」。

在这点上产生误解的是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耶稣会的人。耶稣会的法兰西斯．赛维尔是把基督教传到日本来的第一人，但他在晚年认为想要让日本人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必须先让日本人所尊敬的中国改变信仰。所以他在一五五二年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最后在广东省的一个小岛上病死。后来，耶稣会继承他的遗志开始在中国修建教堂。

他们在中国把目标锁定在领导阶层。在日本，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高山右近、小西行长等杰出的战国大名都信奉了基督教。在中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大名。中国的统治阶级是高级官僚。但是，让高级官僚改变信仰，面临很大的难题，这是因为儒教的宗教性成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拥有崇拜敬仰的对象。

中国的领导阶层过去祭祖先、祭天地、祭孔子，因此不会接受基督教。在中国一旦被任命为官僚，都要去祭拜孔子。禁止他们这样做面临相当的难度，因为那会让他们丢掉乌纱帽。

在日本，武士阶层把儒教作为知识教养加以学习，但对于它宗教性的部分并不关心。耶稣会的人在中国传教失败，因为他们轻视了儒教在中国的影响力。

这同时也证明了，在日本只有名字上称其为儒教，但并不把它作为宗教，而是用于「教育」、「教养」等含义。总之，它是一门作为学问、教养而存在的儒学。在中国，从很早以前就在讨论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了，但在日本这样的讨论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在日本，儒教没有类似祭祖先、祭天地那样的祭祀活动。

对我这样学中文的日本人来说，最伤脑筋的是中文里对亲属关系的称呼有着严密的区分。

日本人称呼亲戚的叫法非常单一。在中国人看来或许太随便了吧。「叔父」、「伯父」也不区分，都叫「おじ」就可以了。而在中国，对父亲的哥哥称「伯伯」，对父亲的弟弟称「叔叔」。对母亲的兄弟也分别有不同称呼。为什么对这些亲戚要有不同的叫法呢？因为这与祭祀有关。不确定好明确的称呼和序列，在祭祀的时候就麻烦了。

日本人对于亲戚的称呼方法不像中国那样明确，是因为原本日本没有作为祭祀而存在的儒教，是后来才传入的。

我进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被派往佐贺县。佐贺县是九州地区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有个更小的地方叫多久市。每年春秋两季，多久市都举行「释祭」活动，我赴任后第一次采访任务，就是去采访「释祭」。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百行的稿件，最后被删成一篇三十行的小报导刊登出来。「释祭」非常隆重，礼仪很讲究，电视臺等其他媒体都来采访报

导。

为什么多久地区会举行「释祭」呢？据说有个叫多久茂文的人，一六八六年成为佐贺藩的藩主。他从小就非常好学，崇拜儒学，后来建了祭祀孔子的多久圣庙，致力于文化教育。

有时日本的当权者也能理解儒教的本质，认为有必要举行类似「释祭」的隆重仪式，但像多久茂文那样的类型实属少数派，大多数把儒教当做一门学问来对待。

所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孔子和他弟子的名言经常被挂在嘴边，比如「今年四十岁了，进入不惑之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甚至不知道这些典故来自中国。

后来，世人对儒教的评价不怎么好。儒教是封建性的产物，支撑着古代的家长制度。儒教是父系家长制的理论体系，轻视女性；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强迫子女对父母绝对服从……类似这样的批判越来越多，给人的印象彷佛儒教成了不适应新时代需求的一无是处的负担。可是，我们能就这样全盘否定儒教并与之撇清关系吗？

事实上不知不觉中儒教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日本的葬礼就是很好的例子。日本人的葬礼基本都是佛教式的，但内容却是充满很强的儒教色彩。本来，如果是佛教葬礼的话，应该将遗体旁放置的写有「南无阿弥陀佛」等字样的挂轴视作本尊加以祭拜，日本人都向棺材内的遗体低头鞠躬。追思个人，烧香祭拜，关切慰问遗属，但对本尊却视而不见，彷佛不认识一样。

日本人为什么拜棺材呢？因为这并非佛教的仪式，而是儒教的规矩。另外，在日本的葬礼中，僧侣诵读完佛经后要搬出棺材时却匆匆忙忙退出，这也稍显不自然。僧侣诵经超度逝者，为什么不陪伴逝者一直到最后呢？

其中缘由也和佛教对尸体的态度有关。在佛教中死者的肉身成佛后，尸体只不过是单纯的物体，不再具有佛教意义。所以僧侣不能参与搬运尸体的仪式。但在儒教中，尸体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儒教认为，死者的灵魂能够再次返回这具肉身并附着其上。所以死后把遗体原样不动地埋葬在土里，举行仪式悼念死者。本来，儒教不火葬遗体，火葬遗体

的是认为尸体不再有用的佛教。但最近，或许也有物理环境变化的原因，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实行火葬了。不过后人对遗骨的讲究还是存在。像祭拜火葬后留下的骨灰，原本佛教里没有这些做法，这么做正反映了顽强的儒教残留下的影响。

儒教在日本被大家选择性的接受。比如对待家人、对待祖先的讲究、婚丧嫁娶等仪式，只吸取儒教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世、人生哲学等方面，儒教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大。日本式精神的代表、武士道中就深受儒教的影响。

可是，若说日本人信奉儒教吗，我的回答是No。日本人选择性地吸取了儒教。它作为一门学问是必要的，但对于其背后的宗教理念，日本人没有接受。这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尽管吸收了西洋的科学技术，但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受基督教文明一样。中国人当年对待西洋文明时「中体西用」，日本人对待儒教的接受方法大概就是「和体中用」吧。

被误解的日本人

日本人似乎总是被中国人误解，但凡与中国人有些来往的日本人，或许大多免不了会有这样的感受。

然而说到底，毫无误解的人际关系并不存在。恩爱夫妻、亲朋好友之间也多少存在着误解。国与国之间的误解则更甚。

日本人自然也对中国人有所误解。但就我的切身体会而言，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误解要多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且更为根深柢固。

中国人原本对日本人所知甚少，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一百多年以前。理由很简单，纵观中日两千年的交流史，中国虽然在汉代已有史籍提及日本，但整体而言，古代中国人并无兴趣想具体瞭解日本，也没有感兴趣的必要。

日本人是怎样一群人，在想些什么，信仰又如何？这些对当年的中国人而言，都不是值得费脑筋的问题。近代以前，日本与中国之间仅有过一次战争，而且还是被日本称为「元寇」的元军侵日。严格说来，这场战争中，日本的对手并不是汉族，而是蒙古族。

中国的歷史上，大凡诞生一个新的王朝，统治者往往都一心放在统治广袤疆土，或是抵御来自北方或西方的异族侵袭上，但也没必要为此与远隔海外的日本结盟。简单来说就一句话，你在我的「视线之外」。所谓「一衣带水」更像是一句客气话。

现在的中国，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写作了不少出色的日本论。然而从累积程度来看，还是远比不上日本人的中国论深厚。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日本论近于空白，即便有一点，也都笼统，还混着猜测与传说，因此后来的分析基本上总还是流于表面，自然也免不了有失误。归根结柢，所谓对外认识，只能是透过本国人视线的一种累积。仅仅一百年的累积，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比较像样的日本论出现在近代以后。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打

败了清朝，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顺利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在清末民初时期，首次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然而，此时尽管出现了不少日本论，但整体而言，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多半很严苛。

日本人吸取了中国文化，但，并未完全模仿。确切地说，应该是日本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本国文化而利用了部分中国文化。日语里有许多汉字，在假名文字中以单词形式出现，但这并不能改变日语语言的基础是假名文字的事实。

再说茶道。从中国引进而来的粉茶，至今仍为日本人所喜爱，而将茶文化提升至「茶道」，却是安土桃山时代的千利休及后世茶人努力的结果。如今的中国，粉茶几近绝迹，但在日本，粉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发展至糕点餐食之中，茶文化在日式饮食文化中发展多元。

但问题是，直至日本在各方面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今天，中国人对于「日本学」和「日本论」依旧不甚关心。

如今，中国的街头巷尾的确也充斥着不少有关日本人的书籍或论着，但这些文字并非出自于希望深入理解日本的好奇心，而是期待着挖掘一个「奇特的日本」、「不可思议的日本」、「超乎想像的日本」。这算是东方主义视角在亚洲的一种变形。

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溯源至文化上的歧视观念。换言之，中国人的深层意识里还是觉得「日本固然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到底不多」。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我要肯定一点，那就是中国人从不避讳对「日本的科学技术」的肯定和尊敬，也常常表示要学习日本。但对于日本人的文化或思想，向日本人学习的姿态还是有所欠缺。

也因此，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整体而言，对于东京、京都以外的非主流地方的乡土文化并不十分感兴趣。这与日本人希望深入研究和瞭解中国每个角落的态度形成了对比。也是这一差别，导致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之多。

那究竟都有哪些误解呢？我最先想到的便是过度揣测日本人的「恶意」。

中国人总是怀疑日本人在打着什么坏主意。这其中固然也有源自中

日战争等无奈的歷史原因，但同时我也认为，是由于中国人对日本人不瞭解。

日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群深思熟虑，或是拥有长期视野的人。这话听起来好像说日本人是一群傻瓜，其实不然。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中，人世虚无，人终有一死，也许明日，也许今朝，又或许十年之后。面对如此无常的人生，与其苦思冥想，不如珍重当下的心情，活好现在。

日本人绝对不会有和中国人一样「名垂青史」的想法。日本人当然也重视名誉，但重要的不是留名于史，而是那一瞬间的名节，至于百年之后的名誉，任谁也无能为力。这又涉及到日本人的生死观和自然观，也是中国人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最能如实反映这一问题的，是中日间产生政治对立时双方的应对之态。日本人的想法基本是临机应变的。日本人从不想让事态恶化，多半都抱着「差不多可以了」的态度息事宁人。然而，中国人看到日本人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总会心生怀疑：是不是因为打着什么坏主意，才故意显出这种不清不楚的态度。

日本人容易被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转变得太快。精通中国文化的评论家竹内好说过，日本文化是「转向型文化」。对于这种转向，往往本人没有罪恶感，周围人也不会予以责难。

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局面是如幻灯片一样一帧连着一帧不断变化的。这就好比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换乘式」想法。但这种「换乘」往往显得很没节操。老实说，我也经常对日本社会中这种变节之快感到愤懑。公司里，昨天还坚持某一立场的人，第二天就换了立场，还能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关于这一点，欧美人秉承的一元论世界观，在亚洲这样的多元化社会里并不适用，因此他们的确很难理解。但更进一步来看，同属亚洲的中国人虽然与日本人一样生活在多元宗教观的社会中，却同样无法理解日本人幻灯片一样的生存方式。

因为，中国的多元化社会中所蕴藏的法则，并不是日本的「换乘式」，而是「区分式」。儒教、老庄、法家、墨家……中国自古就有相悖的思想主张相互攻击、相互依存的歷史，也因此中国社会常常爆发各

种斗争。

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战后回到日本，写下一篇题为《两边倒》的随笔。「两边倒」是内山自造的词，仿自毛泽东的「向苏联一边倒」。按照内山的说法，中国人本质上是遵循「两边倒」的。中国人听任何话常会觉得「弦外有音」、「话中有话」，做事前常权衡再三。这与中国人看待人事的观念是相联繫的，中国人认为，真实的背后还有其他的「真相」，不利的事情随处可以遇见。究其原因，还是不相信人，对危险很警觉。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对复杂人性的一种宽容，以及对待自身行为的一种谨慎态度。

与之相对，日本人则更容易「一边倒」。一旦有什么好事，就很容易眼里只盯着这一样。常有意见认为日本人优柔寡断、反应迟钝。恕我不能苟同。日本人恰恰是做决定过于迅速。被周围的环境氛围左右，一瞬间就做了决定，事后则往往万般悔恨。

第一个指出日本人具有「耻意识」，却没有「罪意识」的是文化人类学女性研究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奉美军之命，对日本人的心理加以分析，编着了《菊与刀》一书。集其分析研究日本人心理之大成的这部着作，至今仍大受欢迎。书的内容主要是对日本人精神构造深入分析，指出日本相对于罪感更注重耻感。这一论断又被称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那么对中国人而言，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哪种更强烈呢？我以为，两者兼半。

孔子将耻视为人内在的道德意识，认为做人要有羞耻之心。在孔子之后，孟子明确地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可理解为羞耻心即是施行义的出发点，一旦做了坏事，羞耻之心会来主持正义，捍卫道德。中国人有一个重要观念：「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由此可见耻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有多么重要。蒋介石也曾将「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政府的宗旨，日记中常常提起要对日本「雪耻」，以一雪前耻作为人生的目标。

内在的道德即是耻感的根源，这种感觉下，中国人的罪感与耻感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

而日本人却缺乏这种内在的罪恶感。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大概就是

「添麻烦」这个词了。

在日本，引发问题的人在记者会上，基本上都会说的一句就是：「给大家添麻烦了，实在抱歉。」因为社会普遍觉得，不说这一句的人就不是在反省。而大多情况下，这句「添麻烦」所指向的对象，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这里当然也包括对实际受害人的歉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对于「社会整体」的致歉。我并非精通全世界的道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或以何种方式道歉，其对象都包含直接受害人和社会整体两个方面。但在日本，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先向全社会道个歉就好，此点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

因此，日本的道歉，常常让人看不清到底是对谁道歉、对什么问题道歉，这也就成为招致误解的一大原因。

中国对于「罪」有强烈的伦理观念。未能名垂青史或是没能给家族子孙留下财产，既是耻辱，也是罪过。翻看儒家经典《尚书》，关于罪的文字远比关于耻的文字更多。但这里的「罪」指的是违反「天命」之罪，而能定罪的「天」，与其说是人格化的神，倒不如说是每个单独个人内心的「天」，它拥有绝对的判断基准。

与之相比，世上怕是没有比日本人更缺乏罪恶感的民族了。围绕对歷史问题的道歉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解，在我看来，的确是与之相关的。日本人的确在反省，也明白绝不能重蹈覆辙。但毕竟没有外界期待的深刻罪恶感，因此，在中国看来，日本根本没有严肃地反思。因为没有「神」或「天」的概念，所以看起来总是有些不够重视，相对而言也确实不够重视。但这不是日本人看轻歷史问题，而是日本人内在的「罪恶感」，从本质上而言就不够深厚。

如上所述，中日间误解的种子实在太多。何况，与花了一千五百年潜心观察研究中国的日本人相对照，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不过短短百年，误解之多也是必然。在此，我希望中国人能有心理准备，理解日本的道路（当然是在愿意去理解的前提下）远比想像的更漫长。我心中默默期待，未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误解能有所减少，对日本人的恼怒也能少于如今。

日本现在进行式

现在的日本人确实越来越不会写汉字了。
感觉日本人连正视这个问题都觉得麻烦，不愿意去想它。
过去是「会写不会读」，现在是「会读不会写」。

不会写汉字的日本人

之前，我在银座的一家义大利餐厅和採访对象吃完饭结帐时，打算跟服务生要收据。我告诉他在收据抬头写上我的公司名称《朝日新闻出版》。眼前这位男服务生写到「朝日新闻出」的时候停下了笔，表情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出版」的「版」写不出来。我刚要说「版权的版」，转念一想这么说跟没说一样，就没开口。我又跟他解释「左边一个『片』，右边一个『反』……」最后总算写出来了。

当时的气氛真尴尬。我再次受到了冲击━原来还有成年人不会写「出版」的「版」字。这绝不是笑话，正是「出版的危机」吧。

实际上，日本文化厅实施的二○一一年《关于国语的舆论调查》也显示，与二○○一年时相比，「感觉自己写不出汉字了」的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文化厅分析认为，这是受电脑和手机（具备汉字转换功能）普及、手写汉字的机会减少等影响，并且预测「今后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扩大」。我也有同感。

更糟糕的是现在的日语教学中，「教育汉字」越来越少。「教育汉字」一○○六个，常用汉字二一三六个。如果能识读这些汉字，大概就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有人说一般日本人实际使用的汉字也就五百个字左右。战后「教育汉字」和常用汉字一直在逐渐减少，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了。

中文里有多少汉字呢？据说一九九四年版的新华字典收录了八万五千个汉字，真的是「字海」啊！其中大部分都是我没见过的字。

中文的确比日本使用的汉字多，尽管如此，据说在中国大概认识一千个汉字左右就能写百分之九十的文章，会两千五百个汉字就能写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章，会三千五百个字就能写出百分之九十九．八的文章。总之，掌握两千个字就算不错的知识分子了，掌握三千个汉字更属于学者级。超过五千个汉字可能就是隐者或圣人了吧。

这么想来，我们彷佛是浩瀚的汉字海洋边上的浅滩中戏水的小孩子。

汉字变得越来越简化不仅发生在日本。韩语中丢弃了汉字改用韩文字母，认识（用汉字写成的）歷史文献的人只剩下专家学者了。中国也为了提高识字率而大量使用简体字，原本的表意文字事实上变成了表音文字。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读古典书籍。执着坚守繁体字的只剩下臺湾和香港等地了吧。

我的大儿子在臺湾接受了四年的小学教育。经过观察发现，他用在功课作业上的精力中四成耗在练习汉字上。离开臺湾时大儿子说：「很喜欢臺湾，但讨厌学汉字。」回到日本后他乐坏了：「真是太喜欢日本的学校啦！不用练习写汉字。」辛苦也有相应的回报，当时他在臺湾学的汉字水准在日本已经是中学生程度了。所以如今上了中学后他的国语成绩也很好，他自己也承认多亏了在臺湾学习的汉字。当然「出版」这种程度的汉字他信手拈来也没问题，只是中文和日语里有的汉字写法多少不太一样，考试的时候会搞错。

保护汉字这种文化重要，还是透过汉字顺利沟通更重要？毫无疑问这因人而异，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可是，汉字原本有许多是「表意文字」，最重要的是这些字即使不知道发音也能认识它并理解含义。所以中国的革命之父孙文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就是日本人汉学教养保留较多的年代，透过「笔谈」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在革命上获得了很多援助。

另外，清末的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来到日本，和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当时日本一流的中国文化通结交下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基本上也是透过简单对话沟通，涉及深奥的专业内容就用笔谈来交流。

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论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即使因外语或方言的阻碍而语言不通，也能用汉字来沟通。这一点意义重大。即使不会发音、读不出来，只要能写汉字就发挥了它的沟通作用。这是汉字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异民族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力，中华文化的传播经由汉字这一非常便利的工具，逐渐渗透到汉字文化圈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当今这个时代无论电子邮件还是网页都能瞬间翻译，没必要

在意会写到何种程度。那个写不来「出版」的版字的年轻人，肯定能认出这个字。我也如此。多亏了键盘，不管谁要我写出稍微有点难度的「郁」、「宠」、「鹰」、「逊」、「遡」，我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敲敲键盘打出来。现在我也不想去费力学写这些字。总觉得有那精力的话还不如干点别的。

也有学者认为「电脑救了汉字」。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出现过要求废除汉字的讨论。我记得中国曾经有过将汉字字母化的讨论，日本也一样。有学者认为，直到电脑普及之前，世人对汉字的命运都很悲观。但电脑出现后，谁都可以「写」出很难写的汉字，汉字因而得以倖存。

最近日本人中兴起了一股罕见的汉字热。「汉字检定」考试的报名者每年接近三百万人。填空写汉字的游戏也很流行，书店里的货架上总是摆着关于汉字的各种图书。这些或许是电脑普及带来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文化的最大敌人可能是电脑，但从汉字得以广泛使用的角度上来说，电脑或许也是「汉字的保护者」。很难给出个明确的统一结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人开始主张重新回復繁体字，某种程度是受电脑普及的影响。

尽管如此，现在的日本人确实越来越不会写汉字了，应该接受这个事实。感觉日本人连正视这个问题都觉得麻烦，不愿意去想它。过去是「会写不会读」，现在是「会读不会写」。是喜是忧暂且不说。

不过看来我得做好心理准备了，以防将来哪一天餐厅的服务生对我发火：「『出版』这么难的汉字怎么写得出来？」

日本，穷人的天堂

每次去海外旅行时，我总是不自觉地比较国外和日本的物价。商品的价值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明明比日本物价水准低的国家却有比日本还贵的东西，而物价水准高于日本的国家也有比在日本卖得便宜很多的商品，总是不知不觉就会买了一大堆名产。这也是出国旅行的乐趣之一吧。

二○一四年十一月，我刚好在臺湾参加电影节金马奖的颁奖仪式。曾在东京接受过我採访的《白日焰火》导演刁亦男面对臺湾媒体的提问谈到了他对臺湾的感受，他说：「臺北物价比北京便宜很多，臺北是穷人的天堂。」

这一发言似乎招致臺湾社会不少的反驳，但刁亦男只是讲了个事实。有些商品，在北京确实卖得比臺北贵。

但在我这个日本人看来，「臺湾并不是穷人的天堂，日本才是！」

东京的麦当劳汉堡卖一百日圆，附薯条和可乐的套餐也只卖二五○日圆。怎么算，在东亚国家里都是最便宜的。为什么东京的物价如此低呢？回想起来，直到二十年前，东京的物价之高都是举世公认的。因为东京物价太高、生活成本大，不少外国人敬而远之。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中国人以留学生的名义到东京求职找工作，带来很多劳动力。

可是如今，很多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所感受到的恰恰是「说起东京，真是什么都便宜，太适合居住了」。

我在中国大连遇到一位中国年轻人，他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边吃边聊，他说：「我好想回日本。」

我还以为他一定是特别怀念日本的文化或捨不得日本人，但实际上只是我自我感觉良好。「日本的生活成本便宜啊。」

是，在日本想低成本地生活，即使是在东京、大坂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很多办法。

日本有世界闻名的百圆商店，差不多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能在这里找到；日本还有以吉野家为代表的速食连锁店，在这里用不了五百日圆就能点一份牛肉盖饭外加味噌汤、蔬菜沙拉和小菜的套餐；麦当劳的汉堡和薯条也是一百日圆。每天大约花等值三百臺币的一千日圆就能在外面享受还算不错的一日三餐。

而且，日本的房租看似很贵但其实绝对不贵。距离新宿地铁二十分钟车程的中央线附近有很多以学生为对象的廉价公寓，五万日圆就能租到一室一厅一厨的房子。因为现在日本面临少子化，房屋仲介处于买方市场，所以房租价格还在不断下降。

还有一点好处是，日本的薪酬水准也不低。打工时薪也有一千日圆。大学毕业生第一年薪资超过二十万日圆。这样一来，在东京能过得比较轻松吧。

在臺湾的话就不行了。因为首先，能一个人住的公寓数量没那么多，加以土地价格高涨，房租水涨船高，如果不是夫妻两个人都上班赚钱的话，付房租或还房贷比较困难。总之变成月光族，生活的实际感受都比较痛苦。

如今已经迎来日圆匯率走低的时代。这一趋势也逐渐把日本推向「穷人天堂」的行列。首次感受到这一点，是最近在採访过程中我对世界各地做物价调查时。

我透过问卷对欧洲、亚洲、北美、南美等地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令我吃惊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的物价水准已经跌至很低的程度了。比如对麦当劳的大麦克汉堡价格做一比较。所有国家的大麦克都用相同材料、相同烹饪方法做成，大小也一样。所以很容易反映出每个国家的人工成本、店铺租金等成本。甚至有「大麦克汉堡指数」，用以比较不同国家的购买力。

本来以为肯定是英国或者美国最贵，没想到最贵的其实是巴西：一个大麦克要卖六八四日圆，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价钱，如果个头也有两倍大就好喽……最便宜的是印度，二○四日圆，价格大约是日本的三分之二。中国的巨无霸汉堡和星巴克咖啡的价格接近日本的水准，而香皂和日刊报纸的价格则大大低于日本。

在中国感觉有点贵的是电影票。影院设施的豪华程度和是否是外国电影决定了电影票的价格，这是中式影院的特徵。平均行情七十元，但如果是三D的话就要两百元左右，这个价格远远超过日本的电影票。

可是，计程车的话，日本的起价七三○日圆是异常的贵。臺湾的起价三百日圆，泰国一二六日圆，马来西亚则是一百日圆……亚洲各国搭计程车都不奢侈。日本的计程车起步价七三○日圆，虽然低于芬兰的八三九日圆，排在第二，但高于其他十四个受调查国家。外国人都对日本计程车之贵感到吃惊，看上去的确如此。但每个国家乘计程车后的跳表计价方式不同，或许起步价并不完全能决定最终的价格。

意外的是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薪资水准，各国之间大不相同。每个国家的计算方法各异，或者根本没有这项调查而是用其他数字代替统计，所以究竟和日本人印象中的大学毕业生薪资概念相差多少还不确定，大家就仅作参考吧：日本大学毕业生月薪资是二十万四千日圆，与此相对，不仅英美超过了日本，澳洲差不多四十二万三千日圆，芬兰、巴西等国都超过日本的每月二十万日圆。

韩国的大学毕业生薪资也很高，超过每月三十万日圆。这是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的资料，以韩国三六九家创业公司为对象做出的调查统计。薪资很高的原因大概是统计对象都是正职员工的资料吧。

据说像三星那样的财阀系列的前十名大企业，给毕业生的薪资超过五十万日圆，前三十名大企业也超过三十五万日圆。韩国是个高学歷社会，大学升学率在百分之八十上下，但并非所有毕业生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被大企业录用是所有毕业生的梦想，就业过程中竞争异常激烈。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正职员工才有非常优厚的待遇，而非正职和待业毕业生与那些精英的收入差距非常大。这是个残酷的竞争社会。

总体来说，日本正逐渐摆脱过去那种物价超高的状态。物价水准不仅被欧美各国，还被澳洲、巴西、中国、韩国等超越。日圆走低的时代大幕开启，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储蓄日圆去海外消费的思维已经过时，赚外匯拿到日本来花更划算。

安倍政权诱导日圆贬值的政策今后还将持续。业界也有预测，匯率将达到一美元兑一三○日圆。日圆走低相当于国家实力削弱，我觉得从

长远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大多数日本人支持日圆走低，这也无可奈何。

如此一来，日本就越来越接近「穷人的天堂」了。

日本，留不住外国劳动者

日本没有一位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劳动者，也没有一位劳动移民——这只是这个国家的表象而已。

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有很多外国劳动者，但他们并非作为「劳动者」，而是以「研修生」的身分来日本工作再回国的。他们毫无疑问就是「劳动者」，但日本的政策不允许接收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政府在用这个办法「走后门」。

为什么日本不接收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人呢？原因有两点：一是工会组织担心他们抢了国内劳动者的饭碗，二是日本社会较为封闭，不愿接受移民。工会组织是左翼势力，而排斥移民的是右翼势力。也就是说，日本的左翼与右翼都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接收外国劳动力的制度一直无法开放。

但是，日本正面临人口减少的状况，劳动者人数不足。于是，日本政府在二○一六年十一月决定扩充完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在允许接受外国实习生的机械、金属、缝纫、服装相关的制造业、建筑业与农业等七十四种职业之外，加上了「护理」类别，劳动期限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二○一六年六月的实习生人数约为二十一万人，今后应该会继续增加。

实习制度的宗旨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做出「国际贡献」，但其实只不过是在日本劳动力不足的岗位上补充外国劳动者的手段而已。这种充满欺骗性的制度被扩大，我无法赞成。该制度原本的目的是增加「亲近日本」的外国人，我却遇上很多在日本工作时产生「反日」情绪的实习生。

在这样的实习制度下，实习生从职场失踪的问题不断涌现。二○一五年的失踪人数达到了五八○三人，相比三年前的二○一二年增长了将近三倍。作为对策，政府设立了名为「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的监督机关。目的是加强对接收实习生的企业，以及与实习生斡旋交涉的「监理团体」的监视，减少实习生的失踪现象。但与其加强监视，找到并根治

实习生逃亡的原因更为重要，若不对症下药，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另外，接收实习生的国内企业达到了三万多家，在如此庞大的现场加以监督并不可行。

失踪增加的原因，并不是接收实习生的「黑心企业」不支付薪资、侵犯人权，而单纯是因为失踪更能赚钱。在人手不足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愿意雇用外国非法劳动者的企业简直是要多少有多少。

政府虽然规定实习生的薪资要等同或高于日本人，但无论是什么职业，实习生的薪资基本都被压在各都道府县所规定的最低水准。再加上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仲介机构的存在，薪资会进一步降低，实际到手也就十万日圆左右。但若是非法劳动，每月能到手十五至二十万日圆。大家就是为了赚钱才来日本，所以即使有风险，也自然会走上非法劳动的道路。

现在，透过「外国人实习制度」来日本劳动的中国人也开始减少。中国实习生人数在二○一二年末是一一一三八五人，减少到二○一四年末的一○○○九三人。其原因并不在于企业对实习生的需求下降。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外国实习生的整体人数上升了一万六千人，达到了约十六万零八百人。

中国实习生减少的一大原因在于日圆贬值。这虽然会让外国游客急剧增长，但对于领取日本薪资的实习生来说，影响是十分负面的。对于被人手不足所困扰的单位来说，实习生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而占到其中近七成的中国人开始减少，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中国实习生都在哪里工作呢？主要是在偏远的工厂与农场。受高龄化影响，农村的农业人口在显着减少，而所补充的人手就是外国实习生，其中大多是中国人。漫步于偏远的农村时，我发现一个现象：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很多。通常在这种地方，居民都有车，即使是年轻人也会驾车出行。而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说全部都是外国人，但大部分应该是。同时，在农家工作的实习生多为女性，因为大家认为女性更适合从事单纯的劳动。有人说：「日本的农业若是没有实习生就无法维持，不雇用实习生，全靠自己的力量运作的农家已经成为少数了。」

农家一般都是家族经营。以前是父子两代，现在是祖孙三代人一起

干农活，繁忙时还要雇用附近的主妇作为临时工。然而，随着少子化与核心家庭化的进程，家中的劳动力不断减少，主妇临时工的时间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就需要依靠外国实习生。

在工地和中小企业的工厂工作的实习生都有公司准备的宿舍，而在农村里，实习生往往会住在农家中，以家庭一员的身分生活。遇上了好人家可能很幸福，但如果无法和谐相处，想必充满痛苦。

实习制度的宗旨是让实习生在日本强化曾在本国学到的技能，并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政府要求在农家工作的实习生来日本之前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但此规定已经名存实亡。派遣实习生的仲介机构会随意编造实习生以前的工作证明，因为多送出一个人，他们就能多赚一份钱。

几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位在日本的农场或工厂工作的实习生回国后利用学到的技能自行创业。当然，学到的东西里有些是有用的，但「研修」的原本目的显然并未实现。

随着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的薪资水准急剧上升。同时，日圆也在迅速贬值。二○一二年，一元人民币可兑换十二日圆，而二○一七年变成十六日圆，日圆贬值将近三成。如此一来，实习生十万日圆的薪资换成人民币之后会大幅缩水，大约在六千元人民币，而这样的薪资在中国沿海的工厂就能轻松拿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仲介的榨取。实习生的仲介机构比较复杂，派遣方与接收方各不相同。日本的接收方是持有政府认证的「监理团体」，负责将实习生分配到农家与企业。能坚持到三年实习期间结束的实习生仅有十人左右。除了中途回国之外，许多实习生都失踪了。

目前，越南正在兴起到日本打工的热潮，实习生人数在二○一四年末之前的两年增加了两倍以上，达到了约三万四千人。不仅填补了中国实习生减少的空白，甚至还能多出一些。从中国到越南，再到柬埔寨……为了寻找适合成为实习生的人才，不断进入薪资更低的国家──这已经成为能够说明实习生接收现状的一句话。

二○一六年从职场失踪的实习生人数，仅法务省报告中有统计的就达到了四八五一人，是四年前的近四倍。有关实习生受到农家与企业

「人权侵害」的批判报导不断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撰稿者都认为实习生逃离职场的原因是被迫做非法的、「奴隶一般的劳动」。

但实际上，接收方违法行为的一半都是与安全卫生相关的，与侵犯实习生人权毫无关系。接收实习生的大多都是中小企业与零散的农家，如果严格参照法律的话，即使是只有日本人工作的企业也有许多「违法行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的设计。

具体来说，就是规定要支付给实习生和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薪资，但实习生每月到手只有十万日圆左右。即使接收方按规定负担了薪资，仲介、政府、企业也会各自分成数万日圆，导致实习生到手的薪资被压低。当然，实习生来日本之前是知道这一金额并同意的，但实际来了之后，他们会吃惊地发现同样的条件下其实能赚到两倍。如果再加上被分配到的工作并不如意，往往就会走上失踪与非法劳动的道路。

要想防止这个问题发生、缓解人手不足的状况，只需对外国劳动者的接收制度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重新建立合适的仲介制度，研修生就能真正享受到几乎与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薪资。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失踪，还会有更多希望来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出现，人才的品质也能得到确保。如此简单的事情都无法执行，就是因为维持现有的实习制度能给官僚机构带来很多的利益与权力。

只要日圆不急速升值，中国实习生的人数今后应该也不会上升。即使是以越南为首的新兴国家的打工者，也会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时离开日本回国工作。届时，日本将从哪个国家接收劳动者呢？日本现有的实习制度绝不会带来光明的未来，我们需要以新的思考和态度面对外劳问题。

站着吃牛排的日本人

日本有一种「站着吃」（日语为「立食」）的文化。

例如，在欧美，大家边走边吃热狗。而日本几乎每个电车站前都一定会有「立食」荞麦面店或「立食」乌龙面店。全世界的国家大概只有日本这样吧。

在日本，若列举站着吃的食物种类，大概以荞麦面、乌龙面、咖哩、拉面等为主。

可是，之前在东京银座出现了一家店，人气爆棚，给「立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这是一家站着吃牛排的店。对日本人来说，牛排也是一种奢侈大餐的象徵。

一九七○年代，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家每隔几个月去一次牛排店。记得父亲总是很骄傲地对大家说：「喜欢什么就随便点吧。」我想点最贵的菲力牛排，可是妈妈说「小孩子嘛，点个汉堡就行啦」。大家因为这事吵起来……虽然过后记不得什么肉的味道了，但第二天到学校我还是得意地跟同学说「昨天去吃牛排了」。

日本在一九九○年代因牛肉进口自由化导致关税大幅下降，牛排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多么珍贵的奢侈品了。尽管如此，对日本人来说，牛排依然与「法式料理」、「寿司」并列，属于比较奢侈的食物之一。

这家「立食」牛排店名字叫「突然！牛排」，二○一三年底在银座开业。这家店人气非常高，正打算向全国各地进军，扩展势力范围。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它的介绍后我去银座店吃过几次。可是店门口经常要排起几十人的长队，上班工作的空档没法去吃，所以午餐时我就放弃去那里了。

有个週末我下定决心，做好不管排几个小时队我也要等的心理准备，专门挑下午三点这个客人最少的时段去。但还是有十五个人在排队，最后等了三十分钟才进入店内。

这里只能容纳二十个人左右。在店内侧，肉切好后被送到烤肉处。

桌子上有烤肉酱、盐、姜、沙拉酱、自助取用的水。菜单非常简单。肉只分沙朗牛排和菲力牛排两种，分量是按克卖的。沙朗牛排是每克五日圆，菲力牛排是每克七日圆。

我点了三百克沙朗牛排，花一千五百日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点了两百克菲力牛排，花了一千四百日圆。这和在普通餐厅里吃套餐的价格差不多。

点菜后五分钟就烤好的牛排是用炭火烧烤的，香味绝佳，肉质也很柔软、带甜味。这种口感和味道的牛排要是在餐厅里大概得卖五千日圆。对于「想吃肉」的人来说，从价格和味道的性价比来看恰到好处，所以很受欢迎。

最近在日本的饮食文化中，「站着吃」和「站着喝」的确成为一大流行趋势。过去在体力劳动者居多的城镇中存在着这种站着吃、站着喝的文化──大家一边畅饮烧酒或日本酒，一边品尝烤鸡肉串。但最近，西班牙料理、义大利料理等比较时尚高端的领域，有些店也开始向站着吃喝的形式转变。在此背景下，牛排这种高级料理的大本营似乎也逐渐「堕落」。

在国外，坐着吃饭被认为是一种守礼仪的规矩，所以一般人也许觉得日本那种站着吃饭是「不懂礼貌」。还有种观点认为站着吃对健康不好。也有些人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认为站着吃饭会导致消化不良，尽管不清楚具体的科学依据。

可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像外国人那样把站着吃和坐着吃区分得那么明显。椅子在日本真正得以普及是在明治维新以后，那之前的人或坐在地上吃，或站着吃。就连日本料理中很有名的寿司也不例外，最早在江户时代的江户城（东京），普通百姓站着吃寿司。那时像如今的麦当劳那样开始出现速食店。

战后的日本，站着吃的小店不断增多，这跟上班型态也有很大关系。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政府在东京、大坂等大都市的郊外到处建设规模巨大的公营集合住宅大楼。上班族为了从家中到公司上班，必须坐一两个小时的电车。早上起大早去公司上班，晚上下班回到家已深夜──这样的生活方式渐渐形成。当时在电车站内或站前，早上和夜里等车

的空档，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就能马上站着吃到荞麦面和乌龙面。在此背景下，这种餐饮方式大受欢迎。

另外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大米属于奢侈品，而荞麦粉和乌龙粉是从美国等地进口，可以稳定供应，所以站着吃的荞麦乌龙面店不断增加。据说也是受此影响，诸如站着吃的牛肉盖饭、站着吃的饭团等没能扩大规模。

尽管如此，之所以出现「立食」牛排，我认为在诸多背景中，当今日本的不景气、一些企业裁员所导致的经济低迷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说中国出现了禁奢令让餐饮业受到打击，但在日本，餐饮业的通缩倾向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来到日本的各位外国朋友，大概也为日本食物的便宜程度感到吃惊。吉野家的牛肉饭两百日圆、麦当劳的汉堡一百日圆、站着吃的荞麦面或乌龙面两百五十日圆、饭团一个一百日圆……有人感觉这些东西比在中国卖得还便宜。

另一方面，牛排、寿司本应守住其作为高级料理的「形式」与「价位」。但在寿司领域，迴转寿司完全破坏了价格行情，迅速普及。如今牛排的大本营也开始面临威胁。

可以说，日本出现「立食」牛排店，是日本的「立食」文化与餐饮业紧缩低迷现状相结合的产物。

走向一夫多妻制的日本社会

以下我要写的内容，说实话，无论从伦理还是传媒的角度来看，或许均不能断言其正确。但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我确实能够持续感受到一些，那就是「日本社会正在缓慢走向一夫多妻制」的这一现实。关于其理由，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

我的周围，围绕着两种人—结不了婚的男人和不想结婚的女人。结不了婚的男人，是指由于外貌、年龄、收入等原因，找不到结婚的对象，过了三四十岁还一直单身的男人。而不想结婚的女人，从条件上来说明明可以嫁得出去，却不想结婚。收入也有，工作也体面，外表嘛也不错，而且她们几乎都说：「好男人都结婚了呀。」

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各国的法律都在尽量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机会平等。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即种族、国籍、年龄、性别等所引发的歧视行为，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世界发展的大方向是禁止歧视。

日本的「男女差别」就算放诸世界来看也很严重，缩小男女差距方面的措施也很晚才实行，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外国人说「日本社会男尊女卑」，对此我也很难反驳。但尽管如此，男女差别毫无疑问朝着改善的方向慢慢发展。

截至目前，日本女性分阶段地逐渐走向社会。其结果是，日本二十至二十九岁年轻女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同年龄段的男性。

也就是说，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必要性越来越小。与此相对，那些出手阔绰，能够毫不犹豫请女生吃大餐的男人越来越少了。这样一来，女性因生活所迫，而选择结婚或离婚的情况也自然逐渐减少。

如果男女在经济上慢慢平等的话，不结婚而生孩子的女性也必然会增加。这表明女性的选择变多了，未必是坏事，反倒可以看成是社会更加富裕的表现吧。

而且原本恋爱这件事就是基于个人的自愿，所以只有在男女双方自

由选择、你情我愿的情况下，恋爱关系才能成立。因此女性自然会被那些有钱又帅气的男人吸引。

这样一来，条件优秀的男人，身边自然而然会吸引很多女性靠过来，形式上是否维繫婚姻关系暂且不提，事实上已经近似于一夫多妻制了。

我的一个男性朋友Ａ，週末和家人一起过。但週一到週五却和多个女性共同生活。作为室内设计师，他的收入是普通上班族的两倍左右。外表也不错，虽算不上是大富豪，但确实很有女人缘。

这傢伙说：「如果连续三次请对方吃好吃的，大部分女人都会跟我交往，即使我已婚。」这样的境界像我这种普通人是难以企及了，这近似于人类的原始社会法则──猎物多的雄性就能拥有很多雌性。

人类的进步有时会将人们带入不可思议的世界。过去一夫多妻制原本是世界的共通准则。中国、日本在近代以前都允许男人纳妾，奉行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后来，在接受欧美社会制度的过程中逐渐导入一夫一妻制，形成了「出轨是罪恶」的价值观。臺湾的法律至今还有「通姦罪」，背叛配偶被视为犯罪。

然而，全世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一夫一妻制。有统计显示，以伊斯兰世界为主的社会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承认一夫多妻制。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价值观里有个常识──社会自然而然从一夫多妻向着一夫一妻制的方向发展。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不禁要问这一价值观真的正确吗？

男人如果有能力，永远都想跟更多女性交往，这种本能尚且可以理解。但重要的问题在于，女性可以容忍一夫多妻这一点。现在的日本社会，在离婚对数增加的同时，非婚生子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女性觉得如果对方是优秀的男子，即使不结婚也想为他生孩子。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一夫多妻式」的时代，把每个社会成员都加以优先考虑的制度设计并不存在。

日本厚生劳动省每隔五年实施一次的调查（全国母子家庭调查）显

示，单亲妈妈的家庭中，拿到抚养费的比例尽管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仍仅为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在美国，如果拒绝支付法院判决的抚养费，当事人将面临牢狱之灾。在这一点上，日本是否急需改善呢？

当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是维持传统的家庭模式，这一点没有改变。但是，今后包括「松散的一夫多妻制」在内，社会或许应该接受多样化的家庭形态，最优先考虑子女的利益，不断使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

「小而精」的二○二○东京奥运会

对于日本获得二○二○年奥运会举办权这件事，日本人的共同感受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莫名其妙」，简直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日本人对于东京在投票中最终胜出这件事，基本上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朝日新闻》事前曾在内部多次开会讨论申奥的话题，从前方现场采访的记者那里传回的消息，全都是悲观的论调。主要原因是，西班牙马德里的势头急剧上升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洩漏事故让世界对日本产生了不信任。而且，经歷了「失落的二十年」，不少日本人已经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自信，世界究竟会不会再次把举办奥运会的重任交给日本呢？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电视上某位着名的体育评论家甚至断言：「如此糟糕的日本不可能胜出。」

过去名古屋和大坂也曾竞选申办过奥运会，但最终都鎩羽而归。所以关于这次东京申办二○二○年奥运会，社会上的怀疑论调占据主流，比如「这回也没戏吧」、「不是石原慎太郎的作秀吧」……谁都不相信日本能够赢得奥运会举办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的要由衷感谢世界给了日本这样一次机会。安倍政权成立以来，日本经济基本上在逐渐復甦，日本人的心情也像「雨转多云」一般。而这次东京申奥成功后，日本人的心情更彷佛变成「多云转晴」了。

关于日本申奥成功，中国的网路上出现了不少尖锐的意见，这在日本国内也报导了。而日本的网路上对此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击声音。不过在我看来，非常希望中国能把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传授给日本，多给东京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总之，过去专属于欧美的奥运盛会，如今在亚洲也能越来越频繁地举办了。举办奥运会对于亚洲来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亚洲各国相互之间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只是，这次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性格」会有很大不同。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目前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透过举办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其发展成就。过去的东京、首尔以及

北京都是如此。二○一六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也属于这一种。这次在投票中输给东京的伊斯坦堡应该也算这种奥运类型。

这些城市的奥运会往往是倾全国之力展现国家的骄傲成就，为此兴建很多豪华的设施或新设发达的交通工具，往往会办成一届奢华的奥运会。而且奥运会对这个国家来说也将成为一段辉煌的「传说」，铭刻在歷史上，世代相传。

另一方面，奥运会有时也在那些已经经歷了快速发展阶段的已开发国家举办。例如二○一二年的伦敦奥运。二○二○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属于这一类型吧。与北京奥运会相比，毫无疑问二○二○年的东京奥运会并非透过「大而豪」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梦」，而是凭藉「小而精」来展示一个国家的成熟。

我生活在东京都目黑区，我家附近就是驹泽奥林匹克竞技场。那一带的区域已经变成公园，我也经常去散步。这座竞技场就是为了举办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而建的，当年作为奥运会主场馆之一风光无限。

这座驹泽奥林匹克竞技场将在二○二○年，也就是距离上一次东京奥运会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次作为奥运赛场来使用。这座体育场的外观看起来已经显得有些老旧，大概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建和修缮吧。但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变得像鸟巢体育场那样熠熠生辉。可是我觉得，下一届的东京奥运会有这样的场馆设施就足够了。我也很想去一个从自己家走路就能到的地方看奥运会，可不想去离家很远的新体育场观赛。

二○二○年东京奥运会并非要展示场馆设施之豪华、发展速度之快，当然也不单纯追求奖牌数量。它应该成为这样一届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现日本这个国家的舒适、便利、清洁有序，以及日本人的亲切和热情。希望外国的朋友都来日本看奥运，同时体验一下这些日本社会好的方面。

廉价表态的网路「炎上」—日本的电脑民主主义

日语里有个词我很讨厌—「炎上」，原意指着火并勐烈燃烧，用于网路，多指网路上某一话题意外引发网友批判、嘲讽，演变成舆论事件。翻译成中文没有太合适的对应词汇，但作为日式语感比较浓厚的词汇近年来广为流传。这大概与日本重视「空气」（氛围），重视「安稳无事、与世无争」，重视「不给他人添麻烦」的文化关系密切。上述日本特色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绝不是坏事，很多时候还给外国人留下好感，但有的场合下似乎也会带来很大麻烦。

第二十届世界盃足球赛期间发生这样一件事。二○一四年七月九日，世界盃半决赛，巴西对战德国。德国队踢进第七颗进球时，朝日新闻社会部的推特帐号发了条推文：「都七比○了，换做地方上的高中棒球大赛的话，差不多该是裁判吹哨提前结束比赛的时刻了。」（在棒球比赛中因天气或球场上的特殊情况造成比赛难以继续进行，或根据比赛规则，两队比分差达到一定的程度等，判定比赛不能继续进行时，裁判有权命令比赛提前结束）

这条推文一发出，反驳与批评的留言如潮水般涌来：「这么说也太过分了」、「这样嘲讽东道主的惨败，是朝日新闻社的官方观点吗？」、「足球和棒球的规则并不一样。新闻媒体人连这点都不知道吗？」......大致是这种回响。日本的网路言论通常被所谓「网路右翼」的爱国青年支配，而代表左翼势力的《朝日新闻》已经习惯了在网上被他们当成批判对象。当时朝日新闻社会部的推特帐号很快就诚恳道歉，发推文称：「上一条发言说得过分了，所以删除掉。向那些因此心情受损的人道歉。」

道歉越早越好，为着起来的火苗「灭火」，从危机管理手册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做法吧。但这件事本身值不值得道歉呢？那条推文并不是在侮辱巴西，也没有写什么脏话。不管谁看了那场比赛，应该都觉得「结果已成定局了吧」。只不过发推特的人选取了「提前吹哨结束比赛」这个措辞罢了。

如果连这都吹毛求疵，那说实话包括推特在内的公司所有ＳＮＳ帐号都没法用了。如今《朝日新闻》鼓励员工在推特上积极发言，想方设法吸引读者的目光。可是，推特并非正式的新闻报导，基本上很容易带有个人感情。ＳＮＳ原本就是很私人的空间。如果媒体从战略上对其加以利用，那就应该事先考虑到伴随个人感情色彩所产生的风险，并保持一定的宽容。然而，面对「炎上」话题时，作为组织的防卫本能逐渐抬头，结果媒体就为那些以抱怨为乐趣的投诉者（网友）献上「祭品」。

我觉得这也与日本人对社会「空气」的变化比较敏感有关。日本人很害怕自己周围的「空气」（气氛）变得动盪不安。「空气」变了的话，就等于「给人添了麻烦」，赔礼道歉肯定没错──这种社会伦理总在发挥作用。这时，究竟给谁添了麻烦并不重要，当「空气」发生变化时，就是给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社会」带来麻烦了，所以作为一个组织就有十二万分充足的理由要向整个「社会」道歉。

截至二○一四年春天我一直担任主编的朝日新闻中文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曾经有员工在中国的微博上写了一句调侃「日本鬼子」的玩笑，被网友转发到日本的推特上以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在网上批评：「《朝日新闻》是反日报纸吗？」结果这一话题不断「炎上」。

详细内容比较复杂，这里就省略不提了，但我认为面对批评应该加以解释和反驳。因为我们并非特别针对日本使用「鬼子」一词来贬损这个国家。然而，《朝日新闻》作为一个组织，最终选择的对策是：删除这条微博，表明原博没有恶意并加以道歉。对我来说这是很让我不满意的解决方式。

因为，一旦道歉就切断了讨论「什么是正确的，哪里错了」的机会。可是，网路上大多数「炎上」的话题几乎都以「反正不管怎样先道歉再说吧」这种应对方式而告终。

朝日新闻社会部和中文网的例子基本是同样道理。背后反映出一种强烈观念──在日本，仅仅「惊扰社会」这一件事就算大罪。这种观念变成ＳＮＳ的弱点，助长了那些「炎上狂」，瞄准某个话题进一步煽风点火。

为什么在日本「惊扰社会」是大恶呢？因为日本人觉得，即使没违

反法令法规或其他规则，惊扰（社会）本身就是大错。我记得，小时候我父母和学校老师经常跟我们小孩子说「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惊扰社会的人」。

现在，日本各地都有「炎上」游戏。网友努力寻找可能「炎上」的话题，每天在网上监视着我们。一旦发现燃火点，之后的事就简单了。在推特上发「某某说了什么什么话」，只要疯转扩散就ＯＫ了。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种稍有些「违反道德」的做法确实为「炎上」游戏提供了绝佳的饵料。

网友也很聪明。专栏作家小田岛隆曾在广播节目中针对ＡＫＢ大岛优子的发言，用稍显过激的言论提出批评。可想而知不少人向广播电臺提出抗议。最初，小田岛和广播电臺都保持沉默，静观其变。但网友又向小田岛出演的节目的贊助商发去抗议：「你们公司贊助的节目里播放了这种发言，贵公司到底怎么想的？」从这种狡猾举动可知，网友十分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最终，广播电臺不得不要求小田岛修正自己的发言。

「炎上」与游行示威不同。谁都可以在舒适的房间里点点滑鼠、敲敲键盘。基本都是匿名的，所以连意见表达都算不上。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与辩论才好。并不否认，网路舆论有时比我们这些新闻媒体更敏锐地发现社会问题。

可是对那些过激的网路舆论太在意甚至忍让，反而会助长网民，让他们养成把「炎上」当游戏的坏习惯，同时也滋生另一个负面效果—让言论界的人士不断退化和萎缩。我开始觉得，得想点什么办法整顿一下了。但说实话，好像没什么良策。

天皇谈话给日本人带来的罪恶感

二○一六年八月八日下午，日本宫内厅发表了天皇的谈话影片，内容表明了天皇生前退位的意愿。我想在里约奥运和铃木一朗的三千支安打等诸多热门话题里面，没有一则报导可以像天皇谈话这样让日本国民看得目不转睛吧。在我的印象中，镜头前的天皇用如此恳切的语气发表内心想法，似乎是第一次。有些人甚至把这次谈话称为「第二次的玉音放送」，可见在日本的天皇制度里，像这样子的天皇谈话实属罕见事态。

然而，对于这段谈话影片，日本国内和海外的反应似乎有落差。当然海外媒体把天皇的谈话解读为「有意生前退位」并没有错，但光是这个标题并无法充分理解这则谈话及其影响的全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这一次天皇的行为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冲击力，因为从二次大战后到这次发表谈话以前，超过半个世纪以上，日本天皇几乎不曾明确表达己见，基本上都是透过皇室的相关人士思忖天皇的意向后，再间接传达给政府层级。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民众不习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直接听到天皇的想法。

其实，天皇的这段肺腑之言让许多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原因在于本来应该是我们去察觉、体恤的事情，竟然要劳驾天皇亲自开口，让天皇承受巨大压力，是我们失责。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次的天皇谈话，可以从天皇谈话的特殊性和日本国民的内疚感两大重点来讨论比较有意义。

总归来说，天皇制度也是由活着的人去运作的政治制度，无法脱离人本身，但是所谓的「象徵天皇制」里的「象徵」一词，把天皇也是普通人的一面暧昧化，日本国民可以深切感受到天皇一直以来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和忍耐，也没有去思考天皇的公务是否过于繁重。可是，天皇在谈话里如此明确地表达了退位的意愿，安倍首相也别无选择，身为天皇的臣子，他瞭解在以天皇为尊的日本国内充满了内疚感，因此也希望关于天皇的生前退位能够在法制上尽快着手修订。

天皇谈话发表的大约一个月前的七月某个夜晚，「天皇有意退位」的消息传遍了全日本，带给我强烈的震撼。并不是说天皇退位一事让人感到意外，而是天皇本人有退位的想法着实令人吃惊。因为，这意味着比谁都还要坚守天皇这个岗位的当事者，已经筋疲力尽了，才萌生不得不退位的念头。而且，「天皇有意退位」的新闻反而让我意识到我们日本人一直以来过于依赖天皇、习惯天皇的存在。

天皇的公务包括到世界各地积极开展访问活动。现在的平成天皇去过中国、韩国，还访问了菲律宾和帛琉。他在这些国家的土地上，一一回顾歷史，对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的战争责任，表达了发自内心的道歉和反省。这不禁让人觉得，当安倍首相的保守主义言行给亚洲带来不安的同时，天皇用实际行动努力化解。对日本人来说，这相当珍贵，几乎没有日本人否定现任天皇的所作所为吧。他代表所有日本人，做了一些只有天皇才能做的事。

但是天皇八十几岁了，如果他是普通公民，这个年纪早已退休，领着退休金悠然自在的安养天年了。这个岁数已经超过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可是天皇现在每天还要处理繁忙的公务，进行国事活动，有外宾来访时也得长久在宴席上陪同。到日本各地甚至海外的访问行程也多到不可胜数，或许可以说他是日本最忙的老人之一。

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日本人都忘记了他年事已高。天皇经歷过几次大病折磨，可以说是满身疮痍。他看起来脸部经常有些浮肿，听朋友说这是老年人特有的症状，或许天皇在体力上已接近极限了。然而，天皇要想实现生前退位却不是简单的事。最近一次的生前退位可以追溯到一八一七年的光格天皇。在一九四七年制定的皇室典范，甚至是一八九八年的明治皇室典范里，关于天皇的生前退位都没有任何规定。所以要想实现生前退位的话必须修改皇室典范，如果承认退位的自由，那么也就认可即位自由。之前，女性天皇的问题也讨论了很久但始终没有结论，一直被束之高阁。即使开始讨论，也会是一个相当费事的繁琐过程。

就我而言，当今的天皇是在我大学时代即位的。我是昭和年代末期长大的一代人，也被称为泡沫经济的一代。一九八九年裕仁天皇逝世，当时官房长官、后来成为首相的小渊宣布了新的元号是「平成」，日本

正式进入平成时代。现在的日本是同时使用西历年号和元号，平成是当今天皇的年代。然而，平成的大幕一拉开，泡沫经济几乎与此同时崩溃，宣告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终结，开始步入「失落的二十年」。

日语中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敬语，但面对天皇必须使用最高等级的敬语，而我谈及天皇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正确的敬语。我看电视的新闻报导时，可以理解听到的敬语，但就是不太会讲。过去我在公司上班时，连该对上司使用的敬语也是七零八落的，经常被误以为是不懂礼貌的年轻人，那么对天皇又怎么有办法把敬语说得流畅呢？所以，有的人听了我谈及天皇的讲话方式后，还误以为我有意否认天皇制，但这真是一大误会。我个人非常喜欢温文敦厚的平成天皇，甚至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时的亲和态度就很感动，要问我为何喜欢，我也讲不出确切理由，喜欢就是喜欢，很自然而然的。

坦白讲，我并不大喜欢昭和天皇。一部分原因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战争责任。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认为天皇制应该废除，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天皇制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说是一种「象徵」，但脑子里还是没有具体概念。可是，我对少言寡语、面无表情的昭和天皇，打从心底却怎么也无法喜欢。

然而现在的天皇，他的存在确实是日本的象徵，代表了「良心」和「良知」。天皇和皇后两人的样子也被认为是日本的理想夫妻的形象。东日本大地震时，政府的对应不力、灾区居民的心灵受到重创之际，他们两人赶赴当地，天皇握住一个个灾民的手慰问和鼓励他们。那时候没有日本人会因为看见了菅直人首相的身影而感觉受到鼓舞，只有不满与愤怒，可是鼓励了一亿三千万日本人的就是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觉得现在的天皇是值得尊敬的对象。

正因如此，国民才一直很依赖天皇，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八十几岁了，身体也吃不消了吧。但是，包括我在内，很多日本人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现今的天皇有一天不再是天皇了简直难以想像，于是听到「退位」的消息后我惶然失措。

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君主立宪和民主主义为支柱。君主立宪是指宪法中规定了天皇或国王存在的制度。

过去，日本人一直在讨论作为民主国家的体裁，但作为一个非共和制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其真正意味着什么并没有被认真思考。民主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是以皇室或王室为顶点的社会「阶层秩序」，并为人民所接受的政治制度。大日本帝国时代，就是强调君主立宪的部分而牺牲民主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民主体制的理论被提倡，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摸索「开明皇室」的形象，这是在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上试图结合君主立宪制的一种尝试。现在，可以说日本人又迎接了要面对这两种政治制度的「紧张关系」的时代吧。

日本现行宪法第二条中规定：「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皇室典范是根据这一宗旨所颁布的法律。要修改皇室典范，必须经过国会决议这一道「民主程序」。

如果真要着手修改皇室典范，那安倍首相一直主张的修改宪法等工作，在他二○一八年任期结束前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吧。因此，甚至有人深度解读并大胆猜测，自民党等修宪势力胜利拿下三分之二席位的参议院选举刚结束，就放出天皇有意退位的消息，是不是天皇本人为阻止修改宪法而使出的「祕密对策」呢？

老实说，我倒不这么想，但从天皇本人以往的发言来看，天皇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现行宪法的「护宪派」。不管怎样，要修改皇室典范的话，首先必须成立专家委员会，经过一年左右的研讨，在此过程中各方媒体也会积极参与讨论，而且还要拿到国会上再经歷一两年的争论。

到了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去认真的思考天皇问题了。「我们的天皇」是什么样的存在？对我们的社会有何意义？宪法所规定的「日本国的象徵」又意味着什么？今后，包括天皇在内的皇室应该与日本社会如何相处？这些思考，应该是我们为耗尽了毕生精力为日本人鞠躬尽瘁的天皇献上的最好问候和感谢。

三一一震灾的遗迹拆还是不拆？

这个世界上有不少问题很难轻易给出答案。

经歷过「三一一」的日本东北地区的居民正面临着这样的难题，与此同时，所有国家的人民也都面临同样引人深思的问题：大型灾害所摧毁的建筑物残骸，是该保留还是该拆掉？这些建筑物被称作「震灾遗迹」。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中不少地方整个城镇都被海啸冲毁，民宅几乎都被冲走，但学校和高楼等构造结实的设施免于全毁，一部分建筑保留了下来。当地人为了重新振兴，计画将整个街区移址再建时，就面临是该拆掉它们还是保留下来的一大难题。

宫城县石卷市的大川小学旧校舍在海啸时有八十四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孩子。这里距离从学校东北方流淌而过的河口有四公里远，过去也没有因大地震而遭遇海啸袭击的纪录，所以避难对策来得太慢，很多孩子都不幸遇难了。

我从那个河口步行到大川小学，就能实际感受到四公里有多远。大川小学映入眼帘，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并排竖立着几块慰灵碑。周围还有一块当地居民写的告示牌：「不要对着慰灵碑拍照」。据说曾有从外地来此参观的人下了巴士后就过来举起相机拍照，当地人对此颇为反感。告示牌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或许我也是被讨厌的其中一员，觉得非常抱歉，但是我必须把採访进行下去。我在慰灵碑前双手合十，为亡灵祈祷了一分多钟，然后跨过警戒线进入小学的校园，教师的椅子、黑板都还在。曾经在这里学习的八十多个孩子，快乐的校园生活突然被打破，被捲进滚滚海啸一去不返。想像着如此的场景就令人不禁眼泪盈眶。

然而，我只是个外地人就沉浸在如此的感伤之中，但对当地的居民来说这里承载着「痛失亲人」的灾难的记忆，特别是很多失去孩子的家长主张拆掉学校，也有人批评学校的避难措施、将其诉诸法庭。

一方面，越来越多孩子希望已经被迁移到其他地方的大川小学，其

遗迹能在旧址上保留下来。

为此，石卷市举办了一场公听会，听取居民的意见。三一一大地震当天还是五年级学生的女孩在电视画面里这样说道：

「保留大川小学，让那段记忆不会随风而去，一直传递下去。为了今后的防灾对策，旧校舍是绝对需要的。」

另一方面，大人则觉得旧校舍「唤起痛苦的回忆」，公听会上这样的反对意见也很多。

石卷市二○一五年秋天针对当地居民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要求「拆除」校舍的人占五四％，稍稍超过希望「保存」遗迹的人。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市政府决定在二○一六年三月下旬给出最终结论。有让大家都满意的答案吗？保留一部分墙壁━这样的方式或许是最折衷的选择吧。

震灾遗迹的主要意义在于承载「留给后世的教训」、「追悼」、「防灾的象徵」等寓意。「留给后世的教训」、「追悼」这层含义，在日本用到最多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穹顶吧。核爆中心正下方的建筑物奇蹟般存留下来，以此为原型将周边建成公园，还设有慰灵设施、资料馆等，并被指定为世界遗产。

也有的震灾遗迹被毁坏了━宫城县閖上地区的閖上小学、閖上中学。面朝三陆海岸的閖上地区，有些地带海拔零公尺，半数以上的民宅被海啸冲走了，这里完全被夷为平地。我在震灾发生三个月后访问该地，当时受灾后的惨状让人憷目惊心，我惊呆在那里完全动弹不得。人类的脆弱，自然的威力，让我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怎样脆弱的地基之上的。

在閖上，我拜访閖上的中小学时，校舍的时钟指针停在震灾发生时的两点四十六分，这让我心情沉重。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个学校应该保留下来。然而，按照当地居民的意向，閖上中学虽然把时钟保留下来，却已开始施工，拆除建筑物。

宫城县气仙沼市的大型渔船「第十八共德丸」被海啸冲到市内的街区，二○一三年根据气仙沼市的决议，这艘着名的渔船被拆解了。渔船

拆解前，到访此地的人一定会过去看一看，据说当地的商圈也因此受益。最初，当地的气仙沼市也透露出想要保留该渔船的意愿，但市政府举办的民意调查显示，反对保存渔船的超过了七成，所以决定拆掉。反倒是外地民众为渔船被拆解感到惋惜。对当地人来说，被海啸冲上岸的大型渔船，本身不是一个扎根于此的存在，其违和感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为了追悼亡灵而保留下来的遗迹逐渐变成观光地，当地人对此不满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教训」、「追悼」的目的和变成观光地吸引很多人来访这两件事未必完全矛盾。

当然有的地方政府还是决定保留震灾遗迹。比如有四十人遇难的岩手县大槌町的原市政厅舍，二○一五年八月当选町长的平野公三明确表示「年度内拆掉」它，但是十二月时，町议会提出意见书，认为「没有其他追悼设施」、「论证不充分」，决定保留市政厅舍。后来议会也改选了，和贊成拆掉它并觉得它「影响灾后復兴士气」的「解体派」相比，认为它是「重要的防灾教育基地」的「保存派」人数增加。

有些地方的震灾遗迹何去何从，结论留给下一代去判断。有四十三人遇难的宫城县南三陆町的防灾对策厅舍，当地一度决定要拆掉，但宫城县主张保存遗迹的有识之士会议认为「它的宣传效果不亚于广岛原爆纪念馆」。二○一五年宫城县决定，在二○三一年之前，也就是震灾发生后的二十年间，将这处设施收归县政府所有，二○三一年之后是否继续保存，到时再做判断。

把目光转向日本海外，二○○四年印尼苏门答腊海域发生巨大海啸导致十六万人丧生。班达亚齐州被海啸损坏的医院、被冲上海岸线三公里多的大型船只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据说吸引了很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经济效益显着。

中国四川大地震后，绵阳市北川县损坏的街区成为中国最大的地震遗迹「北川地震遗迹」被保留了下来。震后第二年，也就是二○○九年，超过七百万游客到访，经济效益换算成日圆超过二四三亿日圆。可是，急于把灾区遗迹变成观光地的做法也引来不少批评，比如影响到当地居民搜寻亲人遗体和回收财产等。

一九九五年坂神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神户港美利坚码头的一部分被原样保存，成为可供参观的「神户港美利坚公园」，还设有展示室，记

录了神户受灾情况、灾后重建的道路等，似乎发挥着一座纪念碑的功能—防止震灾的惨痛记忆被世人遗忘。

「灾区的景点化」绝不只是好事。正如上面介绍到的例子，无论多有人气的景点，只要伤害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则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是，灾区重建需要经费，而游客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所以也非常重要。另外，震灾遗迹如果能顺利变身景点，灾害的歷史不会被淡忘，应该有助于持续支援灾区。放诸世界来看，关于灾区是否应该景点化，灾民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于尚未褪去伤痕的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尤其需要审慎讨论，并优先顾及当地居民的情绪。

之前採访广岛核爆纪念馆时，查阅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初在市议会里对保存核爆纪念馆抱持消极态度的人占据了主流，后来经过市民团体的不懈努力，在原子弹投下二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才终于决定要永久保存核爆纪念馆。我觉得适当花费一些时间，更容易得出理性的结论吧。

核爆圆顶屋

日本广岛县广岛市中区大手町一丁目十番。

这是核爆圆顶屋的地址。然而这座建筑物，在法律的意义上已经不復存在。我在法务局查阅到关于它的登记资讯，白纸黑字记录的只有「名目：公园；面积：一一三○八平方公尺；所有者：广岛市」。据广岛市方面介绍，核爆圆顶屋「并不算一个实际的建筑物，而是一种纪念性的存在」。然而，眼前这座被称为「核爆圆顶屋的建筑」，毫无疑问地保留着一座建筑应有的物理形态。

这座「建筑」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在一九九六年。其正式名称并不是核爆圆顶屋，而是「广岛和平纪念碑」。然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称它为核爆圆顶屋，反倒是「和平纪念碑」这个名字并无人知晓。包括圆顶屋附近的和平纪念资料馆等在内的和平纪念公园则被指定为「缓冲地带」，为世界遗产维持良好的环境。

核爆圆顶屋主体使用砖块建材，外砌砂浆及石材，地上三楼（部分为五楼），地下一楼，高约二十五公尺，建筑面积约占一千平方公尺。

由于被栅栏维护起来，我们只能远观，无法近距离接触圆顶屋。这块被圈定的区域占地约○．四公顷，与登记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的资讯基本一致。相较于这一资料，登录在日本国内歷史遗迹名单上的面积则更广，认定范围包括了核爆圆顶屋周边公园区域，合计约一．一公顷。

「七十五年内将寸草不生。」

这是美国科学家在核爆后访问广岛时留下的一句话。

二○一五年是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五月，我来到广岛市的核爆圆顶屋。成为世界遗产的核爆圆顶屋，非但没有寸草不生，反倒染上一层炫目的新绿。

在这座被六条蜿蜒河川环绕的三角洲，在这个生活着一千多万人的近代都市、广岛的正中央，突兀而倔强地立着这座核爆圆顶屋。

和平纪念公园建在当年的引爆位置附近，乘坐自战前就开始运行的广岛电车（通称「广电」）即可到达，距离新干线广岛站约二十分钟的车程。据称，「广电」在核爆炸后的第三天就恢復运行。自广岛电车的「原爆ドーム前（Genbaku Dome-mae）」站下车，沿着公园内河岸前行，就可以看到这座彷彿凝固了时间、静默伫立的核爆圆顶屋。

一群看样子是来修学旅行的中学生正在听导游讲解：「在这片河水之下，如今还长眠着许多废墟瓦砾与遗骨。」

到底还是孩子，有人认真地聆听着这段歴史，自然也有人忙着拿手机自拍留念。写有注意事项的牌子上清楚地标记着「尽量不要嬉笑合影」，看来这条规矩并没能严格贯彻。

这座核爆圆顶屋铭刻着大半个世纪前那个夏日的记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市民一如往常地迎来清晨，殊不知此时的广岛上空，一架名为「阿诺拉．盖伊」（Enola Gay）的Ｂ　二九轰炸机正在全速靠近。这架自天宁岛基地驶来的战机载着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五○九混编部队的十二名机组成员，更重要的是，这架「阿诺拉．盖伊」上携带着人类歴史上首次投入实战使用的原子弹。阿诺拉．盖伊，这是机长母亲的名字。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这架「阿诺拉．盖伊」还曾去广岛隔壁的冈山县绕了一圈。据说，「阿诺拉．盖伊」先是盘旋穿过了广岛上空。在此期间，广岛曾发布空袭警报，但由于飞机快速驶离也就随即解除警报。然而就在此时，飞至冈山县附近的这架飞机监听到警报解除的广播后，旋即调头再次驶入广岛县，在几乎无警报的情况下投下原子弹，有预谋地残杀了大量自防空洞走出地面的市民。尽管这一说法并不为美国官方所承认，但根据众多目击证词来看，基本可以确认属实。

上午八点十五分，强烈的光亮笼罩了市街，巨大的火柱升腾而起。勐烈的冲击波和摄氏四千度的热能光线一瞬间吞噬了核爆中心附近的无数生命。广岛顷刻间变成一片广袤的废墟荒原。然而距离核爆中心仅一百六十公尺的地方，一座圆顶建筑却奇蹟般留存下来。有人说，核爆圆顶屋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倖存，是因为太靠近核爆中心，所受的冲击基本集中在正上方。建筑物的外壁大部分都被击垮，仅残留一小部分，但

中央部分几乎保留了原形，留下如今这样露出圆顶钢筋的独特样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岛，最关键的核爆中心位置却没有明确的标识路牌，十分难找。我也是费了一番精力和眼力，才在圆顶屋旁商店街的入口附近，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块写有「核爆中心」的标识，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核爆中心的该地带，摄氏三、四千度的热光线、冲击波和放射能瞬间夺去绝大多数生命。」

抬头仰望，五月的晴空万里无云。据说原子弹投进广岛的那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晴天。然而那片天在战机的轰鸣与转瞬的强光之后，人间转眼成了地狱。倘若逝者有灵还在现场，也许他们至今仍意识不到为何自己会丧命，为何偏偏逃不过这场浩劫。

回到核爆圆顶屋，我绕着它走了一圈。写着「核爆圆顶屋」的指示牌上记录了它在核爆前的歷史。这里曾经被称作「广岛县物产陈列馆」，由捷克设计师扬．勒泽尔（Jan Letzel）设计。

扬．勒泽尔在日本留下不少足迹。擅长将日式特色融入西洋建筑的他在明治时期设计了十多座建筑。只是，大多作品都在关东大地震和空袭中先后被毁。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这座核爆圆顶屋外，仅剩下位于东京都港区一片雅静住宅区内的名门大学、圣心女子学院的正门了。据悉，扬．勒泽尔精通日文，甚至可以读写汉字。由他设计的广岛县物产陈列馆，因其与湖水相映成趣的独特造型而广受好评。

根据记载，沿着圆顶建筑的圆周，屋内修建了贯通上下的木质阶梯。阳光透过中庭的採光窗照进室内，营造出独特的神祕氛围。而如今这座圆筒形建筑内支起五组钢筋，从内侧防止建筑因年代久远而坍倒。

此外，这座建筑的地下室原为厨房，自外无法一窥其内，不过据说里面几乎完好保留着核爆前的模样。也就是说，这座地下室抵抗住了爆炸中心地区致命的十几万大气压。

核爆圆顶屋周边地区最初叫作「舟町」。河船海船在此聚集，人来客往，货进货出，曾是一带繁华之地。后来，与德川家康夺天下的毛利氏在此修建了供奉天神的天满宫，因此又改名「天神町」。再因全町区

域沿河覆盖南北，在江户时代又各分为「南组」与「北组」。此外，由于该地是往来集散之据点，自然也就聚集起不少替人看病的医生，因此也出了不少私人医生。而因为一颗原子弹，天神町全境被毁，曾经的繁华从此一去不返。

关于核爆圆顶屋的存留一度在广岛市引起两极分化。市议会中，反对派主要是针对超出一亿日圆的维护费用表示强烈反对。原广岛市市长滨井信三回顾，一九六八年的第一次保存工程时，面对截然相反的两大意见「着实伤透了脑筋」。但如果当时未能作出保留圆顶屋的决断，也就没有后来的世界遗产了。

当年参与过保存工程的人回忆说：「原本的砖块就像叠棋子一样一块一块堆砌而成，勉强维持直立的状态，只要来一阵轻微的地震或飚风就有可能轰然倒塌。当然，能扛得住原子弹爆炸屹立不倒本来就是奇蹟了，从构造力学角度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看到的核爆圆顶屋全靠内部添加的树脂加固维持。

而对保存核爆圆顶屋造成关键影响的其实是一位少女的牺牲。距离核爆圆顶屋步行十分钟距离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内收藏着这位少女的日记。少女名叫梶山弘子。一岁八个月时在距离核爆中心一．五公里的家中遭受辐射，却奇蹟般毫髮无伤，并于一九五九年顺利升上高中。那一年夏天的八月六日，梶山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那场可怕的核爆对广岛市民而言，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那座面目全非的物产陈列馆向世人宣告着核爆的可怕，但支离破碎的它又能撑到何时呢？」

当时还没有「核爆圆顶屋」这一称呼。就在第二年，梶山突发急性白血病。十五年后，当年的幸运女婴还是没能逃过核辐射的后遗症。在这一年三月的一篇日记里，梶山写到：「脸色是青的，最近愈发明显了。我可以感到死亡正在一步步靠近。」

少女的预感总是准的。梶山的生命结束在十六岁。

致力于和平运动的人士知道这个故事后向少女的家人借来日记，在各地展开朗读活动，吆吁把核爆圆顶屋保存下来。当时也有意见认为「比起建筑物，更应该把钱花在受害者身上」，但坚持不懈的社会运动

最终还是和保存核爆圆顶屋紧密联繫在一起。保存工程结束后，那位运动人士来到梶山的墓前告诉她：

「请你安心，核爆圆顶屋会永远坐落在那里。」

和平资料馆里收藏着一万两千份史料。永远停在那一刻的怀錶从未离身，因为那是儿子送给自己的礼物；十三岁少年至死都紧抱在怀中的，是妈妈亲手做的便当；十八岁少女面对秀髮大把掉落也只能束手无策……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广岛下起了大雨，裹着灰尘，带着辐射。雨，下了一个多小时。

为何广岛要遭遇如此的厄运？理由很简单，广岛对日本的军事作战至关重要。

广岛本就是陆军第五师团的驻地。日清甲午战争开始后，广岛县的宇品港成为日本向中国大陆输送兵将、物资的据点。明治二十七年，明治天皇移驾广岛，设立大本营，换句话说，广岛一度成为日本的临时首都。后来的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广岛也都既是士兵站，又是作战指挥中心。大本营虽在东京，但指挥实战部队的第二总军司令部、中国管区司令部等众多军事组织的本部都设在广岛，海军方面又有吴港，因此广岛作为军事之都，在当时的日本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地位。

然而，七十年过去，如今的广岛不同往昔。曾经万物俱灭的核爆圆顶屋一带，如今被鲜亮的新绿温柔包裹。坐在圆顶屋旁的河岸椅上小憩，不知是谁敲响了钟声。此时此刻的钟声，让人不禁思考那些惨烈牺牲的意义。

现在的核爆圆顶屋和这片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汇集着各种情感，有反省、有追悼，还有悔恨。在八月六日这一天里，双手合十、追思广岛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另一首夏日风物诗。

日本媒体与核电安全

大约二十年前，我曾负责九州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的相关报导。那是我进入朝日新闻社后被分配到佐贺支社的第二年，对于常在外面跑新闻的新记者来说，报导核电站可算得上是首次被赋予重责大任，我当然是全力以赴。那时候查阅了很多关于核能发电的书籍资料，尽可能去瞭解日本能源政策的全貌。

负责报导核能新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采访玄海核电站的营运单位—九州电力公司。在日本，从北海道到冲绳，全国共有十家电力公司。福冈、熊本和佐贺等九州地区的电力供应就属于九州电力公司管辖之下。

九州电力的干部好几次邀请我这个刚刚接手核能报导的记者一起吃饭，席间对于我所提出的关于玄海核电站歷史和其功能等问题，他也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一年后，我俨然成了核能报导方面的专业记者，对很多专业术语、技术名词都滚瓜烂熟，写起核电方面的稿子也得心应手。自然而然地，我和九州电力的干部也变得熟稔起来，每週採访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联繫，对方说如果我想参观玄海核电站的话，也会尽可能派遣相关负责人陪同。

有一次，关于玄海核电站欲导入钸铀混合氧化物（MOX Fuel）发电（钸热发电）的问题引发关注，钸热发电是指：在通常使用铀燃料发电的核电站中，给铀里混入一定量的钸来进行核能发电。但是，对于钸铀混合氧化物燃料发电的安全性，舆论有强烈的质疑，而是否应该导入钸热发电，也成为佐贺县政府和县议会上一项备受争议的话题。

我对导入钸热发电的目的有很多疑问。我猜测这应该与电力公司想要消耗日本国内的钸有关。先前使用钸燃料发电的快中子增殖反应炉（fast breeder reactor）计画研发失败了，所以大家为如何处理剩余的钸而焦头烂额，钸热发电则成为不得已的下下策。

同时，钸热发电的方式到底安全与否，当时在技术上也尚未得到全面验证，因此我在《朝日新闻》上写了几篇质疑该计画的报导，主张

「导入铈热发电计画为时尚早」。

从那之后，九州电力对我的态度明显变得冷淡，即使拜託对方想採访核电站，一句「看时间吧」，就没消没息了，也不再邀我一起吃饭。即使我申请记者访问团（採访该公司），也因在「抽籤」环节落选而无法参加。

为什么核电站方面会如此敏感呢？我只不过是一名记者，电力公司对我刊登反对铈热发电的报导是不是反应太过度了？

老实说，二十年前我没有想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却非常明确地瞭解其中缘由。因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触犯到核电站的禁忌，被贴上了否定核能的「反对派」标籤。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战后的日本，大型报社和电视臺等媒体基本上都是核能政策的拥护者。

二○一一年，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媒体群起批判「原子力村（核能村）」，这个由电力公司、政府官僚、政客和学者等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推动核能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在利益驱使下採取一致行动推动核电站建设。然而，媒体无疑也是「核能村」的一员，纵观日本核能歷史就可见一斑。

在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等各大媒体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议题上都勇于表达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唯独在促进核能发展方面，各大媒体一直都持支持的立场。

极力从战败废墟中站起的日本在进入一九五○年代后，即开始着手推动核能发电，打着「正因为日本经歷了原子弹爆炸的惨痛经验，所以要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旗帜，开始大力宣导「和平利用核能」。虽然，当年反对核能的运动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政府主张的「反核能＝不符合科学的想法」，媒体几乎口径一致表示贊同。因此质疑核能安全性的反对派所发出的声音，就这样被媒体埋没了。

当一九七九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s Island）核事故发生后，「核能村」提出了一个「安全神话」，极力主张「日本的核能很安全，和海外不一样」。一九八七年发生车诺比事故时也是採取同样态度，「日本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那种事故在日本绝不会发生」。他们利用这种方式极力劝说民众，让整个日本社会放心。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接二连三地发生核事故，一九九七年茨城县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发生爆炸，动燃（动力炉．核燃料开发事业团，现日本原子力开发机构）在提交给国家的报告书中甚至有不实记载，企图隐瞒事态的严重性。一九九九年在茨城县东海村发生了日本国内第一起铀临界事故。

即使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日本媒体对于核能发电本身依然没有形成反对声浪。可能是因为尚未出现攸关人命的重大影响吧。但是，电力公司每年支出数百亿日圆的巨额资金在报纸、杂志或电视上登广告，这商业上的考量或许也是媒体无法反对核能的难言之隐。在二○一一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政府宣称核电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防止地球暖化，国家主导的「核能復兴」运动就此展开。政府宣传「核能是清洁能源」，很多媒体也都随之附和，大幅跟进报导。

但是，福岛核事故证明了反核绝对不是不符合科学的想法，而且日本的核电站并不安全。清洁核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些过去为了推动核能发展而提出的种种口号主张，其实是错误的。

实际上，媒体在核能报导方面有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在获取资讯方面，对于负责报导核能的记者来说是一大难题。一般来说，一项技术若是广泛应用于全社会，很多人参与其中，资讯也就能共有共用。但是，核能的技术难度高，能对核电站来龙去脉加以详细解说的人非常有限。

甚至，若是记者想要对核电站有更深入瞭解，就必须向电力公司或其他熟悉核技术的专家学者请教，然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核能村」的「村民」。所以，记者的认识和理解自然而然也就难免成为「核能村」的一部分。当然，反对派也可以进行报导，但是电力公司等在选择接受谁採访、向谁提供资讯时，必然是以贊成派为优先。

原本以为福岛核事故会让根深柢固的日本媒体彻底改变，但事实不然，大众媒体对于核能反对派的态度依旧冷漠，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

从二○一二年秋天起直到冬天，很多市民自发聚集到国会附近，持续进行反对核能的示威活动，这些依旧让人记忆犹新。但是，很多知名

媒体却对他们的行动一笔带过。甚至，连在现场采访的外国媒体记者都对部分日本媒体刻意低调报导的行为难掩惊讶。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日本媒体对于亚洲和中东等地民主化运动和示威群众表现出高度关注和同情，但对于日本国内的示威运动却冷眼旁观。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作为日本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核能村」已经深入渗透到媒体内部了，媒体的「体质」已经决定了一切。

《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Martin Fackler，在日本报导新闻的资歷长达十二年，他在二○一二年出版的《不报导「真相」的日本报纸》（双叶新书）一书中尖锐地提出了如下见解：「我这十二年来，在日本採访时深刻感受到的是，本应站在监督权力立场上的新闻记者，却沦为与当权者拥有相似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相较于为民众发声，媒体显然与当权者走得更近，就算这样，他们还觉得自己『想把这个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引导』。」

作为公正的媒体应该不断探究问题本质：核能技术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吗？是否真的安全？日本人，抑或是全人类能够与核能共存共荣吗？我认为这才是媒体该有的责任和态度。

现在，日本的舆论几乎全面偏向于放弃核能，因为不单单是技术问题难以令人放心，经营核电站的电力公司、学者等人所组成的「核能村」，也无法再次获得世人的信任。

以目前状况来看，日本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核电站，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来考量，要立刻全面废除核电非常困难。因此在这种现状之下，媒体应该明确提出三个目标：一是不新建核电站，二是当核电站的四十年寿命到期时即废炉，三是尽全力开发替代能源。日本社会应该在中长期内走上「零核电」的道路。

所谓的日式美学

有一些美术馆转变观念了，开始将展馆本身建造成展品，并因此大获好评。
这样的美术馆即使不举办特展，也能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透过自杀获得永恆生命的那些日本小说家

我身边并没有什么轻生的故人，但与友人交谈间发觉，这世上还是有不少自寻短见的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日本每年有三万几千人自杀，只不过是我狭隘的人际关系里并没有这样的遭遇罢了。然而，自杀小说家的作品，却又是自小就有涉猎的。「写出如此文字的人为何要自我了结呢？」因始终怀抱着这份单纯的疑问，自杀于我而言似乎又很近。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代表近代日本的小说家们有多爱自杀了。

二○一四年的六月十九日，我到访位于东京三鹰的禅林寺，那里安葬着太宰治。这一天既是太宰治的忌日，又是他的生辰。这一天也取其小说之名，被称为「樱桃忌」。据记载，太宰治十三日投身玉川上水，十九日才被人发现遗体。因此实际的死亡时间应当更早一些，只是后人习惯于将十九日当作他的忌日。想想当年与他同赴镰仓跳海却只有那名女子独自香消玉殒的失败过往，先后五次寻死的太宰治也算是了了夙愿，得年三十八岁。

禅林寺的访客多是太宰的粉丝。我当天也是因为陪同一位自称太宰粉的法国友人而首次踏进这座寺院。数百名悼念者中，年轻人之多着实让我吃惊。能吸引如此多人固然是因为太宰笔下人的脆弱、狡猾、烦恼等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自杀所蕴含的悲剧性无疑也是牵动年轻人的一大因素。

我绝无意为自杀这一行为作赋，仅希望能去理解那些除自杀外别无他法的人的难处。然而，作家的自杀行为却又多少有别于常人。他们是为了贯彻美学而死。为美学而死，听起来何其可笑？另一面，人活于世，常说尊严二字，有人以死维护尊严。曾听闻受「文革」迫害的中国文人作家也有人选择自杀。然而，日本作家却鲜见为尊严而死。基本都是为贯彻自己的美学而选择死亡。我对此难以赞赏。

但整个社会似乎持有不同态度。不仅仅是太宰治，多数自杀作家的忌日都会有大批的拥趸缅怀纪念。川端康成的忌日被称为「康成忌」，芥川龙之介的忌日又称「河童忌」。彷佛透过自杀，作家便获得了永恆

的生命。这对于拼命活下来继续书写的作家而言太不公平了。

归根结柢，人类社会对于如何理解自杀行为本就意见分歧。自杀有罪，这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中东起源的一神教社会是共有的观念。保持中立的基督教会会热心地挽救企图自杀的人。然而到了现代，越来越多人认为自杀是维护尊严的一种权利，法国思想家蒙田曾为「高贵的自杀」辩护。精神学者沙特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透过自杀结束生命。」

愈是接近现代，自杀愈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国家，因自杀造成的死亡率都已占据继病死和意外死之后第三大死因的位置。每年美国、日本有三万人自杀，法国两万人自杀，俄国六万人自杀……总之，这地球上每年就有五十万人亲手为自己画上了人生休止符。

姑且不论这到底是否正常，仅日本文学家自杀率高这一点，基本已达成世界共识，对全球研究自杀的学者而言，都是一个无法规避的研究主题。

世界知名的二十世纪日本文豪中，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四人均为自杀。再加上其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约莫就有二十人。这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这些人选择自杀的理由不尽相同。

太宰的自杀是文学式的自杀。自杀已然成为太宰治生活中的一种惯常，是他人生的一种模式，自杀体验在他的文学中也有所表现。关于太宰的死，你很难找到任何非死不可的必然理由。自我了断这一极端行为的背后缺少了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生活中一旦碰了壁，太宰马上就想到死，彷佛从来都是自杀在引诱他。硬要说的话，对太宰治而言，大概死亡本身就是一种主张。

而三岛由纪夫，在位于东京市谷的自卫队大楼的阳臺上发表了十五分钟的演说，在一片奚落与怒声中深感自己不被理解，便结束了原定两小时的演讲。回到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室的三岛，脱下军服上衣，端坐地毯之上，大喝一声后以短刀刺入腹中，三岛的亲信森田必胜当即为其断头。后来，森田也以同样的方式追随三岛而去。

三岛的自杀在日本社会是毁誉参半的。但总而言之，三岛的自杀在另一种层面上与太宰一致，都是一种文学式的死。当时的《朝日新闻》曾有这样一段评论，我深以为然：

「三岛由纪夫的演出以剖腹自杀宣告谢幕。他自身实际上就是其最后的创作。」

思想与现实通常是分离的。三岛却试图将思想付诸现实。对三岛而言，思想与现实的区别极为暧昧，他是那种让现实生活充满紧张感以获得文学能量的作家。这种人，最后的作品无疑是戏剧化的死亡。从这两位的自杀中我们可以瞭解到的是，他们选择死亡以远离身处的社会逻辑。太宰透过逃避，三岛透过反抗，实现了各自对他们所生存的「日本」的拒绝。

在我看来，日本社会是一个集体性、组织性极高的社会。大家透过确认自己是组织的一员来获得身分认同。然而作家是一种极为个人的职业，常常与孤独为伴。因此，他们逃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向组织内的人发洩不满，而只是为了保持自身崇高的「死亡」。

自杀，一如其字面，抹杀自我的行为，加之想死的意图，其结果是可预想的死。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自杀的主要动机有「精神的崩溃」、「肉体的痛苦」、「家庭的不幸」等，文学家的自杀动机也基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精神的崩溃」无疑是小说家自杀的最大原因。

日本人十分尊敬自杀的文学家。这多半源自对「精神崩溃」所带来悲剧意味的同情。这背后有一种奇妙的想法：文学家与自杀十分相配。

然而对中国人来说，困境和怀才不遇才是促使文学开花的最大机遇。甚至可以说，文学家内心深处多少期盼着那一瞬间。中国的歷史长河中，但凡在文学上成就大业的多半是官场失意之人。仅列出李白、杜甫、苏轼三人便可见一斑。

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实说过一段话，大抵是这样的意思：

比起中国人，日本人不抵抗，只随波逐流。抵抗的人被认作顽固分

子受人排挤，遭人嫌弃。日本人最恐惧的就是身处群体却被孤立。

在这样的日本社会里，作家也栖身其中。既不反抗也不转向，仅仅透过自断性命以期获得永恆的存在。这便是日本作家多自绝的理由之一吧。

关于自杀，中日间也有共同之处，那便是「神的缺失」。由神支配的世界中，自杀原则上不被允许。生命来自于神的恩赐，人类无法自由支配。然而，无论日本或中国都并不存在一神教式的神灵，人理所当然地可以自我处理。换言之，「人类至上」是肯定自杀行为的。

在中国的歷史上，畏罪自杀的高官数不胜数，不少是服毒或投缳而死。而被皇帝定了死罪的，也有不少是被下令上吊或服毒而亡。在日本歷史上，被判死罪的人往往自行剖腹，再由被称为「介错」的行刑人为其断首。这究竟算是自杀还是处刑，似乎都说得通。对本人来说是自杀，对掌权的一方来说算是处刑，不过互为表里罢了。

自杀前，人总会留下一些话，日语称为「辞世诗」。日本人的辞世诗往往富于感情，包含日式美学特有的「物哀」，鲜有怨恨之词，而中国人的辞世之言则多含悲怨及诅咒之辞。战国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因被吴王怀疑有异心，自刎前曾叫喊：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若没了自己，吴国便也完了。到那时，自己的双眼将见证国家的灭亡。何其「人性」的死！日本人做不到如此。无论是人的世界还是自然世界都是「物哀」的世界。

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被部下烧死前，是否当真吟诵过「人生五十年，去事恍如梦」，仍是一桩悬案，但这样一种退一步回望世事的辞世诗，的确很「日本」。

话题似乎扯远了，回到日本人小说家的自杀癖好，不知为何进入平成年间颓然骤减，其理由尚未有定论。难道说是因为小说家的「精神崩溃」已经失去了现实感？试想，如果村上春树因为无缘诺奖而绝望自杀的话，大概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吧。我偶或会有这样轻率失敬的想像，不

过这样的事大概不会发生。对村上春树式的「我」而言，与其自杀，肯定不如选择逃去世界的尽头。

另一个国民作家：渡边淳一

这十多年来，渡边淳一始终和村上春树共同被誉为日本「国民作家」。暂且不论渡边的小说品质如何，但他的一举一动往往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众所瞩目。单就这层面的意义来看，渡边淳一绝对称得上是一亿三千万日本人随时关注的「公众人物」。

当然，村上春树走的是纯文学路线，而渡边淳一则专注于通俗文学。换言之，就是渡边永远都不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是，村上的小说很难被改编成电影，例如《挪威的森林》（二○一○年）的票房惨遭滑铁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渡边创作的《失乐园》等一系列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这些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剧与电影，并且都相当卖座。

这样看来，透过不同媒介接触到渡边淳一作品的人数，可能远远多于单纯在小说销售量上吃香的村上春树。

然而，当有人兴高采烈地分享说「我刚读了村上春树的新作」时，并不会被旁人侧目；相反地，要是有人说「最近，我读了渡边淳一的新作」，却可能会被朋友在背地里说「这个人真是庸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鲜少会有人在公开场合说「我是渡边淳一的忠实读者」。但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渡边的作品，沉迷于他笔下刻画的男女之爱，成为「潜在粉丝」。

若非如此，渡边的作品不可能如此畅销。当《失乐园》推出后在日本引起热潮时，平时不包书套的人都会替这本书加上书套，在电车上忘我地阅读。我便是其中一人。

渡边淳一辞世的消息传出的隔日，也就是五月六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对他的作家生涯加以评价。

「渡边淳一一贯坚持从正面描写爱与性。甚至，他的作品有时会被称为情色小说，但这正是一位毕生探求生与死的作家所谱出的人间赞歌。」（《朝日新闻》）

「渡边是恋爱小说的第一人。在自己壮丽的作家人生中，渡边不断地从男人与女人的深奥关系中探寻着人类的本性。」（《读卖新闻》）

「正因为渡边一直探寻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性』，才能将自己的体验冷静而透彻地注入作品之中。他始终对人类的本性充满好奇，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小说的创作。」（《每日新闻》）

上述的评论内容都很贴切，却未能透彻地阐释渡边淳一的本质。对于这些推崇纯文学的大型媒体的文化专栏记者来说，渡边可能是一个非常难以评价的人物。

渡边淳一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作家？

这个问题不如让他身边的女性来回答，或许她们能够作出更为精闢的评论。事实上，在一些媒体上对渡边的逝世表达哀悼之意的大部分都是女性。这当然也非常符合渡边的风格。

曾演出电影《失乐园》的女演员黑木瞳说道：「我心爱的渡边老师，您我最后一次共饮的是法国玛歌酒庄红酒，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温情的招待，直到最后，您一直都是一位潇洒的绅士。」

拥有大批女性读者的女作家林真理子则谈到：「有一次您身穿和服来到银座的酒吧，服饰华丽而耀眼，在女人堆里快乐地饮酒，就像一名文士。您经常说，描写男女间的情爱非常有趣，根本难不倒您。」

另外，作家小池真理子则惋惜道：「每次和渡边见面，他都会和我谈论写作的心得，以及男女之间应有的关系。我想出版界中再也不会出现如此大方，并拥有自由豁达人生的作家了吧。」

在她们之中，有些人曾与渡边淳一传出绯闻。无论属实与否，从她们溢于言表的悲痛之情，我们就能清楚感受到渡边是多么受女性欢迎。

虽然我与渡边淳一素未谋面，却一直都憧憬着拥有像他一样的人生。渡边迈入中年时，我还是学生，读过他的作品后却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中年人；而这些年当他年老了，我又想成为像他那样的老人。相信有不少男性和我一样怀抱着同样的幻想，但无论如何，渡边都是一名无法被取代的人物。

渡边淳一原本是医生，由于在小说中揭露了自己当时任职的大学医院的阴暗面，因此受到排挤，于是他索性辞职，成为专职的小说家。最初，他的小说多以医学与歷史为主题，但到了中年之后，他开始专注于恋爱小说，创作出《一片雪》、《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等备受争议的作品。虽然已经有家庭的渡边经常与众多女性传出绯闻，但是这都没有对他的社会评价造成严重影响。

其中的原因在于，渡边淳一曾在散文中写过：「若是真心去爱的话，就能得到对方的原谅。」由于他自己对每份感情都是真诚相待并且全心投入，所以即使女方受到伤害，最终也会选择原谅。

发现正和自己交往的女子竟然有其他男人，便试图用锯子把女方家的门鍊锯断，破门而入；和一名有夫之妇相爱，想要一起殉情自杀……渡边把自己的恋爱经歷一一写在小说中，其作品呈现的真实感是其他作家无法企及的。

此前，渡边淳一曾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受到过多社会规范的拘束，以至于不能突破恋爱的理论，发现未知的自己。」据闻，渡边本人豪放不羁地投入每一场恋爱，甚至是超越了社会规范，因此产生了所谓的「渡边文学」。他有这样的感叹，或许是源自于他对自己的这份自负。

若读者读过渡边淳一的作品，便会发现他的主题始终围绕在「爱与死」，渡边对于「死」的执着超乎寻常。他的心中有个根深柢固的想法：「爱」能被「死」净化，并成为永恆。这些思想的原点在于，渡边在北海道就读高中时的初恋──一名同年级的女孩。她是天才少女画家，同时和多名男生交往，也曾诱惑并且玩弄了渡边。最终，她在北海道的阿寒地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经歷在渡边的心中埋下了对「爱与死」的憧憬。

由于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等作品描写了不伦恋，所以在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但是，若回顾他整个创作歷程，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其作品涉及医学、歷史、恋爱等诸多领域，以这样的质和量来说都是相当可观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感兴趣的题材孜孜不倦地收集资料，并且持续创作，几乎没有出现失败之作。

渡边笔下涉及性爱内容的作品虽然饱受社会批判，被认为「过于庸俗」，但是这些作品依然流传至今，并且广为大众所知。或许可以说，作家渡边淳一的人生本身就像一部小说，他也创造了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渡边淳一的世界」了。

美术馆＆苹果派＆太宰治—我的青森之旅

青森是一个神秘的县。上世纪九○年代，这里发现了巨大而罕见的绳文时代集落遗迹—三内丸山遗迹。日本最大的绳文时代巨型石阵遗迹分布在青森各地，使这里成为世人热议的话题。但是，这些都是要追溯到数千年前的绳文时代的遗址，说实在的，我们对青森当今的实际状况并没有深入的瞭解。

二○一四年年末，我因受邀演讲之故来到青森县，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上高中时，我乘坐连接青森与北海道函馆的「青函联络船」前往北海道时，曾在青森停留半日。当时，青函隧道尚未开通，船是连接青森与北海道的唯一交通工具。我先从东京乘坐夜行列车来到青森，下午又坐上青函联络船前往北海道。我清楚地记得船上有很多青森本地的小贩，他们挑着篮子，去北海道贩卖日常用品。后来，採访时我又来过一次青森县，但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在此悠闲逗留。

这一次，我安排出三天两夜的时间，决定充分享受一下寒冬中的青森。抵达青森时，由于前日大雪，这里已经成为银色世界。我从机场租了一辆车，但从机场到青森市的公路已经完全被白雪所覆盖。由于我并不是在雪国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只好以三十公里的时速缓慢地开到了市内。

第一天的行程以演讲和晚宴结束了，从第二天开始，我有两天自由活动的时间。提到青森，日本人最先想起的也就是苹果、遗迹、核电站、津轻三味线之类的了。青森县位于日本本岛的最北端，乘坐飞机前往北海道旅游的人都会飞经这里。若是滑雪，岩手县与新潟县便能玩得很尽兴。所以，在冬天前往青森观光的东京人绝非多数。

但对我来说，青森县有一家令我心驰神往的美术馆—青森县立美术馆。这座完成于二○○六年的美术馆彻底打破青森县留给世人的「苹果、遗迹、核电站、津轻三味线」的既有印象，所以我一直想去一探究竟。

日本是美术馆很多的国家。不，应该说是多得过头了。日本全国共有一千多家美术馆。设在各旅游景点的美术馆一般都会将焦点放在某个

主题或某位画家上，但即使购买了高价的门票，也未必能看到物有所值的展品，往往会后悔。在美术馆的营运过程中，收集和管理展品、雇用馆员等方面都需要大量开销。要想成为能透过展品吸引游客的美术馆，政府、财团或媒体的援助必不可少。自然，这样的美术馆多集中在东京、大坂等大都市，住在外地的民众很难前往参观。因此，各地的县、市、自治体都建设起自己的美术馆，但受预算限制，这些展馆很难每年都举办大型特展，往往会沦为无人问津的「蚊子馆」。为了斩断这个恶性循环，最近有一些美术馆转变观念了，开始将展馆本身建造成展品，并因此大获好评。也就是说，这样的美术馆即使不举办特展，也能吸引游客前来参观。

与水户美术馆（茨城县）、金泽二十一世纪美术馆（石川县）相同，青森县立美术馆也可以被划分在「将展馆本身作为展品」一类的美术馆之中。

该美术馆由日本着名建筑家青木淳设计，于二○○六年开业，外观采用了近十年来在日本极为流行的「白色立方体」式。近来，有很多宾馆都採用这种设计。青森县立美术馆并没有设置明确的入口，也没有停车廊，就像一个在草原上突然出现的白色箱子，连个标志都没有。由于前日大雪，美术馆被完全包裹在一片银白之中。直到走到很近的地方，我才发现它。

美术馆采用半地下式设计，乘坐电梯下行，便可来到柜臺。馆内禁止摄影，唯一允许拍照的就是世界级的艺术家奈良美智的作品—巨大的「青森犬」雕像了。奈良美智亲自设计的空间展区「八角堂」会令人联想起从地下升起的废墟，其中还设有大小各异的「青森犬」。一般来说，即使是常设展品，也会每三、五年左右更换一次，但奈良美智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青森县立美术馆的招牌，因此被赋予「永久展示」的特殊地位。

在宽阔程度令人叹服的阿雷可大厅中，展示着三幅画家夏卡尔参与创作的芭蕾舞「阿雷可」的背景画。它们各自高九公尺，长十五公尺，可以归在夏卡尔最大篇幅的一类作品之中。虽然我看过他的许多作品，但如此巨大的还是给了我新鲜感。没有悬挂画作的一侧区域设有椅子，坐在这里观看左中右三张各不相同的画作，能体验到一种周身被夏卡尔

的世界所包围的幸福感。夏卡尔是追求自由的画家，我也尽情地沉浸在这自由的空气之中。

来到餐厅，映入眼帘的是窗外一望无垠的雪原。暖暖的咖啡似乎变得更加美味。美术馆彻底贯彻了「享受空间」的理念，整个建筑显得十分完美。

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距离青森市一小时车程的弘前市。自江户时代以来，弘前就一直是青森地区的中心。明治政府内部还曾就要将该地区命名为「青森县」还是「弘前县」的问题争论过。在否定江户时代传统观点的理念下，「青森」这个小渔港的名称最终当选。在时局动盪的时期，政治能够决定一切。

日本全国二○%的苹果都产自弘前市。同时，这里也是个以苹果派闻名的城市。虽然我曾经有所耳闻，但真正来到此地时，还是被「苹果派店铺的密度」所震惊了。

在车站前，我拿到了一张「弘前苹果派导览图」，上面不仅标注着店名、地址、电话，还配有苹果派的实物图，以及按五个等级标注的甜味度、酸味度、肉桂味道强度，顾客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寻找到合适的店铺。目前，导览图上记录着将近五十家店铺的资讯，而实际的店铺数量是它的两倍。弘前市仅有十八万人口，在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中，居然有这么多家苹果派店，不得不令人惊奇。

我花了两个小时，分别来到了三家销售苹果派的店铺。最先去的是一家名为「Angelique」」（弘前市野田1-3-16）的店铺。这里的苹果派口感松脆，使用特制的苹果酱，以及切成薄片的「富士」与「红玉」苹果。派的外观十分鲜艳，口感又硬又脆，极其美味。这里的苹果派可以归类为「创作型」。

随后，我来到「点心工房圣诞屋」（弘前市品川町1-1-101）。极为惹眼的「弘前Style苹果派」散发着浓郁的黄油与肉桂的清香，主要材料自然也是苹果。这道美食经常在弘前市美食竞赛中获奖。据说，随着季节的变化，店里还会更换苹果的品种。

我最后到访的是「LE CHOCOLAT」（弘前市徒町17-1）。派的质地很脆，苹果经过熬煮后，释放出浓郁甜味。这里的苹果派极有人气，

总会被一抢而空，可以归到「传统型」的类别之中。

在东京吃苹果派，要碰运气。有时候花了五百日圆，却吃不到好吃的派。即使是对于爱吃苹果派的我来说，尝试都需要一定的勇气。正是由于它的做法简单，味道上会更容易出现差异，制作的难度也更高。

在弘前市短暂停留时去的这三家店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价格也仅有三百日圆左右，而且非常美味。弘前市苹果派的水准很高，强烈推荐读者来到这里时品尝一下。

青森县的另一个着名之处在于「文学」。这片每逢冬日便会被大雪完全封闭的土地，孕育出了至今都极具人气的日本明治文学巨匠太宰治，以及被尊称为「语言的炼金术士」的诗人兼导演寺山修司等独具个性的文学家。太宰治创作的《斜阳》、《人间失格》、《奔跑吧梅洛斯》等名作，是我从小就热衷阅读的作品。

太宰治生于一九○九年，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岁月。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青森县五所川原市金木町，其故居已被建成「太宰治纪念馆（斜阳馆）」。

两楼高的歇山顶构造，加上清一色的罗汉柏建材，使这座故居有压倒性的存在感，令我看得入了神。走进馆中，太宰治成长的环境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即使不是他的迷，也会感到兴奋吧。馆内陈列着太宰治常用的菸灰缸、亲笔文稿等物品。当我看到写在二楼和室隔扇上的「斜阳」二字时，不禁激动地泛起了鸡皮疙瘩。留存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名作的构想，一定是由此而生的。

行程的最后，我来到了青森县的温泉。青森也因温泉之多而闻名，但我这次来的是拥有八百年歷史的大鳄温泉。这里是青森最古老的温泉地之一，河流沿岸散布着数十家温泉旅馆。附近还设有大鳄温泉滑雪场，游客可以在白天尽情滑雪，晚上享受温泉与青森的山珍海味。而且，此处的温泉旅馆的价格都在一万日圆左右，定价非常合理。在我留宿的老铺中，女掌柜对我说了如下一番话：

「从东京到青森来可能会有些不方便，但如果能在这里长住的话，是再好不过了。这里的旅馆价格要比北海道便宜两成左右，还能品尝到蘑菇、山菜、山芋等种类丰富的山珍，以及螃蟹、扇贝、鰤鱼、海胆等

鲜美的海味。在青森能够悠闲地享受到这些。」

最后一天，我来到了距离旅馆不到五分钟车程的滑雪场，从早上玩到中午。下午，我回到旅馆，在无色透明的硷性温泉中消除滑雪的疲劳，感到留在身体中温泉的余温，踏上通往青森机场的道路。

浮世绘与动漫

浮世绘是江户时期诞生的绘画流派。在日语里，「浮世」一词有「现代风」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是描绘当代风俗的风俗画。它一方面保留了作为汲取大和绘画源流的传统风格的文化背景，又真实再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风貌等。

当时，浮世绘既是江户普通百姓的闲暇消遣，也是从日本全国各地到江户来的观光客必带的伴手礼。江户时期的日本是一个由两百六十个藩所组成的封建社会，地方上的藩主大名等有权有势的人，经常带着家臣往返于江户城和老家之间。对他们来说，物美价廉、携带轻便的浮世绘是再好不过的伴手礼了。当时不少进京的旅人在东海道的品川驿站附近住宿，据说品川驿站周围匯集了很多「绘草子」（一种类似连环画的书）商店。

当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繁荣程度的差距比现在大很多。在日本能做出漂亮版画的地方只有江户。去江户的人一般都买浮世绘作为江户特产，带回去分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所以浮世绘既是江户文化，也成为了一般日本文化的象徵。

浮世绘中所描绘的世界既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是非日常的图景。有游廓（妓院集中的风俗街），有美丽的女子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载歌载舞。然而，江户时代不总是歌舞昇平，也发生过几次大饥荒。在浮世绘中，画家描绘了一种超乎想像的乐园（有时是地狱）景象。这乐园也并非跟现实世界相差十万八千里，而是处处反映着现实的乐园。

相比之下，中国绘画中所描述的乐园则是文人心中的理想之乡。陡峭险峻的山峦、舒缓流淌的小溪，在幽静恬适的世界里，一人独自垂钓。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隐居生活。在这里，百姓的烦恼和困苦都无影无踪，可以说抛却一切世间繁杂苦闷后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乐园所在。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大众画，和江户时期的大众画一样都充满了庶民气息，比如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但中国画后来逐渐失去这种庶民性。而在日本，大众画的传统远远超过文人画。画浮世绘的画家和欣赏

浮世绘的民众，都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底层平民。浮世绘诞生并成长于那些远远仰望江户城的、光线昏暗的城下町的长屋之中。

似乎日本人原本就是喜欢欣赏绘画、乐在其中的民族，尤其是喜欢描绘世俗生活的内容。贵族不会成为绘画题材。成为题材的大多是村民、美女，这里的美女是指娼妓，绝非社会地位高的大户人家。总之，它是种极其通俗的文化。

这里所描绘的题材基本上是吃饭、洗澡、做工干活、和异性做爱，净是些身边的庸俗之事。在封建社会的幕藩体制之下，允许游廓、歌舞伎等存在，以作为庶民的消遣之所，但结果妓女和歌舞伎表演者最终却成为吸引大众人气的明星。

日本社会对「低俗文化」的宽容至今余风犹存，比如对待ＡＶ（成人电影）等管制松懈，全社会普遍对其态度宽容。日本人谁都不会觉得ＡＶ、色情制品算是一流文化。但是，虽说低俗也没有特别排斥。作为自身所处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也享有「公民权」，出演ＡＶ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活在这世上，我们把他们视为同伴予以接纳。这一点，和把女性裸露肌肤视作「社会性罪恶」的古代中国以及某种将其视作「宗教性罪恶」的宗教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吧。

同时，浮世绘对于日本的娱乐产业也给予诸多启示。即使以写乐、北斋等着名画家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基本上也都是职业工匠共同创作的结果。浮世绘是版画，所以一幅作品要牵涉到画师、雕刻师、印刷匠等人。每名工匠都带着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去创作，竭尽全力完成一幅作品。北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画师，把画完的原稿交给雕刻师和印刷匠去完成，在北斋的背后还有作为发行人的商人的身影，将他的浮世绘推向市场。这也就是所谓的「浮世绘商业」。

这和今天日本文化的代表—驰名世界的动画、漫画领域的机制完全相同。动画首先需要脚本，在绘画导演、美术导演之下，原画、动画、色彩、背景部门、ＣＧ部门、摄影、编辑、音响效果、声优（配音）等各领域的能手相互竞技，共同合作。这样，一部精彩的动画电影才能呈现给观众。

漫画也一样。週刊杂志连载的漫画，在一名作者之下，还有四、五

名助手。创意也是由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商量，每週想出新点子。作者提出创意，完成简单的原稿，主要人物以外的背景、上色等精细加工都交给助手去做。否则，每週维持二十页的连载是不可能实现的。

浮世绘作品之所以能大量残留下来，流传至今，也是因为创作者几乎每个月都发表新的作品，供大众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浮世绘和漫画都有娱乐产业的一面，因为娱乐产业正是以大量生产为前提的。可以说，这和呕心沥血数年才完成一部创作的艺术作品，基本上可以「划清界限」了。

下一个共通点是它们在海外获得的赞誉要高于日本国内，然后这些高度评价被回馈给日本国内。在动画、漫画领域，手冢治虫的漫画、吉卜力动画、《哆啦A梦》、《海贼王》、《火影忍者》等作品在海外的人气远远超乎日本人的想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全球销售、上映。

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快速走向近代化，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认为浮世绘所代表的江户时期的通俗文化，象徵着负面色彩浓厚的日本的过去，都想让世人加以遗忘。浮世绘被当成前朝遗物来对待。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西洋社会看待浮世绘的态度和日本国内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人对它充满好奇心。

浮世绘在欧洲掀起了「日本风潮」的大流行。所谓日本风潮就是在欧洲出现了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粉丝并深深陶醉于此。如果梵谷没在巴黎世博会上遇见广重的浮世绘，梵谷的向日葵也不会诞生。莫内和克林姆的画，艾米尔．加雷的玻璃工艺品中都深受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美术的影响。

动画和漫画的地位在平成以前也很低。我小的时候，动画和漫画等还不是大人的读物，在电车里看漫画的成年人会遭人鄙视，这是当年的一般常识。小时候母亲总是训斥我：「一直看漫画会变笨的！」

然而就是这样曾经遭到不屑一顾的动画、漫画，终于还是登上了文化领域的正面舞臺。仅仅一年之中，东京一流的美术馆、展览馆就举办了「海贼王展」、「火影忍者展」、「新世纪福音战士展」等动漫主题展，吸引了大批民众进场参观，屡创佳绩。十年前的话，动漫展览会得到的待遇可是截然不同，美术馆或博物馆的内部会议上要么是质疑「有

必要举办这东西（动漫展）吗？」，要么就是社会各界批评动漫展「和美术馆格格不入」，很难付诸实践。

在日本社会，动画的地位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很多。与其说在日本国内对动画的评价自然而然的上升，不如说是因为动画在海外名声远播，日本人的评判标准被迫发生了改变。这一过程，和被日本人厌恶为「低俗」、「前近代」的浮世绘在昭和之后广受欧美好评，反倒使日本国内出现浮世绘热的歷程十分相似。

如今，据说浮世绘的名作不少都保存在欧美，比如现在想举办北斋作品展，不找波士顿美术馆帮忙根本开不成。今后，动画、漫画的珍贵之作也是更多保存在海外，不从国外借回来就无法举办展会—这样的时代或许也会到来吧。

日本的「美女」和「美人」，差别在哪里？

在一次朋友聚餐中，大家谈起了「美人」和「美女」的话题。

在日语里，容姿娇美的女性既可叫做「美人」，也可称为「美女」。一名中年男子所说的一句话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我喜欢美人，不喜欢美女。」

一位年轻的女孩说：「有人说我是美人，但没人说我是美女。」于是我问道：「美人和美女不是同样的意思吗？」答案似乎并非如此。把大家的意见匯总一下，就是美人是一个大类别，美女也包含在其中，两者并非对等关系。世人脑海中的「美女」，一般是指那些像模特儿一样极具风度、稜角分明的女性。「可爱」也在美人范围内，可是和「美女」意思相对；女性能被分为「可爱型」和「美女型」，男性也对两者各有所好。

日语里形容女性魅力的词语真是多到不胜枚举：美女、美人、丽人、佳人、漂亮、美貌、倾国、容姿端丽，等等。

说起日本的美人，就会想到美人的两大产地──秋田和京都。来自这里的美人被称为「秋田美人」和「京美人」。在日本社会中，这两大「品牌」拥有极高的地位。两地美人的共同点是肤色白皙，但有种说法认为。秋田的美人靠天生，京都的美人靠打扮。

我曾问过一位生于秋田的女性：「作为秋田美人的感受如何」，得到的回答是：「我虽然相貌平平，但每当提到自己是秋田人，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把我高看一等。这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在日本的歷史中，「第一美女」就是有秋田、京都的背景的。生于平安时代的诗人小野小町，她的一生被谜团包围，据说她生于秋田，十几岁的时候来到了京都。虽然最初身分卑微，但后来受到天皇宠爱，地位也是扶摇直上，也留下很多日式诗「和歌」。

另外，日本人脑海中的中国美人形象无论如何要属杨贵妃了。她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但我也常听人议论说：「以当今的审美标准来

看，杨贵妃算不上是美人。」

原因在于，唐代美人图中描绘的女性都是面庞饱满、身材丰腴、眼睛细长，与现代美女的形象相差甚远。收藏于臺北故宫中的唐三彩仕女像也大多都体态丰满。今天，即使她坐在身边，我大概也不会动心。同样，日本平安时代的美女也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美人。

然而，中日两国的美女观在不断接近，明治时代以来已十分相似。说到被中国美人深深吸引的日本人，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大文豪芥川龙之介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当时芥川龙之介作为大坂每日新闻社的临时海外观察员，于一九二一年春被派往中国。他从东京出发，经由九州门司来到上海，用四个月时间遍游中国大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南京、九江、武汉、洛阳、郑州、北京、大同、天津、湳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回国之后，芥川写了本书，名叫《南国美人论》，记载了自己在酒楼、妓院接触到的女性，以及对她们的感想。

例如，名为「时鸿」的女子「带有淳朴的田园气息」，「洛娥」是「薄命美人」，「花宝玉」是「大家闺秀」。芥川对这些女性的美丽充满赞美之情。

当被中国朋友问到中国美人哪里最好看时，芥川回答说：「我觉得耳朵最好看。」

戴着耳环的耳朵所散发的魅力，是当时的日本女性所不具备的，这对芥川富有艺术气质的感性带来很大冲击。

中国古代的美人图的确与当今的审美有很大不同。在唐代，美人的标准是「体态丰腴，丰乳肥臀」，指的是胸部与臀部丰满的女性。据说，唐代还流行穿领口较大、能够袒露丰满胸部的服装。

但是，美人的标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到了宋代，流行起「身轻如燕、身姿窈窕」的说法，像燕子一般体态轻盈的女性开始受到追捧。在春秋战国时代（西元前）的楚国，当时人喜爱腰细的女子，这种细腰被称为「杨柳腰」。由此可见，宋代的审美是一种復古。然而，姑且不论腰细与否，丰满的臀部似乎在任何时代都受欢迎，因为它具有

人丁兴旺的良好寓意。

小说《金瓶梅》中是这样描写美女潘金莲的：「但见他黑鬒鬒赛鸦鸰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的眉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翘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

实际上，每个国家对美人的定义都不相同。中国美人眉毛细长上翘，眼角上扬，额头宽广，鼻子略低，唇厚而小；日本美人眉毛短而浓，眼睛大而长，髮际线较低，鼻子修长，唇薄而长；韩国美人脸庞较长，眉毛短而稀疏，眼睛细小，额头紧凑，唇薄而小……这就是各国美人的大致特徵。即使只在东亚，各国对美人的定义都有如此大的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美人自然没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了。

另外，美人的评定标准自然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每个时代都有美人存在，例如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埃及的克丽奥佩脱拉（埃及艳后）、中国的杨贵妃等，而且每个时代的着名美人往往会影响到歷史事件。生为美人的确有很多好处，但是「红颜薄命」，美人常常会成为男人争夺、女人嫉妒的对象，往往最终以悲剧收场。

美人（美女）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女性的美丽是人人都关心的事。在那场聚餐中，大家一直没完没了地讨论美人的定义，直至深夜散去仍意犹未尽。

只有日本人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在日本创纪录地大热。臺湾、香港、泰国等地也纷纷上映，吸引很多观众进戏院观看。

无论从脚本、绘画还是音乐，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完成度极高的动画作品，但「为什么日本人能创作出这部作品」，基于这一点思考而产生的评论，在日本国内却出人意料的少。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是只有日本人才能创作出来的。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把该作品的最大价值发掘出来。

《你的名字》在日本大热，毫无疑问是二○一六年的大事。最初上映的八月底，仅仅週末的三天时间就吸引了九十六万人观看，票房收入超过十三亿日圆。随后的观影人数也持续成长，截至十一月底，票房收入已经达到两百亿日圆。

在日本国产电影史上的票房排名中，超过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电影《魔法公主》，排名第三。排在第一第二名的分别是《神隐少女》和《霍尔的移动城堡》。计入外国电影后，在日本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的整体排行榜中，《你的名字》跻身第六名。

二○一六年前半年，电影《正宗哥吉拉》大热，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但《你的名字》上映后彻底抢去了风头，成为电影话题的主角。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初为止，观影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换算下来相当于每九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这部电影，俨然已经成为一部全民级的影片。

新海诚导演原本也不是这么有名气的导演。上一部作品《言叶之庭》（二○一三年）的票房为一亿五千万日圆，所以《你的名字》的相关参与者，包括新海导演本人在内，最初的预期是达到上部作品的十倍，也就是十五亿日圆就谢天谢地了。电影的制作人、东宝的川村元气在接受杂志採访时，也坦率地表示：「要问这部作品为何会大卖，我们这些参与了电影制作的人本身其实最不清楚。」

过去在日本动漫界，以「吉卜力工作室」的宫崎骏导演等为代表的「吉卜力」派为主导。新海诚导演并非动漫工作室出身，却在自制动漫的行业中一步步脱颖而出。很多动漫领域的相关人士都认为，不是吉卜力出身的作品很难热卖，但是《你的名字》却感受不到吉卜力的色彩与风格。或许也正是这一点给观众带来更多新鲜感吧。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日本的飞驒高山地区，有个乡村小镇遭到陨石撞击。生活在这里的女孩不知为何跟一名生活在东京大都市里的男生互换了意识，在各自的世界里经歷着不可思议的体验。然而，这一次两人的意识互换，意味着他们超越时空的神奇相遇，将小镇上的居民从陨石坠落的袭击中救了出来。

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和第一遍相比，看第二遍时我流了很多眼泪。看第一遍时我到底有没有感动现在也不清楚，但看完第二遍后我终于知道让我感动的原因了。感人的原因在于，这部作品触发了日本人的内心深处。

我认为贯穿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丧失」。让我更坚信这一想法的是，之前一次採访，我来到东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宫城县女川市。当时，我从很多人那里听到一种说法：很多看过《你的名字》的女川市市民说：「电影里出现的那座被陨石袭击而遭到毁坏的小镇，和过去的女川太像了呀。」他们都「想起了当年的女川，号啕大哭。」

或许那情景真的很像，也许并不像。因为，随后我去了同为东日本大地震重灾区的气仙沼市，也听到同样的说法：「和我们的小镇很像啊。」这不可思议的现象应该怎么分析呢？我沉思了好一段时间。最终想到的答案是，动画《你的名字》试图描绘出对于「丧失」的一种拒绝，而能够从内心最深处领会到《你的名字》真实意图的人，其中很多正是那些在大震灾这无常的大自然暴力=巨大海啸中失去了家人、朋友和邻居的灾区民众。

《你的名字》中，描写街区被巨大彗星的碎片袭击而毁坏的情景。其中还描绘了城镇的中心区域被坠落的彗星袭击后，房屋、汽车、桥樑、学校都灰飞烟灭的场景。

这一场面，在几年前的日本人看来只不过是某种凭空想像出来的灾

难场景吧。可是对现在的日本人来说，这场面无疑会唤起三一一那天的记忆。谁都知道，那一天，突然之间，我们的「日常」就永久地「丧失」到了另一个世界。

当时在银幕前的所有人都会想，如果可能的话，即使犯禁忌让时光倒流也想尝试去阻止这场「丧失」。这就是这部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想像。

影片中，作为阻止小镇「丧失」的代价，两个主角相互间忘记了彼此的名字。即使相遇，也想不起名字。正因如此，电影採用了「你的名字」这一主题。这里被思考最多的还是「丧失」。即使以忘记了「你的名字」作为交换条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对观众来讲无论如何也还是想避开这样的现实（主角失去对方名字的记忆）。这对年轻男女「丧失」后的最终结局怎样呢？还是希望大家去看这部电影。

另外，还有一种「丧失」，是谁都会经歷的青春年华的丧失。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一个场景是，倒在路边的主角发现手心上写着「喜欢你」字样，受到激励，为了拯救小镇而站起来，再次出发。

仅仅是一句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人写的「喜欢你」，就能让人充满能量，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青春期的少年身上。对于听惯了无数的「喜欢你」、「讨厌你」，甚至觉得仅一句「喜欢你」也不能换杯咖啡喝的、沾满了尘世间污垢的我自己来说，这个场景让我很受冲击。

活在青春当下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一切皆有可能。同时我也很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青春不再了。这既是一份感动，同时也是有感于一些东西（青春）已经无法再次得到的一份无奈吧。

在电影中，日语「片割れ」一词成为关键词。所谓「片割れ」是指自己的半身，也就是说自己喜爱的异性。在中文和日语里，都有「有缘」这个意味深长的词。这部电影里，曾经相遇的两个人为了夺回失去的「缘」而奋斗。这也是夺回自己的「片割れ」，抗拒「片割れ」的丧失。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片割れ」。然而，人生越是临近五十岁时，就连「『片割れ』真的是自己的半身吗？」这个问题也变得不再确定，突然让我意识到这本身正是一种「丧失」。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你的名字》真的是非常残酷的电影，不仅是年轻人，就连四五十岁世代的观众看了也会深陷其中。

看了这部电影会流下泪水，并不单纯是因为对一段佳话的感动，还包含感到了一种为日本人、乃至所有人所共有的永恆意义。